

60656/2

译者的话

《八十年代的非洲——一个危机四伏的大陆》是研究非洲政治局势的专著。本书着重探讨当前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主要矛盾，并对八十年代非洲局势发展进行了预测。因此，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非洲，并进一步把握非洲未来形势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参考价值。

自从六十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赢得独立以来，非洲局势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本书作者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认为非洲国家内部矛盾之所以错综复杂，部族问题乃是一个影响局势的突出因素。到目前为止，除埃及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其余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多数非洲国家都是部族众多，部族势力根深蒂固。不同地区的部族，为了各自的利益，斗争激烈，从而严重地冲击着非洲国家的政权，影响着非洲局势的发展。展望八十年代，非洲国家的这类部族冲突还一时难以解决，因此，不少非洲国家局势仍将是动荡不定。

外部大国，特别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夺，是影响非洲局势安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作者认为，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总希望能继续控制非洲的战略资源，使之不致被苏联鼓动的民族主义政权所破坏”。当然，“由于非洲是西方国家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它们彼此之间在经济上也要开展激烈的竞争”。至于苏联，出于同美国争霸全球的战略，也对非洲越来越加野心勃勃。它除了依靠古巴雇

佣军充当其侵略打手外，还向其所支持的国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但是，作者认为“在七十年代末期，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反对苏联集团。这个集团出于自身的理由，一心要阻挡苏联势力在非洲的扩张”，非洲内外矛盾将日趋尖锐。

非洲的经济问题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作者总结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历史，认为在非洲，凡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政局大都相对地稳定；而一些经济发展停滞的国家，多半是动乱时起，政权不稳，只好凭藉强制性的军政权勉强维持统治。为了进一步探讨非洲经济的发展前景，作者专门研究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历史演变，认为从历史上看，“非洲的经济是在以往的五个世纪内通过同欧美国家扩张性商业往来而形成的”。这些西方国家贪婪地掠夺非洲的棉花、咖啡、铜及其他原料。非洲是作为一个被奴役和压榨的对象而进入国际分工的，从而造成非洲经济的长期贫穷落后。民族的独立虽然为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但由于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异常强大，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尽管采取了种种经济发展策略，如大力发展取代进口工业，加强非洲地区的合作等，均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目前，除了少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外，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本书最后一篇论文中，作者认为，非洲国家只有改变当前的经济发展策略，依靠自力更生，努力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才有可能摆脱经济上的困境。

此外，关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世代接替问题，以及非洲人口的增长等社会方面的问题，本书也进行了专题论述。

几年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了名为“八十年

代规划”的大规模国际问题研究活动，组织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知名学者近百人，专门就八十年代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的研究。本书就是这项研究活动的成果之一。作者为科林·勒古姆、威廉·扎特曼、史蒂文·兰登和琳恩·默特尔卡。他们虽长期在研究非洲问题上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但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看问题的方法难免有些片面。特别是在观察非洲局势发展时，往往会低估人民的潜在力量，因而对于充满希望的非洲多少仍持一种悲观消极的态度。相信读者从本书中会有所觉察。

目 录

绪 论	变化中非洲的国际卷入	盖思林·格温 (1)
第一篇	非洲的社会冲突和国际干涉	科林·勒古姆 (22)
导 言	(22)
第一章	在向民族国家演变过程中的分裂和融合	(24)
第二章	“非洲统一组织”处理激烈冲突的作用	(37)
第三章	非洲激烈社会冲突的国际意义	(45)
第四章	对非洲潜在的多事地区的初步预测	(58)
第二篇	八十年代非洲的社会和政治趋势	威廉·北特曼 (66)
导 言	(66)
第一章	趋 势	(70)
第二章	前 景	(112)
第三篇	在日益变化的世界经济中的非洲	史蒂文·兰登、林恩·默特尔卡 (123)
导 言	(123)
第一章	非洲政治经济的形成	(128)
第二章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政治经济	(133)
第三章	独立后的非洲	(146)
第四章	非洲面临的抉择	(187)
第五章	结 论	(202)

绪 论

变化中非洲的国际卷入

盖思林·格温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获得正式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建立持久的、自力更生的民族国家方面，正面临着种种艰难的任务，其中包括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变革以及建立相应的政府机构等。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这些任务将给非洲社会和国际体系带来各种严重的问题。

氏族、部族和民族之间的分裂，可能仍然是非洲国家政治和地区政治中的一种严重的破坏力量。敏感的边界争端，这个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祸根，势将经常地爆发为武装冲突。顽固的南非种族主义制度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此外，许多非洲国家可能都要遇到社会上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日益增长的城乡失业、就业不足以及日益深化的普遍贫困。

虽然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非洲国家自己，但是，外界国家将继续形成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国家建设的任务必须继续向前推进。外界大国的活动，在非洲国家加速发展和防止日益迫近的危机方面，将具有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国内或者地区间的纠纷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大国在非洲争夺利益方面是否有所克制，同样也取决于非洲国家是否愿意采取共同行动来解决地区之间的争端。

和平发展的前景看来并不乐观。实际上，非洲国家的种族冲突和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很有可能要将外界大国拖入争夺非洲政治和军事势力的激烈竞争之中。

本书的研究论文就是专门探讨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阻碍非洲发展的问题。每篇论文都着眼于不同的一组问题，并且对非洲在整个八十年代可能的发展进程作出了不同的结论。第一篇论文的作者为科林·勒古姆，他是英国伦敦《观察家报》副主编。在这篇论文中，他对非洲国家内部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持续种族冲突的前景进行了认真的估价。第二篇论文的作者为威廉·扎特曼，他是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他在这篇论文中集中研究非洲国家处理国内稀有资源的政策问题。他期望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能有所改善，并且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正如扎特曼所指出的，南部非洲的政治斗争将对非洲同外界大国的联系，以及非洲的发展前景产生重要的作用。第三篇论文的作者为史蒂文·兰登和林恩·默特尔卡，他们是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教授，他们认为非洲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将继续阻碍非洲国家的发展而不是促进其发展。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非洲国家内部的压力将迫使很多国家政府转而采取内向发展策略^①，也即自力更生的发展策略。

本书就是由这三篇研究论文汇编而成。同时也是“八十年代规划”决定出版的关于分析发展中世界的主要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趋势的五本著作之一。这五本书都将探讨本地区在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期间将取得的重大经济发展前景；也将

^① 内向发展策略，指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强调自力更生政策，包括发展本国技术，实行保护主义关税，发展取代进口工业等等。——译者

探讨经济发展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使得地区合作变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和经济发展的策略；还将探讨不同地区的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的目标又是怎样有选择地同北方工业化国家以及南方发展中国家发生联系。作为对不同地区的远景分析，每一本书都要求自成一体。同时，每一本书又都要求按照“八十年代规划”总的努力目标，对于在八十年代及以后可能成为国际争论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处理办法。

非洲的国家和民族建设

在非洲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往往是动摇不定的，而政府又是在长期殖民统治的末期，通过原来统治当局的移交而掌握政权的；社会的统一性也是动荡多变的。这种社会是由殖民者临时决定的边界来划分的，经济的前景也是难于预测的。这种经济是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从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获得的政权，也难以转变成为具有广泛权力的有效的政府机构。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虽然形成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团结，但在摆脱殖民统治以后就无法保持联合一致了。非洲的社会仍然是四分五裂。经济发展仍然受到限制。

正如科林·勒古姆所解释的，分裂非洲社会的各种文化上亲缘关系的复杂模式是阻碍民族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每个非洲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对经济资源和政治势力的争夺，进一步增强了种族的自我意识，而且暴力冲突正在猛烈增加。在某些国家，例如布隆迪，本国上层统治人物，为了先发制人地防止向他们的统治发起的挑战，竟采用大规模的

官方暴力行动。在其他地方，例如在非洲之角，某些种族集团总是企图将分居在国家边界两侧的属于同一部族的人民分裂出来，单独地建立一个国家。另外一种情况，例如在扎伊尔，自认为是被压迫和被剥夺公民权利的氏族和部族，总是要竭力保卫自身利益。他们通过发动分裂主义战争企图建立一个种族国家，或者挑起内部冲突以便获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以此来反对目前统治集团对他们的侵犯。

在未来的年代里，非洲国家能否妥善处理这类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独立后新一代的领导人，能否在不同种族的和资产阶级化的居民当中培育一种实现共同目标的意识。而这个问题又取决于他们能否制定创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不同的种族和其他社会经济集团都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不论是在国家建设中，还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工作中，非洲国家政府都面临着如何同外界国家发生联系这样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实质上，对于这类非洲国家政府来说，一方面要通过国际手段，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独立自主，来增进本国的利益，但是，这两个方面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既存在着政治和经济上的良好机会，又存在着互相压制的因素。

非洲国家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的中心作用。这在发展中的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尽管各国政府的社会变革内容和方针有着相当大的变化。但是，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和国家领导下的经济发展却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各国的上层人物都想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种作用。他们希望借此就可以巩固并扩大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但是，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在八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决心会有所减弱。

· 在过去的年代里，建设一个团结各种社会集团的国家政

治权力的进程往往是借助于王朝统治者的权势。他们不仅实行中央集权，而且还设法使他们自己变为国家的化身。在二十世纪后期，朝代世袭已在政治上成为毫无可取之处。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的非洲最古老的王朝已经被推翻。新起的中非帝国^①注定是短命的。一种新型的取代方式就是采用一党制，由一个强有力的有领导才能的领袖来领导。当然一党制的本身也是命运莫测的。恩克鲁玛的垮台带来了加纳一党制的瓦解。除了莫桑比克和一些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外，其余的那些一党制统治的国家，在其独立时期一代领导人去世后，一党制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将是大可怀疑的，例如肯尼亚的肯雅塔^②，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和几内亚的塞古·杜尔等。

军队可以说是民族团结力量的另一种代表。凡是军人接管政权的国家，他们总是要建立并加强国家机器。但是国家同民族之间往往存在着严重分歧。在非洲独立国家中，多数军人领袖很少致力于巩固民族团结。实际上，军事政权往往是建立在使用官方暴力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动员群众给予支持并响应公众需要的基础之上。他们宁愿采取行动以保持政府的短期稳定，而不愿致力于建设一个长期和谐的社会。在政治上毫无进展的情况下，这种维持“社会和平”的进程常常会导致非洲国家政府大力依赖外界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来维持自身稳定和掌握政权。

按照“依附”学派的思想，极权主义统治和国家对经济控制的兴起都被认为是国际体系作用的结果。这点也被认为

^① 中非帝国已在1979年被推翻。原中非皇帝博卡萨逃亡国外。中非帝国已改为中非共和国。——译者

^② 肯雅塔已于1978年8月逝世。现由莫伊继任肯尼亚总统。——译者

是决定南方发展中国家政权结构的特征的重要因素。“依附的必要性”对于南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形成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这是当前争论的题目。这个问题与我们无关。对于国家在本国发展中日益增长的作用，需要在下述各种前提下加以理解，这样做才是适当的。这些前提是：经济依附性，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在发展经济中的突出作用，本国上层人物和外国经济活动家的利益联盟，非洲的非殖民化近代史。

在非洲以及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新的极权主义的主要特点是：（1）对于官僚主义决策方式的严重依赖；（2）国家在本国发展计划中的主要作用；（3）在国家指导下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劳工和企业主的依从关系；（4）一个被严重限制的公众参预决定发展政策的形式。当代极权主义政权如果要发挥作用并保持蓬勃的朝气，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是充满活力的而不是停滞不动。中央集权政府在完成这种或那种社会变革中所具备的能力和决心——公平程度上有大有小——在某些国家，比方说在拉丁美洲可能会更为强大。在这些地方，政治制度不象非洲那样脆弱，而且种族上差异构成冲突的根源也比非洲更少。但是在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预期中的国家作用并未减弱。

作为国家领导下发展经济中的一个因素，在国家领导下发展经济动力中，往往包括着日益增长的经济民族主义。那就是说，争取更大程度独立的愿望促使非洲国家政府对国民生产能力和民族的自然资源坚持行使自己的权力。非洲的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形式远不如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拉丁美洲表现得那么明显。拉丁美洲拥有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团结足以使他们在同北方工业化国家的讨价还价地位大

大加强。在整个的未来十年中，这种趋势也可能会在非洲大陆逐步增强。对于非洲极权主义政府来说，加强独立自主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比之继续依赖别国所需要的代价可能要更为沉重。

从政治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决定国内外政策上能否享有行动上自由的问题。对于一个正在经受重大结构改革的社会来说，这个目标特别显得重要。正如科林·勒古姆在论文中所指出的，对于一个面临着有限的民族统一和易于同邻国爆发严重争端的政府来说，要在独立自主和依附别国之间进行政治上得失权衡会是特别成问题的。追求更充分的独立自主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特征，并且据认为是可以改善经济谈判中的地位。可是，独立自主的赢得又会对政府形成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对于国内需求作出更有效的反应。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由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得不到外国转让武器和军事支持情况下，对邻国发动战争，独立自主可能迫使非洲国家努力改善地区关系。建立相应的国内制度和地方合作，会给非洲国家政府的自由行动带来种种限制，这个事实使得抉择问题复杂化了。只要外界大国对于持续的部族冲突和其他当地政治冲突作出反应，并以此作为捞取本国利益的最好时机，那末政局的稳定和独立自主之间的这种紧张局面似乎将不易于解决。

在独立后的非洲，为数众多的悬而未决的政治争端和南部非洲争取实现黑人多数统治的斗争，会“招致外来干涉”。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政府力图从外界大国获得日益增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外界大国，出于从非洲大陆获得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考虑，也力图对非洲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施加影响。

西方超级大国及其盟国在非洲享有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遏止苏联，不让其在非洲大陆及周围的海洋把自己树立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角色，是美国及西欧的目前利益之所在。它们都希望能确保非洲的战略资源而不致被苏联鼓动的民族政策所破坏。在这方面它们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为了这个目的，它们向非洲的一些重要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与此同时，在那些看来还能提供市场和投资场所的非洲国家，它们在经济利益上还要进行竞争。

最近，苏联在非洲日益显示其战略上的考虑，它建立起海军和空军的基地网，以加强其作为一个新兴海上大国的作用。苏联也有意要抵销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为了实现它的这些战略上和政治上的目标（还有加强其贸易地位），苏联还在非洲竭力鼓励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发展。这就是苏联目前正在干的。如同西方国家支持其代理人那样，苏联向同它们友好的国家提供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援助。在某些情况下，苏联也表示准备向一些非洲国家的反对派政治力量提供类似的支持。

苏联虽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或者强烈的愿望要在非洲进行大规模的发展援助。可是，目前苏联似乎看到，在古巴的帮助下，通过向这个大陆的多事地区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就有可能谋得重大的政治利益。苏联势力的这种集结，如果由于西方国家也以同样的强烈程度在上述地区进行干预而直接对阵的话，那末，不仅会使得和缓与和平解决非洲各派之间的争端的机会受到威胁，而且还可能使得就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的运动受到阻碍，特别是对于控制武器转让所作出的努力。

外界大国在非洲日益加剧的争夺导致常规武器急剧地转

让到非洲，其中有商业性的，也有转让性的。在当地局势动荡和权力分配不均的背景下，要求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会引起安全、秩序和正义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批评目前武器贸易的人们认为，武器的转让会助长当地的军备竞赛，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破坏了地区力量的均势，从而有引起当地战争的风险。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发展中国家从国外购买武器是对本国稀有资源的可悲浪费。可是反对上述观点的人们认为武器的转让可以使那些在本地强国或外国支持的地区强国威胁下的弱小国家得到大力支持，或者使那些发展中国家得到武器装备能够有力量抗拒外界大国的干涉和恫吓，从而有助于纠正地区势力的不平衡。

坚强有力的地区性领导或者协调一致的地区努力也许会阻止武器的扩散。尽管非洲国家领导人普遍表示希望避免发生外国干涉和外国统治的新浪潮。但是，在非洲，没有什么地区力量能够阻止外界对当地纠纷的干预。强大的分裂势力也使地区主义陷入困境。六十年代初期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曾经挺身而出反对外国插手非洲国家内部或地区性的争端。“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些成员国，其中包括坦桑尼亚，曾经就这个问题同苏联和西方国家进行过有力的争辩。换句话说，不干涉的原则早已确立，而且今后还要不断地加强。万一非洲内部出现冲突，甚至其中包含着严重的国际纠纷，“非洲统一组织”也无权采取行动。“非洲统一组织”迄今仍未能施展其权威性的力量来处理矛盾和解决争端。如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这样重要的国家，都仅仅开始巩固自身的政权，并着手建立起有效的地区领导地位。它们作为地区性强国的出现将会带来和平与稳定，还是带来新的竞争、冲突和外国的进一步渗透，目前尚不清楚。为了减少邻

国之间的潜在冲突而加强或者建立地区性机构这一过程，在未来的十年内同民族一体化在建设一个进步和自力更生的社会过程中一样，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但在实现地区和平和限制地区军备竞赛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地区之间的因素，能否克服这些因素，往往要取决于本地区以外的因素。

外界大国在非洲日益加强其争夺政治和军事影响的竞争，可能略为符合于增进人权而不符合于对常规武器的控制。在通常情况下，世界范围对侵犯人权的关注，往往会碰到许多难题，那就是局外者，包括个人、政府和国际组织，如何施加影响才能促使一些政府真正地持久改善个人的待遇。目前谋求采取国际行动以支持人权的人士主要关心的是对人身安全（种族灭绝、酷刑和就地处决）和传统的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严重侵犯。但是，还存有经济权利（有时被标榜为“人类需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保证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足够的营养、住宅、保健和教育）。

强调这类基本需要的人们争辩说，保证或者剥夺这种需要应同传统的民权和政治权利的规定一样，都是国家政策的主题及其执行的结果。当政府因忽视或通过采取有意的政策行为而拒不满足它们所控制领土内的人员的这类基本需要时，那末，他们就是侵犯了人权，如同他们查禁和关押政治反对派人物一样地侵犯了人权。当权利遭到侵犯时，问题仍然是有关的方面如何引导政府去改正自己的行为。

政府没有理由沉醉于对人权的惊人的侵犯之中。正如“八十年代规划”丛书的另一本书上所说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他们害怕会偏离他们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纲

领……或者符合于他们整个社会利益的纲领。”^①因此，外界国家很少有可能在付出很小代价的条件下对此发挥有效的影 响。更多的可能性是同原先“友好”的政府关系突然恶化。

在非洲，如果象乌干达阿明这种残暴政权统治下的受害者，尚且没有任何地区性机构能够挺身而出给予支持，同时在南非还保持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体系，那末，外界国家如何才能促进变革，就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了。

南非的特殊问题

“在非洲，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意识 and 全非洲人民的决心，整个非洲大陆将要从有组织的白人种族主义的凌辱中解放出来并且获得自由。”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经这样写道。到了八十年代，非洲人民的这种决心将集中体现于一个地区：南非。在八十年代的末期，津巴布韦^②和纳米比亚将实现黑人多数统治，相互竞争的黑人派别之间的争端很可能得到解决。在这以后，在南非实现变革的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强。

如何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实现黑人多数统治，对于非洲大陆其余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对南非局势的发展，将会形成一次重大的冲击。如果争取公平政治解决的谈判遭到失败，津巴布韦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将会使黑人统治的非洲国家之间出现紧张关系，而且多半将会使外界大国深

① 见理查德·H·厄尔曼著的《增进全球的人权》一书，美国纽约 麦克格劳—希尔图书公司，一九七九年版。

② 津巴布韦已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宣布独立。——译者

深地卷入敌对政治势力的各方。这种武装冲突也将破坏在南非实现和平变革的可能性。威廉·扎特曼在他的论文结尾所描绘的南部非洲的两种不同发展前景，都充分说明在津巴布韦实现黑人多数统治和南非种族斗争之间的紧密关系。

即使津巴布韦实现了所有政党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在未来的十年中，整个非洲大陆仍然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南非更具有扩大战争的严重危险。在反对非正义和不人道的斗争中，外界大国和国际组织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地方能提出比这里更为尖锐的问题。南非之所以成为“特殊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只有南非才存在着这种非正义和不人道的现象，而且因为只有在南非还存在着独一无二的种族主义体系。在这种体系的统治下，这种非正义和不人道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目前南非急待解决的就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前途问题，这种种族隔离制度也称“分别发展”。也就是说依靠严厉的法律和镇压手段以维持少数白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多数黑人的统治。南非的黑人不仅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而且在各个方面都被看作为一种劣等种族。很显然，对于人身安全、正直和福利的粗暴侵犯是维护法定的种族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多年来，由于南非国内经济情况良好和四周邻国都与其保持友好关系，才使得白人政府忽视种族隔离制度所具有的虚伪性和动摇性。由于南非没有出现持续的内部斗争，这种种族主义制度对人类尊严的侮辱也就被全世界所忽视。随着南部非洲内外形势的变化，那些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策、“内部殖民主义”和破坏基本人权的人们，可能会对南非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有些观察家断言南非现政府已认识到目前面临的重大危机，也认识到即将发生的变革。但是，实现和平变革的时机可能很快即将逝去。南非政府究竟准备走多远并以多大的速度向前推进，目前尚不清楚。因此，外部国家建议采取各种行动作为对南非白人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不但要求白人政府消除其种族歧视制度中极端令人反感的特征，而且要求实现公平地分享政治权力。

仍然寄希望于和平变革的人们已经提出各种建议，包括从单方面表示反对到组织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制裁，目的是力图排斥并进而压垮南非当局。由于苏联及其同伙古巴，可以通过武装黑人“解放力量”并给予支持来影响南非的局势，西方工业化国家就必须作出抉择，是否试图施加压力以实现和平变革，因为西方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联系足以对南非白人及其政权施加影响。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上是否能出现足够的舆论一致仍有待于观察。非洲以外和非洲内部的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还有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都同南非有着重要的经济联系，如果对南非强行经济制裁，那末这些国家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为了争取因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而在短期内付出最高代价的那些国家的支持，可能需要就“分摊负担”进行某种国际上的安排。可是，这方面尚无先例。也没有采取大规模国际行动的政治愿望的表现。为了对顽固的白人政权给以有力的冲击，看来有必要采取大规模的国际行动。

人们常常认为，对白人政府施加压力以谋求实现变革，只能导致白人的暂时屈服。然而，走向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的运动不能永远回避在南非保持的种族主义和政治迫害这个现实。这点看来是很清楚的。南非总是要变革的，不论是通

过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而且外界大国总是要被卷入的。这种外界大国的卷入不仅会影响兴起的民族国家的性质，而且也会影响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非洲国家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今后多年的关系。

发展资源的调度

南部非洲和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政治斗争正在不断地增强外界大国对非洲事务的卷入，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问题也正在推动非洲国家寻求同外国经济联系的新方式。对于经济前途获得更大控制和对于经济活动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这种企图已经使非洲国家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以推动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同北方工业化国家在援助、贸易和投资上的彼此关系，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处理中争取较大的发言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得要求享有特别的贸易优惠待遇，要求建立资助一系列国际商品协议的“共同基金”，增加获得工业技术的机会和按照优厚的条件增加援助。

虽然本书中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研究论文是以不同的分析方法作为基础的，可是他们都得出同样的结论：目前必须采取南北会谈中心以外的其他措施，以推动非洲的快速和平发展。他们都建议，为了克服非洲的贫穷与不发达，大多数国家都必须在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的项目方面作出一定的改革。作者扎特曼指出，在今后的十年到十五年之内，少数非洲国家能够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将面临重大的潜在危机，其中包括长期严重缺粮。这种危机只有改变强调“花钱最多的”工业发展的方针才能得以克服。

近几年来，在发展中世界的内外都一直在开展关于发展新方针的辩论。许多发展中的国家在获得空前速度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持久的或者日益严重的贫困化，越来越多的这类迹象使得这场辩论更为活跃了。由于采取“细水长流方式”^①的效果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因此，新的发展策略主张实现“均衡地增长”或者“经济增长的再分配”。

这种新的发展途径建议的核心就是关于在不同部门、地区和个人之间“纠正不平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资金的分配上转变为有利于农业和农村贫农（在发展中国家里，农村的贫农往往占其总人口的80%左右），其中还包括为了增加生产性就业而采取的措施。在那些绝大多数居民从事耕种土地，或者从事于非正规的经济部门的劳动而不是从事于挣工资劳动的社会里，实行这种新的措施就意味着不仅要注意增加就业，而且还要注意通过平等地获得教育、土地、信贷和其他资产方面的机会，以增进人们争取更加合理收入的机会。作出这番努力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新的收益分配，从而提高穷苦人民的需求和购买力。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还提出另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向每个发展中社会里一部分被剥夺的群众，直接提供基本物资（诸如食品、住房和医药）以及其他服务性项目（包括供应清洁饮水、排放污水设施和教育）。

尽管在一项新的、更加平等和更加扎实的增长的策略的基本内容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广泛的一致，但是，对于均衡地

^① “细水长流方式”，国家资金分配到各个组织再投入国家经济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种方式名之为“细水长流方式”。——译者

增长是属于一种内在发展策略还是属于外向发展策略^①，在看法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本书的第二篇和第三篇论文的作者在这点上也有分歧。从他们彼此相反的结论中可以看出：对于什么力量在阻碍着变革和什么是变革力量持有不同的观点。

扎特曼认为非洲发展中的主要障碍就是用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社会需要的可用的资源的奇缺。处理稀有的自然资源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对政府所抱的期望同执政当局能够向个人福利、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方面提供的好处，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又加重了建设持久的政治机构的困难。扎特曼在他的研究论文中提出，在资源缺乏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将寄希望于按照改进的条款从加速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收益。

兰登和默特尔卡则认为，使非洲社会陷于“不发达状态”，与其说是缺乏资源，不如说是有什么利益集团在控制非洲资源的使用。他们争辩说非洲经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依附阻碍着非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控制非洲当地的现代化经济部门的跨国公司，能够以它们的最大的利益的方式来利用非洲的自然资源，从而使非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由于跨国公司的利益同非洲东道国少数经济界上层人士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势力破坏了非洲经济发展的进程。取代进口的工业化政策和地区一体化有限努力的政策，都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作为加速经济增长的几项措施，但也加强了跨国公司在非洲的地位。这些政策还使得来自于对外国经济依

^① 外向发展策略，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鼓励自由贸易、资本、工人的自由流动，欢迎跨国公司投资等等开放的政策。——译者

附的内部结构中的阻碍发展的因素有所加强。这些政策既未减少社会上的贫富不均，又没能奠定自力更生发展的基础。上述的两位作者解释说，不论是已经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妥的，还是正在“南北对话”中正在商谈的那种特别贸易和援助的安排，均不足以打破促使多数非洲国家陷入不发达的恶性循环。兰登和默特尔卡指出，真正问题是涉及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进行生产。

兰登和默特尔卡都对于国际经济结构能否发生广泛变革持有怀疑，并对于任何变革在经济前景上产生的影响也持谨慎的态度。因此，他们的结论是，由于不发达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将迫使非洲国家采取自力更生的发展策略。总之，他们提出的上述这些压力将会迫使非洲国家断绝同国际经济体系的联系。他们把来自不发达社会内部的这种要求变革的压力，看成是对阻挡变革的一种反应，而这种阻力又是来自非洲经济上的“国际化”。

人们可能会问道：非洲国家选择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如何？作出这种选择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自守的同义词。一种内向发展策略势必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将国内的物质资源和政治力量都能调动起来。正如上面所说的，这种战略往往要求在非洲范围内大大改善邻国之间的关系。科林·勒古姆在本书第一篇论文中所描绘的深刻的种族裂痕和外界大国对非洲地区兴趣的加强，再加上扎特曼在第二篇论文中所估计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所指望的国家资源的贫乏，都将在未来的十年内妨碍着非洲国家在自力更生方面取得更加重大的进展。

直到现在还很难从外向发展策略中发现促使变革的力量，这种变革将会产生经济增长收益的分配更加公平。在国

际范围内，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集体议价”可能会导致某些国家的收益以及这些国家的某些人民的收益有所增加。非洲国家是否将会得到与第三世界的某些较先进国家所获得那样多的收益，而且这么少的收益是否会对最穷国家的最穷的人民产生积极的影响，都还是不太清楚。对于非洲石油输出国来说，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资源的转换是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价格作用得以实现的。对于一些原料输出国，包括盛产铜矿的扎伊尔，一项国际“缓冲库存”^①计划可能使这些国家获得较稳定的出口收益。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需要的是向农业多种经营和其他发展工作中不断投入的大量资金，而不单单是为基础良好的原料出口设立的“价格稳定计划”，这些国家也不是这些原料主要生产国。由于没有几个非洲国家拥有足够的经济地位可以向私人资本方面筹借大量资金，也缺乏必要的财力来解决日益增加的国际债务。这就说明非洲经济特别需要通过技术援助和按照改善的优惠条件的资金输入这两种形式的外国援助。

非洲国家的这些特殊问题早在1977年秋天就已经十分清楚了。当时关于建立“稳定出口商品价格共同基金”的谈判已经拖延了，部分是由于南方发展中国家中的非洲国家集团竭力要求将上述基金的作用加以扩大，除了向“缓冲库存”提供资金以外，还得向各种发展项目普遍提供资助。非洲国

^① “缓冲库存”，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商品综合方案”的主要内容。办法是以现金和实物的形式，把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影响较大的多种初级商品储存起来，当这些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跌到规定的最低水平时，储存机构就以现金购入这些产品，使价格回升；而当价格上涨到规定的最高水平时，储存机构就抛售这种产品，使价格跌回到规定的范围以内。其主要目的是稳定初级产品的价格和保证正常供应和销路。——译者

家由于认识到他们从谈判“缓冲库存”中得益甚少，因此，他们认为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关于上述基金的建议，除了允许用于稳定市场以外，还可以用于其他活动。那末，这项建议所需要的共同基金远远超过北方国家所准备支持的数额，从而谈判遂告破裂。要使一项商品基金从计划到实施都能为南北双方的国家所接受，这在1977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非洲国家在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的较狭范围谈判中，曾经在若干经济问题上取得了比较重要的进展。最近，“欧洲经济共同体”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举行的“洛美协定”的谈判中就达成了一些协议，其中包括改善条件以便于许多来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产品进入西欧国家的市场。还有将出口收益稳定计划的稳定贷款改为向连年出口收益下降的最穷国家的赠款。非洲国家从出口收益稳定计划、援助以及其产品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等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也在民族独立和行动自由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例如，出口收益稳定计划对于这些国家进一步加工比出口更优先的商品是具有抑制性作用的。“洛美协定”所包含的便利商品进入市场的规定，是为了保证“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可以比他们的美国和日本竞争对手享有创建企业的优先权利。此外，那些旨在增加非洲国家外汇收入的种种措施，对于现有的形成长期普遍贫困的发展政策是进一步的加强而不是加以改革。

在独立自主和互相依附之间有着许多利害上的权衡。本书的几篇论文已对此作了阐述。这方面的考虑说明贫困和内部不平等所产生的压力，能否推动非洲国家摆脱外向发展策略而转向于自力更生，这可能要取决于在消灭世界范围的贫困的必要性上能否达成国际舆论的一致。从而也就是取决于

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经济模式是否改变。北方工业化国家同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很难设想上述观点会取得优势。北方工业化国家建议成立国际发展援助来帮助许多国家，以满足其基本需要。南方发展中国家对于来自北方工业化国家这种建议表示怀疑。在南方发展中国家看来，北方工业化国家的这个建议是企图转移人们对于改组国际经济体制的注意。此外，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发言人争辩说，应该让各个国家自行决定各自的优先发展项目。

虽然如此，粮食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和全球性贫困的中心点，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由于饥荒是贫困的结果，而贫困又是不发达或者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把世界性的饥荒看成是贫穷的表现必然会引起人们更加重视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对粮食不足和饥荒等问题的注视说明国际发展纲领改革和革新的必要性。发展一向被确认为是在国外引进资金的推动下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当人们的注意力从上述发展定义转变为将发展视为均衡地增长时，强调的重点将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和新的发展合作形式，这种形式既符合于广泛的需要，又是在发展中国家倡议下建立起来的。

革新援助形式的尝试目前正在非洲最穷困的萨赫勒地区^①进行。七十年代中期，饥荒曾经席卷了这个处于非洲大陆中心的地带。正是在这种毁灭性饥荒的刺激下，萨赫勒地区各国政府同一些有关的多边和双边的援助赠与组织联合成

^① 萨赫勒地区，指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边缘地带，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横跨非洲中北部，直到西海岸的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共包括十九个国家。——译者

立一个“萨赫勒俱乐部”，发动了一项面向行动的发展计划。

“萨赫勒俱乐部”的目的、活动的时间表和活动的方式都有其明显的特色。“萨赫勒俱乐部”的目的就是综合当地的和国家的资金以求实现一个首要的目标：粮食自给。“萨赫勒发展计划”规定二十年内实现上述目标。而这项发展计划又是以多方面工作组制定的协调行动纲领作为基础的。每个工作组都由一名萨赫勒人领导，并由赠与国和受援国的代表参加组成。

还要指出，目前萨赫勒的这个工作是在一种分散的地区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是一种地理的范围。扎特曼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形式将会成为非洲国家之间联系的主要模式，并且将要作为同北方工业化国家进行重要谈判的一个等级。“萨赫勒俱乐部”可能成为其他地区联合执行长期地区发展纲领的榜样，八十年代是否会给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重大的改善，或者会带来萨赫勒式试验工作所要求的国际发展援助的扩大和协调，目前尚远远无法看清楚。

这篇绪论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显然没有一个是专门涉及非洲而与其他发展地区毫不相关的。但是，本书所论述的潜在危机将严重地影响非洲的未来，因此，寻求如何解决这类危机的方式就将成为非洲国家和国际组织当前的一项迫切的大事。

第一篇

非洲的社会冲突和国际干涉

科林·勒古姆

导言

到目前为止，非洲还没有出现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今天非洲大陆的政治体制正处于向着民族国家发展，或者可能遭到失败的不同阶段。在五十多个非洲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已经达到全体属于同一种族的程度，只有在属于同一种族的情况下，才能促进民族一体化而又不致引起冲突。仅有埃及、突尼斯、摩洛哥、莱索托和索马里可能算作例外。其余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特点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裂痕。

从历史阶段上看，目前的非洲相当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动荡和变革的时期。更有甚者，同世界其他大洲相比，非洲在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非洲，形成民族的过程也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和更加混乱。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非洲，大多数国家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制度上充满了挫折、混乱和实验，这些都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普遍现象，而且在八十年代这种情况还将延续下去。

所有上述因素告诉人们，非洲目前正处于极大困难和具

有爆炸性的发展阶段。在未来的八十年代，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内部争执和彼此仇视的邻国之间的争吵都有可能爆发成为激烈冲突，正如这些国家在欧洲殖民者撤退后的这段时期内所发生过的情况那样，尽管“非洲统一组织”在这方面作出多大的努力，也全都无济于事。非洲国家的这类冲突不仅影响直接有关的地区和国家，在许多情况下，还会招致外国的干涉。当然，这并不是说非洲将成为大国的国际政治的消极牺牲品。相反，非洲国家内部的各种派别也都积极地寻求国外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加强其本身的虚弱地位。外界大国，特别是苏联，在其认定有利可图时，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尽管苏联同美国之间如果实现真正的缓和，可能会减轻目前存在的外界对非洲竞相干预的强烈动机，其中也包括阿拉伯国家要求抗拒苏联在非洲之角的势力扩张。但是，其他方面的动机可能仍然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例如对原料的争夺和中苏的对峙。简言之，八十年代非洲的前景仍然是趋向于地区冲突的进一步国际化。

第一章

在向民族国家演变过程中的分裂和融合

重建合法地位

所有非洲国家的政权基本上都是临时性的或者过渡性的。因为，这些国家政权，即使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也不是在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有效政治制度下确立的体制范围内进行统治活动的，只有很少几个国家属于例外。有些政权，即使在开始时已取得较高程度的合法地位和声望，但也会在五年到十年的暂短时期内丧失其群众基础，从而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政权，失去了它们的合法地位。这些国家的继任政权就必须完全重新开始为其自身谋求合法的地位。非洲的这种“重建合法地位”的持续过程同世界上已经建立完善政治制度的地区有着重大的区别。在这些地区，国家政权的转移是不会引起重大的动乱的。在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中，伴随着国家政权更替而引起动乱也是目前非洲政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社会政治和部族因素

对于非洲的古老社会冲突，每个殖民国家，因拥有权力集中的机构而都能加以控制，但是它们也无法加以解决。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阶段，特别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初期，社会政治的动乱又重新爆发了，这是因为继任的政权或者统治

当局比原来的殖民统治者更加软弱了。这种新的社会政治中的紧张局面又基本上是与新独立国家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从而更加削弱了政府的权力。

在非洲的一些国家里，强大的部族往往认为建立民族国家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要求建立以部族占统治地位的新的国家。因此，社会冲突就必然更加激烈。建立民族国家与建立部族国家这两种要求的冲突是独立后非洲国家局势中的一个主要方面。虽然可能会出现少数以部族为主的国家，但是，在非洲，支持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并未见减弱（至少在未来的八十年代是如此的）。这个论断可以从尼日利亚和苏丹两个国家的事例中得到证明。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曾经由于要求建立部族国家而经历了惨痛的内战。但是，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原则一直是坚持不变的。当然，从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统治的历史，也可能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但是，两千年以前就作为一个扩张的帝国而出现的埃塞俄比亚，在非洲毕竟是具有其独特性的。

作为一种破坏力量，“部族因素”如何削弱了形成中民族国家的权力，只有在“部族主义”这个一般原则之下，将各种不同的因素进行严格的分类，然后才能正确地对其作用做出适当的评价。所有民族的形成都经历四个阶段：氏族、部族、亚民族或地区集团、民族集团或民族。当早期的氏族集团、部族主义或地区集团不再存在共同利害关系时，就很少会出现扩大到“民族”的阶段。

氏族 在许多非洲国家，氏族是以同一家族的村庄或游牧社会结成小集团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虽然他们操着相同的语言，享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更大的具有集中权力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在过去年代，对于

民族的强烈的忠诚抗拒着将氏族同扩大的对部族的忠诚溶为一体，更不容说对民族的忠诚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只有当同一家族的氏族遭受共同外来势力的威胁时，氏族之间才进行合作。苏格兰的氏族制度就是现在非洲许多地方仍然保持的氏族制度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即使在英国统治的威胁下，苏格兰的氏族也不会团结一致，以反抗外来侵略者。事实上有些氏族还同外国人进行勾结，以此作为一种手段，以加强同别的氏族的竞争力量。尼日利亚的伊博族民族集团存在着的氏族体系就是当代最好的例证。尽管尼日利亚民族主义日益向着现代化发展，尽管这种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来自伊博族领导人自身，氏族感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保留下来。在企图建立“比夫拉共和国”^①的斗争中，这种氏族感情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在索马里，现代民族主义成功地使各个氏族对一个集中目标表示忠诚，而又不完全破坏其对氏族的强烈忠诚。

部族 部族代表着氏族体系发展到更高的政治阶段，并通过部族权威形成一个更加集中的权力体系。虽然在整个非洲共有数以千计部族，但是就其规模和内部联合的情况来看又各有不同。有的不超过十万人；有的总人数上百万。有些较大的部族，如纳米比亚的奥万博族，系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而缺乏一个有效的集中权力机构。其他的部族，如肯尼亚的吉库尤族，仍然坚持对氏族的忠诚，但到了

^① “比夫拉共和国”，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在尼日利亚以东区军事长官奥朱古为首的伊博族统治集团，宣布脱离尼日利亚联邦而成立的独立共和国。同年七月，以戈翁为首的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向“比夫拉”发动军事进攻，至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打败了“比夫拉”而结束内战。“比夫拉共和国”也即消失。——译者

紧急时刻（如在反英的“茅茅”起义运动中），或者为了提高共同部族利益时（如支持以吉库尤族为主的政府），却能在一个中央领导下联合起来。不过，当面临着推选一个中央领导人时，吉库尤族内部的斗争便激烈起来。在肯雅塔总统继承人问题上的长期争执便足以说明这点。肯雅塔所属的基安博氏族坚持应提名由他们氏族的人来担任而反对由其他氏族提名总统的要求。

亚民族集团 这里的亚民族集团系指不同部族在政治联合进程中已达到的一个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内，不同部族已经实现一定水平的一体化，并在一个大地区内享有共同目标。关于亚民族集团的一个有趣的事例就是加纳境内阿散蒂的阿肯族和布朗阿哈福族。在独立前的权力斗争中，他们感到自身原有的统治地位受到恩克鲁玛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大会党”的威胁，于是他们在古老的阿散蒂联盟的基础上集结起来，并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在上述的这场斗争中，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坚持反对立场，并使得恩克鲁玛的权力大大削弱。一九六六年，恩克鲁玛总统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接着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布西亚短命政府的统治下，阿肯族建立了统治地位。上述发展的结果便是激发了加纳埃维族的种族的民族主义和统一主义，从而产生了希望建立埃维族种族国家的强烈要求。

民族集团 民族集团系指氏族、部族和亚民族集团经过一体化而成为明显的民族。在人数、居住地区和共同文化方面都配得上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准。

如果考察一下尼日利亚的目前情况，这种不同阶段的重大区别就会显得更加清楚。在尼日利亚，你可以看到仍然坚持古老的氏族体系的小型社会；也可以看到一些部族，他们

坚决反对形成民族集团的一体化。在尼日利亚，这类的民族集团有豪萨-富拉尼族（可能有二千万人口）、约鲁巴族（约一千二百万人）和伊博族（八百万人左右）。氏族和部族都认为自己居于少数地位，竭力要维护本身的利益，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民族集团。与此同时，这类氏族和部族又都在本地区展开争夺权利的斗争。至于那些民族集团，一方面它们总是竭力想对同他们杂居在一起的少数部族实行统治；另一方面，为了控制中央权力，它们之间也展开激烈的争夺。尼日利亚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居于少数地位的部族也数目繁多，只要看看尼日利亚的实际情况，就可以体会到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走向联邦政体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虽然，就一个国家之内的社会冲突来说，尼日利亚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对于非洲大陆其余国家的社会复杂情况来说，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用的图景。

日益现代化的上层人士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在非洲，现代化的进程过去曾经是，将来也会是促使狭隘的利益和忠诚转变成为更加广泛的忠诚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更加广泛的忠诚是实现民族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民族一体化的动力系来自日益现代化的上层人士。在殖民时代，这些上层人士都是作为主要的政治力量而出现在非洲的每个国家（斯威士兰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从来未在任何地方遭到过严重的思想上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的唯一冲突，就是有人主张通过更改独立时期划定的边界而建立另外一个民族国家，以满足某些好斗的部族成立自己国家的要求。尽管对于民族一体化的理想一般都愿意接受；但是，为了完成这个理想而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却是非

常艰巨的。比如建立实际可行的制度和新的体系，这种制度和体系要求能赢得个人与各个集团的拥护和合作，并且在执行当中，不会出现更多的动乱，以致超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程度。

在非洲政治形势的目前阶段中，共有三项主要目标：民族一体化，经济发展和保卫新成立的国家免受国内外攻击的威胁。上述第三项目标的一部分（如国内秩序）又是同第一项和第二项目标密切相关。而这个目标的另一部分（免遭外来攻击）又是与本文下面将要讨论的许多问题有联系。例如“非洲统一组织”的作用问题；非洲邻近国家冲突的类型问题以及非洲冲突国际化问题等等。

上述的头两项目标，民族一体化和经济发展又是彼此密切相关，因为这两项目标都要求进一步提高对于民族共同利益的意识。经济增长的成功与失败不只看经济增长的程度而且要看其成果是否分配合理。也就是在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中，更多的财富和新的机会是否给予了那些受过较高教育和工作更好的人（特别是那些待遇高并享有特权的工作）。如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代表某一个社会、地区或者经济利益集团享有优厚待遇而其他的社会、地区或经济利益集团遭到忽视，则社会矛盾就会日趋紧张。即使整个经济增长还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缓慢，主张现代化人士所许诺的经济和社会的效益都将无法兑现。社会矛盾同样地也会加剧。由于新成立的国家政权过于软弱，根本无法处理这类社会矛盾，新上台的统治者为了保住自身都在不同程度上求助于武力。

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还会出现各种动乱的势力，例如各个带有社会和地方色彩的集团。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展

开露骨的斗争。他们又都力图控制国家权力机器，以便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更多的地位和特权。而这种争夺又总是产生于新兴的利益集团与新兴的阶级之间，有时也发生于强大的部族之间，或者发生于新兴的势力与那些一心要保持原有的统治地位的这部分人之间。这类冲突经常带有各种社会的或地方的特点。因为非洲的政治单位主要是按部族或地区自然构成的，正如当年美国是以州、地区和种族集团作为构成单位一样。

如果将非洲国家在形成民族国家这个阶段中的政治描写成“部族竞争”，那就是肤浅之见而往往会陷入误解。因为在非洲国家内的一些集团之间，甚至一些阶级之间的争夺权力的复杂较量中，部族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有许多强大的部族，其本身就包含着各种对抗的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积极投身于政治斗争的部族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形势也是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现代化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如果要想对非洲政治发展的模式进行适当的分析，那么，就要求既要重视横的方面（超越部族之上）也要重视纵的方面（部族的本身）。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但是，甚至在阶级正式形成以前，你可以看到由特殊集团或派别利益组成的联盟就已经在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在少数国家，一个单独的部族就能统治所有其他的部族，这样，在部族的对抗集团之间就会产生政治联盟。一个部族之内也会产生新的利益集团，并同其他部族内享有共同利益的集团结成政治联盟。

仅举出两个事例就足以证明，为什么过分强调“部族政治”这个观点就会陷入误解。在肯尼亚，肯雅塔成功地使吉

库尤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部族力量”。可是在争当肯雅塔继承人的斗争中，吉库尤族内部各氏族与一些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和吉库尤族与其他部族之间的分歧都是同样地突出。某些想当总统的吉库尤族人感到有必要谋取吉库尤族以外的支持，同样，某些想当总统的非吉库尤族人也竭力从吉库尤族内寻求支持。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政治体系，这种新的政治体系使得肯雅塔建立的狭隘的吉库尤族占统治地位的模式变得更加模糊了。

另一个例子就是目前津巴布韦政治领导人之间出现的政治斗争。通常都把现阶段的津巴布韦政治描述为肖纳族同恩德贝莱族这两大部族之间的冲突。津巴布韦民族解放军内部的互相残杀的火并大多数产生于肖纳族内部的各个氏族之间；可是，同一部族的这些分支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严格的，而且是互相交错的。此外，穆佐雷瓦主教和恩科莫这两个争夺政权的对手，都得到各自部族集团的重要人士的支持。对政治形势进行更加综合性的分析就可以避免在论述政治局势发展中由于过份强调“部族”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在评定一个政治家的选区选民是否重要时，部族无疑地会是很重要的，但是，单靠部族本身来支持他或维持他的政权就远远不够了。

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是两个互相冲突的力量，这也是非洲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一种现实。忽视这点就会忽略在八十年代可以预见局势中的一项重要因素。非洲政治远比西方人士错误理解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他们的这种误解完全是由于西方报刊歪曲宣传所造成的。

激烈的社会冲突

当非洲国家内的反对派集团觉察到有可能被排斥于政治体系之外时，或者当他们害怕会被一个主要社会集团所统治时，或者当他们由于本地区遭到忽视而深感痛苦时，争夺权力的斗争就会趋于激烈。一旦上述反对派集团自认为羽毛已丰，足以进行反抗或者是认为有可能取得外部支援时，动乱就会很快爆发。如果受到威胁的中央政府能够采取和解的方式，也可能使反对派稍为和缓，并使得新生的民族国家进入接近于现实的阶段。

例如在苏丹，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南部的黑人在放弃了拜物教之后，宁愿信奉基督教而不愿加入伊斯兰教。一九五六年，他们掀起的暴乱一直延续了十五年之久，使得分离主义的思想在这个地区有了强烈的发展。因为他们感到独立后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他们没有获得适当的地位。他们宣称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在“北方阿拉伯穆斯林”的控制之下。虽然在这场“争取解放南方的战争”中，南方的黑人并没有完全团结起来，当地的社会集团内部仍然在相互倾轧，但是，斗争的结果是南方人获得了可以接受的联邦制度（在苏丹南部，虽然都属于尼罗特族，但他们中间缺乏一种严格的部族联系，占统治地位的丁卡族本身就已经分裂成为一个活跃的氏族体系）。更为引人注目的发展是苏丹南方人把原来敌视的喀土穆当作他们向往的中心。因为尼迈里总统更改了历来统治者的政策，对于他们采取了一种安抚的政策。

苏丹南方人的这种态度上的转变表现为一九七五年他们支持喀土穆政府平定了另一次武装暴乱。这次暴乱的起因来自苏丹西部地区的北方穆斯林的不同政见运动。他们之所

以叛乱，是由于该地区的发展、教育和卫生等方面长期遭到政府忽视而深感痛恨所激起的。尼迈里的反对派抓住这点竭力想搞成一次军事政变。

在苏丹这两次社会冲突中，叛乱力量都得到了外部支持。苏丹南方人可以利用邻国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扎伊尔给予的支持，如救济难民，支持他们的秘密组织。他们也取得以色列的支持，因为苏丹很敌视这个犹太国家。他们还从欧洲的基督教教会中获得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支援。在苏丹西部的叛乱中，叛变力量的支持大部来自邻国利比亚。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非常敌视苏丹领导人，因此，尼迈里在平定西部地区叛乱的斗争中得到友好的埃及的背后支持。

与苏丹相类似的情况在另一次社会冲突中可以看到，那就是尼日利亚的内战（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这次内战的起因是因为伊博族企图分离出来另行建立一个他们占统治地位的部族国家“比夫拉”。这次冲突发展为基督教徒的伊博族、穆斯林的豪萨族和基督徒、穆斯林的约鲁巴族之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以伊博族的野心遭到严重挫败而告终。伊博族一直害怕遭受北部豪萨族的统治。当居住在北部的伊博族遭到大规模屠杀后，这种害怕演变成仇恨和分离主义情绪。从北部的豪萨族来说，他们也认为受到了伊博族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威胁。第三个民族集团约鲁巴族，在伊博族宣布建立部族国家之后便立即同豪萨族站在一边，虽然他们也反对豪萨族的政治领导。被迫走向分离的伊博族领导人曾是当代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创始人，而当时的豪萨族和约鲁巴族却是强烈地支持建立部族国家的。回忆这段事实是很有趣的。一旦尼日利亚面临崩溃时，正是上述这两股力量联合一致反对分离主义者。

尼日利亚和苏丹的内战，尽管都充满血腥，但都以宪法上取得和解而告结束。这样就阻止了分离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也为非洲的未来发展指出了重要的方向。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社会冲突的例子就是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双重种族灭绝”事件（这场冲突迄今尚未完全解决）。这个事件开始于一九五八年，当时仍在比利时统治下的卢旺达，在人数上占多数的胡图族发动起义反对少数部族图西族的封建王国统治。原来在邻国布隆迪也存在着同样的图西族封建王国，但是这个封建王国却给予其少数部族胡图族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作用，而卢旺达多数部族胡图族却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两国之间出现这种不平等系来源于一种奴役制度，而且已经延续了许多世纪。尽管比利时和德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过长期统治，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意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在现代化发展和政治独立日益临近的情况下，胡图族奋起斗争，解放了自己。在卢旺达的胡图族在残杀成千上万的图西族并把其余的幸存者赶入邻国之后而获得了胜利。卢旺达发生的这次事件肯定会使布隆迪的图西族更加坚强地防守，保住其古老的特权地位和处于威胁中的安全。胡图族在最近的十五年中进行了三次尝试，企图使他们在卢旺达的胜利能在布隆迪重现。为了对此作出反应，布隆迪的图西族同样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在这场社会冲突中，双方都犯有暴行。布隆迪的形势仍处于悬而未决的危险之中。

另一个未解决的社会冲突发生在乍得。在这儿，部族和地区占有优势的情况同邻国苏丹正好相反。独立后，占多数的南方黑人，主要是基督教和拜物教，控制着中央政府和执政党。他们集中力量使南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大力发

展。同时对于主要为穆斯林的民族和部族居住的落后的北部地区却加以忽视。于是在乍得的北部出现了几个叛乱组织，其中最强大的是“乍得民族解放阵线”。象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的分离主义者一样，他们也利用“受压迫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个思想以赢得阿拉伯人的支持。利比亚立即答应给予支持。见此情况，法国政府也给予当时的乍得政府以强大的军事支持。经过十多年的武装斗争以后，叛乱组织仍然坚持战斗，而乍得的中央政权却不断遭到削弱^①。但是和已经提到过的一些社会冲突相反，“乍得民族解放阵线”从未提出分离主义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乍得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都是主张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由于利比亚利用支持“乍得民族解放阵线”的机会而从乍得攫夺一大块领土，从而使得这种局势更加复杂化了。

新独立国家的人权

纵观历史，在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中，可以看到两种相互冲突的发展：某些范围内自由权利的扩大（例如更大的社会流动性，更易于获得权力，更多的经济上和教育方面的机遇）；可是在其他方面，自由权利又遭到剥夺（特别是出版自由，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和不受限制的政治活动的权利）。当然要记住，在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洲，上述的这些政治权利是根本不存在的。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并未进入新的自由时代。尽管某些政治权利遭到了剥夺，但较之殖民统治时期，毕竟有了更多的非洲人参与国家大事。即使在一党制的统治之下。

^① 原乍得的马卢姆政府已于一九七九年垮台。——译者

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可能不超过六个国家是属于真正的“封闭社会”，例如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中非、阿明统治下的乌干达和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其余大多数国家，按照西方的标准，也无法称之为“开放社会”。其中的大部分国家又都由于政治斗争和公开分歧而不断地发生动荡。各种不同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想的相互影响，向统治当局经常提出的挑战和对于各种不得人心的领导人和法律的反抗，所有这些都加剧非洲国家政治局势的动荡。而这种局势的动荡又正是目前非洲的主要现实。

第二章

“非洲统一组织”处理激烈冲突的作用

历史上第一个全非洲性运动“非洲统一组织”之所以会在非洲兴起，其原因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第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只有非洲这个大陆仍然全部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这就是说，非洲的独立是在具有现代思想的非洲上层人士领导下取得的。这些上层人士都共同遭受过殖民主义的统治，并接受过同样的教育。第二，“黑人”因素使得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具有全非洲的意义，并在全世界大部分有色人种当中激起了广泛的联盟。从十九世纪后期起，在泛非主义的思想 and 感情的抚育下，这种黑人团结的意识有了发展。这种泛非主义思想大部分来自流亡在外的黑人。第三，“非洲统一组织”代表着对于殖民统治末期在非洲存在着的巴尔干化^①条件的一种实际的反应。当时非洲独立国家领导人都继承了许多敏感的边界问题，这些边界问题又都是十九世纪殖民者“抢夺非洲”过程中临时强行划定的边界而造成的。因此，确实需要一个组织来稳定非洲大陆的新的政治体系。第四，民族主义上层人士懂得，政治合作可以为发展现代化经济和防止

^① 巴尔干化，是帝国主义为了推行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把某一个地区分裂成若干个互相对立的小地区，使其互相牵制，以便从中取利，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强国对巴尔干半岛各国那样的做法。——译者

非洲继续成为外国榨取原料场所而带来最好的希望。因此，“非洲统一组织”倡议地区性和专业性组织都应处于整个大陆的监督下。例如：“非洲发展银行”、“全非公路委员会”、“全非咖啡组织”以及四十个以上的贸易、银行、通讯和训练团体；这些组织都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相联系。最后，“非洲统一组织”的创始人都抱着希望在整个非洲大陆实现非殖民化这个共同的目的，通常称之为未完成的革命。而这方面的最顽强的挑战却是来自南部非洲白人统治的地区。

“非洲统一组织”从其创建之始就带有所有国际组织所固有的那种局限性。这些国际组织大都不是处于一个坚强集中的权力控制之下。这些组织都只有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对有些问题进行有效的处理。强制执行简单多数意见的任何企图都会威胁到这些组织的命运。因为保持团结的本身就被看成是事关重大的。因此，对于成员国之间或者某一个成员国内部发生的冲突，“非洲统一组织”进行干预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每年一次的首脑会议是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对于这个最高权力机关所作出的决议，“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并未保证一定要加以执行。如同联合国大会那样，这个机构的决议只具有一种建议的性质。当然，如果某项建议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国的支持，那末，少数持异议的成员国就会感到一种严重的约束，以免与大多数非洲国家形成公开的对立。“非洲统一组织”的原则中曾规定成员国不得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尽管这项原则经常遭到破坏（正如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干涉别国内政的事例所证明的），但是，这项原则仍然被看成是一种重

要的制约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遭受外来干涉的国家来说，“非洲统一组织”给予了一个有力的机会，使其能向“非洲统一组织”吁请支持。而“非洲统一组织”在这方面的任务常常是对控诉者进行有力的支持。

“非洲统一组织”的另一项原则规定，所有成员国都应承认独立时已确定的边界，并且避免对边界作重大的变更。已经设立专门机构，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协商、调停以及和解的方式以谋求边界的调整。由于边界冲突中的种种潜在的因素，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事实上，边界冲突还是比较少的。大多数边界争端（例如上沃尔特同马里，坦桑尼亚同马拉维，尼日利亚同喀麦隆），都是不经过武力而得到了解决，即使有些边界争端仍未最终解决，但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的外交活动也能保持在一定的缓和状态。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当边界冲突已爆发成武装的敌对行动时（例如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关于西撒哈拉边界的冲突和六十年代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关于欧加登的冲突），“非洲统一组织”的调解也可以很快地制止战争。民族统一主义仍然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例如加纳和多哥关于埃维族要求“重新统一”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大索马里思想的问题（关于1977年欧加登的激烈冲突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非洲统一组织”处理危机的能力不仅在边界争端中经受考验，这种边界争端由于扩张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加剧而日趋激烈，而且也在其他类型的冲突中经受考验。例如内战，至少与一个超级大国的重大利益有关的各种争端和越境武装颠覆等等。因为这类情况将在八十年代有所增加，所以，对于“非洲统一组织”这个强有力的地区组织在未来的冲突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有理由要求给予特别的重视。

四种类型激烈冲突的例证

内 战 “非洲统一组织”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并未表明要制止成员国在别国的内战情况下采取自己的立场，但是它们应主动支持成员国政府。例如，在尼日利亚的内战中，当伊博族企图建立分裂主义的“比夫拉共和国”时，“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应对联邦制度给予全力支持。虽然有六个以上的成员国事实上是支持“比夫拉”政府的，但是都没有承认这个“比夫拉共和国”。正是这个时候，“非洲统一组织”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是组织力量支持尼日利亚的联邦军政府。正是这样的一种地位使得“非洲统一组织”无法发挥其调解人的积极作用。同样地，在布隆迪爆发的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大规模仇杀^①中，“非洲统一组织”的作用完全陷于瘫痪。安哥拉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内战爆发时，合法的政府尚未建立。因此，“非洲统一组织”采取的坚定的立场是：对于三个争夺政权的政治派别给予同等的承认。只是由于外来干涉，特别是苏联和古巴支持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而南非和西方国家则支持“安哥拉彻底解放全国联盟”（简称“安盟”）和“安哥拉解放民族阵线”（简称“解阵”）。主要是由于南非进行了反对“人运”的干涉，才使得“非洲统一组织”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国家转而支持承认“人运”。

扩张主义的民族主义 有两个关键性的例证足以说明非洲的这个特殊问题。第一个例子是索马里共和国的野心勃

^① 关于布隆迪的胡图和图西族的仇杀事件参见本文第一章《激烈的社会冲突》一节。

勃的泛索马里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东北非的领土边界和政治体系都得进行变更。由于索马里的两个邻国，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非洲统一组织”对此避不表态。由于埃塞俄比亚塞拉西政权的解体，非洲之角的形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在此之前，“非洲统一组织”作为一个调停人还是发挥了作用。多少年来，一直成功地制止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之不致演变成为公开激烈的敌对行动。

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西撒哈拉的冲突。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于1976年在西班牙达成了一项协议，由两国分割西撒哈拉，从而使得他们的领土都有很大的扩展。而阿尔及利亚，出于本国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民族自决原则的相应利益，于是坚决支持反对并入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西撒哈拉多数居民，相当多的“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立场，拒绝承认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要求，但是还未达到足够的多数，以保证“非洲统一组织”对西撒哈拉人民宣布成立的“西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正式承认。其结果是演变成为一场痛苦的沙漠战争，并且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形成一场危机。

在非洲冲突中的外来干涉 虽然“非洲统一组织”坚定地反对外来势力对非洲内部冲突的任何干涉，但是，“非洲统一组织”在阻止“外来干预”方面却没能获得多大的成就。例如，在劝阻一些阿拉伯国家和苏联集团国家不要公开地支持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方面，埃塞俄比亚并未能成功地获得支持。实际上，所有“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他们有理由对于埃塞俄比亚的上述请求作出积极的反应。然而，“非洲统一组织”却表现出无力

组织成员国采取强烈步骤以反对叙利亚、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正是这些国家向厄立特里亚解放运动提供其所需要的大部分经济和军事援助。就安哥拉的内战来说，最后决定形势发展的不是“非洲统一组织”而是外来干涉力量。

因此，很显然，在非洲的纠纷中，“非洲统一组织”在执行其抗拒外来干涉政策方面迄今仍然是成就不多。很难设想，在八十年代，“非洲统一组织”在维护其不准外界大国干涉非洲的原则中将会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

越境军事干涉 许多迹象表明一种更加危险的外来干涉将在八十年代威胁着非洲的政治体系，除非“非洲统一组织”在维护其本身的宪章中能够增强对其成员国的控制权力。这种新的威胁，可以概括为“代理人的军事政变”，是现今非洲政治体系中三个方面发展的结果：第一，一党制或军政权的发展意味着任何一个反对派，不管其势力有多大，也很难通过和平手段赢得政权。第二，非洲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强，意味着任何政变只有依靠使用军事力量才能获得成功。第三，非洲彼此敌视的邻国的增多。这种情况就为一个国家内部持不同政见的组织同企图推翻本国政权的邻国政府之间的结盟，提供了基础。越来越多的实例证明下述观点，那就是认为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已经消逝的过去现象，如果不设法制止的话，将会演变成为非洲大陆军事冲突中一个新的模式。

一九七三年九月，坦桑尼亚允许乌干达被推翻的总统米尔顿·奥博特的军队在其领土上集结，并越过国境进行一次军事入侵，以便推翻篡夺政权的阿明。由于这次行动被许多国家看作是乌干达的合法政府企图挫败的一次军事政变，也由于阿明这个人为别人所厌恶，所以坦桑尼亚的这种干涉方式

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正当的。虽然如此，这次反政变的失败也给坦桑尼亚带来了严重的苦恼。

利比亚主席卡扎菲或许可以称之为“代理人的军事政变”这种策略的主要倡导人。一九七六年，他协助武装并训练了苏丹的一支反对派组织，并指使这批人跨过利比亚的边界向苏丹进行军事入侵，但终于失败了。卡扎菲之所以对此感到兴趣，就是因为他极度痛恨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亲密盟友苏丹总统尼迈里。而萨达特又是卡扎菲的另一个敌人。这种军事入侵的模式后来又很快地在埃塞俄比亚重演了。埃塞俄比亚军政府也十分痛恨尼迈里，因为尼迈里支持了埃塞俄比亚军政府的反对派。这样一来，埃塞俄比亚军政府又成了卡扎菲的盟友。在他们共同的鼓励下，一支新的苏丹反对派的军队又在埃塞俄比亚重新纠合起来，并企图推翻喀土穆政权。作为一项对策，苏丹于是向埃及请求军事援助。于是苏丹、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埃及这四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又日趋升级了。

利比亚的领导人还向乍得的叛乱势力提供军事援助。卡扎菲干涉乍得的目的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想帮助北方穆斯林少数派能在乍得政府中享有更多的权力；其次是希望他的变更领土边界的要求能够得到乍得政府的同情。通过边界的变更可以使利比亚能攫取一大块以矿藏驰名的地区。利比亚还强占了尼日尔的一块土地，并且插手于尼日尔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倾轧。

一九七七年初和一九七八年发生的从安哥拉越境入侵扎伊尔的所谓加丹加入侵事件，为越境侵略提供了另一个事例。一九七六年“人运”在安哥拉取得胜利以后，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继续支持安哥拉的反对派，策划派遣一支由安哥

拉反对派和雇佣军组成的军队进入安哥拉产油飞地卡宾达。当这个计划暴露后，安哥拉政府便纵容，甚至是鼓励“刚果民族解放阵线”对扎伊尔的沙巴省（即加丹加）发动入侵。当时发动的这场入侵既代表着加丹加宪兵队企图实现近年来冲伯的分离加丹加的野心，同时也代表安哥拉马克思主义政权企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邻国扎伊尔。事实上，从非洲的范围来看，这次冲突基本上是两个邻国之间相互敌视的结果。两个国家都想搞垮对方，并且都利用对方的反对派势力，以便使自己的干涉活动合法化。应当指出的是，这次还有摩洛哥和法国进行的干涉。这两个国家都是前来支持扎伊尔的。

上述几个关于“代理人的军事政变”这种新出现的模式的事例，就足以说明，在外界国家支持下的日益增多的军事政变现象包含着严重的危险。这类外界国家，经常向一些国家内的反对派组织提供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因为这些反对派组织都是非常软弱，如果仅依靠其本身力量根本无法向本国统治政权发起有效的挑战。

第三章

非洲激烈社会冲突的国际意义

当地冲突的升级

非洲的激烈社会冲突可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本国的，地区性的；国际性的。

本国暴乱 系指仅仅限于一国领土之内所发生的暴乱，而且没有任何重要的外来势力的卷入。一个国家的社会冲突由于邻国积极支持冲突的一方，从而扩大到本国领土之外，这样就形成了地区性暴乱。例如，在西撒哈拉冲突中，阿尔及利亚支持“波里萨利奥阵线”反对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苏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立场，而法国同西班牙则支持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一个国家卷入邻国内部斗争时，其做法往往是向叛乱者提供武器，或者准许叛乱者利用其国土作为组织反抗的基地。

地区性暴乱 在非洲通常是在下列四种不同的情况下爆发的：第一，当一个国家害怕由于邻国的严重内部冲突的结果而使其民族利益，特别是其安全的利益受到威胁时；第二，当两个严重不和的邻国都想通过秘密支持对方国内的一派，以图颠覆或推翻对方的政权时，而对方的国内这一派出于特殊原因，又很想更换本国的政权；第三，当一个国家支持邻国的反对现政府的势力，并且以此作为对邻国施加影响的手段时；第四，当牵涉到违反严正的原则时，尽管这类情

况是罕见的。

上述第一类情况的突出例证，就是扎伊尔对安哥拉的干涉，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初，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统治崩溃以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把安哥拉“人运”领导政权的出现看作是对其本国政府的威胁。蒙博托害怕安哥拉政府宣布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会对扎伊尔国内政治带来强烈的冲击。他还害怕俄国势力在这个地区的扩张，特别是因为苏联支持蒙博托政治上的反对派。由于这些原因，蒙博托坚决支持同“人运”对立的两个组织——“解阵”和“安盟”。而这两个组织又主要是依靠某些部族的支持。由于蒙博托把安哥拉的内部冲突看作是与本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他不仅自己进行干预，而且促使美国和法国，最后甚至南非都卷入了干涉。如果没有扎伊尔的这番作用，安哥拉的内战是否将会达到目前这种国际卷入的程度，将是大可怀疑的。由于扎伊尔的呼吁，“解阵”和“安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这也就是“人运”向苏联、古巴请求大规模军事援助的一个主要理由。苏联当然也感到此事与其本身民族利益有关，因为苏联明显地希望尽可能削弱西方国家的影响，此外，苏联还极不愿看到中国支持的一派组织在安哥拉得势。

第二类情况的突出例证，就是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长期冲突。还有利比亚几次三番地企图颠覆邻国的政权，其中有埃及的萨达特、苏丹的尼迈里、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以及乍得的托姆巴巴耶（后来的马卢姆）等人。

用以说明第三类情况的例证是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邻近国家的反对派往往被利用作为对邻国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特别令人感到兴趣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通过支持苏丹南部的反对派以迫使苏丹政府停止对厄立特里亚叛

乱力量的支持。埃塞俄比亚对苏丹南部反对派支持的程度完全取决于苏丹政府对厄立特里亚支持的情况而定。继任的埃及政府也常常采用这种方式作为对邻国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

第四类情况，纯粹为了原则上的理由而产生对抗的两件仅有事例均牵涉到坦桑尼亚。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公开地站在“比夫拉共和国”的一边，因为他认为伊博族要求从尼日利亚分离出来是正当的。他也使坦桑尼亚卷入乌干达的内部冲突。甚至允许乌干达被推翻的总统奥博托以坦桑尼亚的国土作为基地向乌干达发动武装进攻。尼雷尔卷入乌干达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能容忍阿明的屠杀政策。

非洲国家在罗得西亚、南非、纳米比亚以及早期葡萄牙所属殖民地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就是这种出于原则上的理由而支持这些国家的内部斗争集团的突出例证。

国际卷入 地区冲突中的国际卷入常常是采取了大国直接插手或者通过代理人卷入的方式。详细情况，上文已述。如果某一个大国所喜爱的国家，为了扩展本国利益而积极从事于某项活动，而这项活动又与其外国盟友本身的利益毫不相干，那末，这种国际卷入就是多少有些强加于这个或那个大国的。

在基本上是属于地区性的冲突中，国际卷入的因素会因情况的不同而具有类别上的不同。大国之所以卷入这些冲突主要是为了谋求本国的利益，而且这类地区冲突会产生不同规模的国际性暴乱。这类情况（例如在安哥拉所发生的），常常会带来最大的国际干涉的危险。关于这类问题将在下文中分别地加以讨论。

国际干涉的理由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西方大国和苏联集团都希望在非洲出现对他们友好的政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积极地对非洲事务进行干预。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一方面是西方大国越来越不愿卷入当地的权力斗争，而苏联却变得更加冒险了。例如，在阿明统治下的乌干达，在非洲之角和南部非洲，苏联就是这样干的。在八十年代，除非西方国家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对非洲的外部干涉将会是更多地来自苏联。而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对此作出反应。美国和西欧国家对于那些特别友好的非洲国家遭到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威胁时而给予的援助，将不会象过去那样仓促行事。对于非洲国家内部亲西方的反对派组织，如安哥拉的罗伯特的“解阵”，美国和西方国家也不会再给予秘密援助。更加明显的是：西方国家将支持非洲国家集团通过公开的协议来保卫其共同利益。

在七十年代后期，非洲大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反对苏联集团的出现。这个反对苏联集团出于其自身的理由，都希望能顶住苏联势力在非洲大陆的扩张。这种形势的发展是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两个马列主义政权的出现同时而来的。虽然这两个国家并不希望成为苏联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都把古巴看作是革命政权的最好盟国。这两个国家也同古巴一样，主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在八十年代的非洲，反对苏联和依靠苏联的这两类国家似乎将会越来越多，可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将坚持不结盟的原则，不管是左翼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还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加纳。所有这些趋势均将受到中

东和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影响。

象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政权一样，非洲目前所有国家的政权也都具有过渡性质，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对上述论断就需要持更多的保留态度。谁也不知道有哪些非洲国家的现有领导人能活到八十年代末期。在通常情况下，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会带来政权的变更，同时这个国家的国际方针也常常会发生急剧变化。目前同西方国家靠得很紧的埃及和苏丹这类国家也可能转向它们早期所主张的反对西方国家的立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方向上摇摆不定仍然是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现实。

由于下列的问题，使得非洲在八十年代的国际局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海洋政治，大国的全球性权力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南部非洲的种族对抗，在八十年代末期，这种对抗肯定将会达到高潮。

三、非洲同阿拉伯之间的政治。

四、在“新国际经济秩序”下进行的南北对话。

上面列举的前三个问题将在下文分别地进行讨论，其余的问题将在本书的另一篇研究论文中专门加以探讨。

海洋政治 苏联，首次在其历史上作为世界海军大国而出现，因此对于莫斯科来说，新的战略利益就是从世界上主要大洋中取得海军设施。苏联的目标有三种：首先，要求对于西方国家联盟的任何战略优势的威胁，都能作出有效的防御性反应；第二，发展以印度洋为起点，横穿或环绕非洲大陆而到达大西洋的海上和空中的供应线以及从红海到印度次大陆的通讯线路，目的是为了抑制莫斯科认为的来自中国

的致命威胁；第三，为了扩大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范围。苏联现代海军创始人，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的战略要求能在非洲沿岸建立海军设施。这个目的也只有同红海地区、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这一带国家建立双边的友好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要体现戈尔什科夫这个战略思想还会遭到强大的反对力量。

不仅仅是西方大国希望拒绝向俄国提供“军事基地”，而大部分非洲国家，由于他们的不结盟政策，也渴望拒绝向任何大国提供军事基地。中国目前对于在外国建立自己军事基地的要求，丝毫不感兴趣，并且有着充分的理由同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在一起，反对向任何超级大国提供军事基地。以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集团全都强烈反对向俄国提供专门的海军设施。

反对俄国海军在红海地区影响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将在八十年代初期作出重大决定，因为目前非洲之角的冲突将会取得某种结局。但是不管非洲之角的任何新的权力均势的实现，红海地区及其周围海上通道战略上的重要性，仍将继续吸引着外国的极大兴趣。

俄国战略家感到兴趣的另外三个地区是：南部非洲、西非突出于大西洋的部分和地中海南岸。苏联在上述地区的任何利益的丧失都将导致戈尔什科夫战略的一次重大的挫退。但是，为了确保苏联在非洲沿海的军事设施，苏联准备承担多么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的义务，目前尚不清楚。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莫斯科在非洲之角所进行的大胆而富有想象的冒险，就足以证实莫斯科对这方面政策的重视。

为了实现戈尔什科夫的战略，苏联在六十年代初期同意训练并装备索马里的军队，以此作为换取红海地区的伯贝拉

海军基地的条件。虽然，苏联对于索马里所仇视的邻国埃塞俄比亚抱有更大的兴趣，因为埃塞俄比亚所享有的战略有利条件远远超过了索马里。一九五九年，俄国佬曾建议帮助训练并装备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的军队，但是苏联的这次努力遭到埃塞俄比亚的拒绝。因为埃塞俄比亚希望从美国得到更为重要的援助。无论如何，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总是更多地同情于美国的政策。由于遭到埃塞俄比亚的拒绝，莫斯科只得退而求其次，对获取索马里感到满足。一九七四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垮台后，俄国佬又重新恢复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兴趣。当时，俄国佬面临的问题是，既要求能赢得亚的斯亚贝巴军政府的好感，而又不致于得罪索马里。当时索马里迫切要求重新划定欧加登的边界和要求将其势力有效地扩展到吉布提的立场，变得空前的强烈。索马里当然害怕，如果苏联的武器被用来加强埃塞俄比亚的军队，那末，他们的民族主义的野心的实现就会是更加艰巨。苏联竭力想消除索马里的顾虑，提出在美国势力从该地区被清除后，在该地区邻国之间的调停中和在变更边界的过程中，莫斯科将会处于更加坚强的地位。特别是由于法国正计划从吉布提撤退。按照这个计划，就是等于说要在非洲之角建立起苏联统治下的和平。尽管索马里提出了强烈反对，莫斯科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向前推进，即使这个计划意味着有失去在索马里已取得的一切成果的危险，苏联也在所不惜。对于苏联战略的发展这个重要问题，目前尚不可能得出结论，但是，苏联在这个地区的高度冒险政策证明，他们把向红海地区扩充势力的计划放在一个多么优先的地位。

南部非洲的种族对抗 八十年代需要作出的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决定，肯定会在八十年代末之前得到解决。至于

这个重要地区的社会的和其他种冲突，特别是南非的社会冲突，将是如何地获得解决而又不致引起暴乱和国际干涉，目前尚难以看清。对于非洲次大陆的白人政权转变中发生的暴乱的规模和国际干涉的性质，更是难以事先断言的。西方大国已经着手调整其政策，从支持这个地区的白人社会转变为支持实现黑人多数统治。当年仍在位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在赞比亚卢萨卡的主要政策讲话中，就宣布了这种利益上的转变。西方国家这种政策上的转变，使得西方国家发现自己将是很少有可能处于赞比西河以南的种族主义斗争街垒的对立面。但是这点也决不会排除那种可能性，就是西方大国将会发现在南非现存的政治体系垮台的关键时刻，他们对于竞争的双方都在加以支持。同苏联和中国的政策相比，西方国家的政策更加模棱两可。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同南非有着经济上和种族历史上的联系。如果西方国家的政策被非洲人看成是对南非白人的支持或者是对“温和”黑人的支持，那末就有可能爆发反对西方国家的愤怒情绪，这种愤怒情绪不仅限于非洲次大陆，而且将贯穿于整个非洲大陆，直至深深地进入第三世界。在非洲大陆白人统治的最后阶段，这种愤怒情绪将明显地有利于苏联或中国发挥出更加重大的作用。

非洲同阿拉伯之间的政治 在七十年代的十年中，阿拉伯国家在非洲的卷入之所以变得日益重要，是有着一系列不同的原因，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黑非洲国家政府对于阿拉伯国家收复一九七六年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侵占的领土的要求，给了极大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支持。中东一系列危机的出现，肯定会对非洲同阿拉伯的关系以及非洲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后，非洲国家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完全破裂了。在此以前，“非洲统一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支持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并支持成立单独的巴勒斯坦国家。一九七三年是一个分界线，自此以后，每当紧要关头，阿拉伯国家都可以指望得到大多数黑非洲国家的支持。但是，在中东局势稍为缓和时，他们又都坚决支持按照联合国的二四二号决议的精神以谋求协商解决中东问题的各种调停活动。非洲国家之所以支持把犹太复国主义同种族主义相提并论的有争论的联大决议，与其说是出于一种真正的信念，倒不如说是他们想以此作为一种立场，以利于黑非洲国家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外交上的交易。

非洲国家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全是一帆风顺的。形成他们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涨了四倍的石油价格，严重地影响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虽然“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拉伯联盟”）已经建立了基金，以便对于那些由于石油涨价而受到打击最重的非洲国家进行补助。但是，对于这项基金的规模，以及围绕着基金的建立而引起的种种争论，又引起了非洲与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局势。这种情况目前仍然存在。形成非洲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中东国家在非洲之角的冲突中，都站在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一边。阿拉伯国家对这两方面的支持，首先是以帮助穆斯林社会实现正义作为理由而进行辩解的。与此同时，有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和苏丹曾在红海地区进行积极活动，以反抗俄国佬的更大规模的卷入（详见上节《海洋政治》）。在阿拉伯国家对非洲的穆斯林的支持方面，利比亚主席卡扎菲走得最远。任何时候他在非洲大

陆的任何地方进行干涉时，都从不掩饰他的主要兴趣，就是在于促进实现非洲穆斯林的目标。而这点又正是他的革命思想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利比亚主席卡扎菲为了支持阿明而进行的干涉，可能会在乌干达的穆斯林同基督教徒之间留下了一个痛苦的冲突根源。

阿拉伯产油国的巨大财富和阿拉伯国家在“非洲统一组织”中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使得一些黑非洲国家的思想中产生了一种阿拉伯“操纵”或阿拉伯“统治”的意识。但是，这方面的困难不应加以夸大，特别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并不是作为一个集团而采取行动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峙（如利比亚同埃及和苏丹之间或者利比亚同摩洛哥和突尼斯之间），其破坏性将不仅仅限于造成阿拉伯国家同非洲国家的紧张关系。

国际干预的方式

关于近代非洲的神话之一是，这个大陆是剥削成性的外界大国的牺牲品。但是通过客观分析，你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印象。当年的非洲确是大国争夺的牺牲品。而今天的情况是：外界大国之所以对非洲进行干涉是由于非洲国家政府出于本身利益的需要而希望取得外国的支持。另一方面，某些外部国家的利益又正好与当地国家利益互相吻合。这样，一个纯属内部的冲突就有变成国际化的危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扎伊尔加上安哥拉的两个反对派组织（“解阵”和“安盟”）的最初企图。它们原来都指望在安哥拉的内部冲突中能得到美国、法国和南非的支持。作为对它们的这种企图的反应，安哥拉的另一派组织“人运”及其在非洲的支持者引进了苏联和古巴的干涉。另一

类事例就是一些原法属非洲国家，如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和加蓬，他们为了本国利益，仍然依靠法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

索马里为了本国的利益，将苏联势力引进红海地区，只是到后来，才发现苏联的更大兴趣是以索马里作为桥头堡，建立一个向非洲之角进行扩张的据点。这种情况已经作了介绍。这种外部卷入的共同特点是非洲国家政府——特别是那些通过政变取得政权的政府——希望外国盟友能在技术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支持，以保卫其新近取得的政权。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典型例子表明，改变外交政策会对国内政策产生影响。大体上看，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国家政府和非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府宁愿向西方国家寻求支援，因为他们不愿使本国的政治因此而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少数属于革命类型的政权，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和索马里却很想得到西方国家或“资本主义”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但是对其国内政策不作重大的改变。当苏联的援助在开发当地资源方面（例如铀矿和几内亚矿产企业）效果不大或者共产主义国家的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例如安哥拉的近海采油）时，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权也会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改变其政策，引进外国投资作为其国家经济中的私营部分。只有一个非洲国家，那就是索马里，在其外交政策转向莫斯科和北京以后方才改变其国内的政治体系。由于西方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思想对于即使已经坚定地站在任何一方的非洲国家，都具有较大的冲击力量，因此，很难从上述事例中推断出八十年代的非洲国家是否会在外交方针上出现类似的结果。

在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改变会促使政治形势变动的一

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当一个国家强烈地倾向西方国家、苏联或中国时，同这个国家对立的其他国家就会倾向另一边。这点似乎成了非洲大陆政治中的一种辩证法。目前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将不会延续下去。通常的格局是这样：当一个“亲西方”政府垮台后，新政权便会向“反对西方”的大国请求支援。苏丹领导人尼迈里将军一九七〇年通过他的“革命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夺取政权后，立即谴责西方国家并且宣布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进步国家集团的一边”。一心想在非洲之角捞一把的俄国人，作出了热烈的响应，并给予重大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几年以后，当尼迈里发现他自己正在竭力扑灭的一次改变是受到共产党支持时，他就赶走了俄国人并且向中国寻求军事援助。当这种援助还感到不够充足时，特别是面临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的深刻危机时，尼迈里又转向了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突出的是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他们出于本身的利益的需要，在苏丹取代了俄国佬原来的位置。这样就在五年时间内，苏丹外交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至少有十来个类似的例子足以说明这种理论，那就是外国的卷入是非洲政治和外国利益相结合的产物。只要非洲国家政府感到需要通过谋求外国盟友以巩固其本身的政权，只要大国（或者甚至中等国家如法国、南斯拉夫、伊朗和主要的阿拉伯国家）认为支持某个非洲国家的政府是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时，非洲国家冲突国际化的进程便会持续下去。非洲能否真正地孤立于国际政治的潮流之外，这是值得怀疑的。

那末，“非洲统一组织”对不结盟抱什么看法呢？不结盟并不是意味着奉行这个原则的国家应断绝同任何大国保持

联系。它只是要求它们在主要军事集团发生冲突时，不自动地站在哪一边，也不向它们提供军事基地。尽管如此，但有时不结盟的理想与实际会产生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大国政策的本身，因为当这些国家转向西方或转向东方时，大国常常会拒绝给予支持。如果西方国家与苏联以及中国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上和经济上的竞争没有象现在这样厉害，那末，这些愿意真正坚持不结盟的国家将会比较容易地实现其不结盟的理想。与此同时，在那些国家中，主要大国并没有特殊的经济或战略利益，它们的政府却可以从所有这些相互角逐的世界大国取得援助。

从上述分析中得到的结论是：西方国家同苏联实现缓和的一个主要副产品是减轻外国对非洲的卷入，虽然，争夺战略资源的斗争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 四 章

对非洲潜在的多事地区的初步预测

实际上每个非洲国家都可能爆发严重的动乱并招来国际干预。其情况如同尼日利亚六十年代后期的内战那样，也如同七十年代安哥拉内战，苏丹、厄立特里亚和乍得的暴乱那样的情况。这种预测的根据有下列几条：

（一）整个非洲大陆都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五十多个非洲国家都正从事于创造有效的政治制度这项艰巨的任务。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制度才能在非洲国家这种多元化的社会里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衡。

（二）当上述的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任务彻底失败后，其结果不是出现一个军政权（军政权是决不会稳定的），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例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或者更加极端的如乌干达的阿明和赤道几内亚的恩圭马·比约戈），就是出现一段时间的广泛动乱。

（三）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挫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动乱，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成为内战。非洲大陆的另一个动荡和冲突的根源就是相邻国家之间的民族对立。例如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三国之间的对立；扎伊尔和安哥拉之间的对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之间的对立；利比亚、埃及、苏丹之间的对立以及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之间的对立等等。

(四) 在争夺当地权力的斗争中，互相对立的双方都利用各种机会在国际范围内寻求外部支援，以壮大其本身的力量。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导致非洲国家的地区纠纷国际化。

下列国家和地区在某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产生大规模动乱和外部干涉：

南部非洲 赞比西河以南的这片地区，无疑将是八十年代非洲大陆最危险的部分。这个地区危机的产生，是因为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黑人大多数强烈要求在他们本国的政治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而白人少数又顽强地坚持维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本身安全（特别是南非的四百万白人），所以，这种危机的起因基本上是属于社会性的。可是，目前，这里的形势已经严重地国际化了。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国家在这里有相当数量的投资和好望角航道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再加上西方国家希望继续攫取这个地区的战略矿产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这类冲突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较可靠的设想是在八十年代的早期，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将作为黑人多数统治的国家而赢得独立。但是，这些国家民族独立斗争的结局是否就一定在这两个国家产生反对西方的政权，这是难以预料的，可以肯定的是，白人的南非将在非洲大陆上陷于孤立，并且几乎处于包围之中。到八十年代末期，将会决定南非的最后命运。因此，很明显，在未来的十年里，南部非洲将在所有世界大国以及许多较小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的优先地位。当然，也是非洲国家外交政策中头等重要的问题。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是非洲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正向非洲最富有国家的前途迈进。过去，由于政治制度上

的失败，尼日利亚无法在三个主要的民族集团（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之间以及这三大部族与其他少数部族之间取得均衡。过去发生过的内战虽然未遗留任何持久创伤，但仍会使人想起内战可能重演。尼日利亚是一个带有深重社会裂痕而又过份自信的国家。内战经历说明，如果再度发生严重的内部冲突，外部大国将随时准备参预冲突中的某一方。尼日利亚石油财富的迅猛增长将会有助于国家局势的安定，但前提是这种石油财富必须分配均匀。在八十年代的早期，尼日利亚从事一项新的重大的恢复宪政的试验，这项试验不论成败均将具有重大意义。

扎伊尔和安哥拉 虽然蒙博托将军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个人独裁政权，但是，由于安哥拉马克思主义“人运”政权的出现（得到苏联、古巴的强大支持），扎伊尔的地位变得脆弱了。扎伊尔的西部邻国刚果，既从共产主义国家取得军事支援，又从法国得到经济支持。苏、古通过支持安哥拉“人运”而进行的有成效的干涉，鼓励着蒙博托的反对派去寻找外界支持，以实现推翻蒙博托的目标。如果安哥拉、刚果和扎伊尔都沦于共产主义类型政权统治之下，这个地区将会出现另一种局面。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和睦相处，那末，对于不那么激进的国家将会构成一种威胁。但是，如果——并非不可能的——扎伊尔、刚果和安哥拉这三个国家之间由于各国利益的不同，而驱使这些军事激进的国家进入尖锐的对抗，国际卷入的风险就会变得更大。安哥拉的国内冲突很可能还得持续下去。只要安哥拉“人运”严重地依靠苏联、古巴来保证其自身的安全，那么，反对派分子，特别是南部翁本多族人就肯定要寻求南非和西方世界反共分子的支持。

非洲之角 自从塞拉西皇帝的统治在七十年代中期垮台以来，红海地区的权力结构就开始进入一个历史性变化的时期。多少世纪以来，非洲之角的稳定主要是依靠埃塞俄比亚这个大国。由于法国控制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的这种控制地位就更加巩固了。埃塞俄比亚的后门是通向苏丹，而邻国苏丹也是致力于维护本地区的安定，这样就保证了埃塞俄比亚的安全。当时西方势力正统治着这个地区，而且在一九六〇年以前，阿拉伯国家对于红海的非洲一侧的事务很少加以过问。由于下述五个方面情况的迅速发展，这种长期建立起来的权力体系终于解体了。第一，由于塞拉西皇帝帝国统治的垮台，带来了埃塞俄比亚军事实力的衰退和那些埃塞俄比亚帝国时代就已出现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抬头。第二，一九六〇年独立的索马里具有民族主义扩张的野心，并同穆斯林世界建立了联系。第三，苏联正通过建立起来的海军以追求可能得到的战略利益，目前在红海地区，苏联正以主要的武器供应者的身份积极地从事活动。第四，法国在吉布提的殖民统治正走向结束。第五，苏丹，还有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均积极卷入非洲之角的斗争。

在七十年代末期，非洲之角的某些直接冲突可望得到某种方式的解决。但是，如果在未来的十年中，象非洲之角这样一个战略要地所发生的权力和势力的竞争，不会引起外部大国的积极兴趣，那才是件怪事。

东非 自从一九七八年肯雅塔总统死后，目前肯尼亚尚缺乏一个真正得力的继承人，能够保持象肯雅塔统治时期那样的安定局面。八十年代初，肯尼亚的政治将会动荡并将影响整个东非地区。

在八十年代，乌干达的局势似乎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关于这种局势变化的性质，目前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继阿明之后的政权可能处于激进的青年军官领导之下，至少在新政权的初期，他们会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这样的政权显然将会使东非地区出现新的局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阿明之后的政权将由一些代表乌干达怀有强烈不满情绪的地方势力联合组成，这种不满已发展为对阿明时期的努比亚人和穆斯林的势力以及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利比亚）和苏联的强烈愤怒。可能出现一段痛苦的报复时期。如果尼雷尔总统坚持在任期届满后退休的意愿的话，八十年代结束之前，他在坦桑尼亚的领导就将告终。

在八十年代，整个东非地区可能处于一个重大变化和动乱的时期。南部非洲和非洲之角的形势发展将对东非局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苏丹 苏丹已经从长期的南北战争中复元过来，而南方人对于宪法保证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寄托于作为总统的尼迈里将军的个人身上，而他又是经常受到威胁的。如果他被别人取代了，苏丹可能再次出现严重的分裂。但是，在下一轮的分裂中，南方就会占有更坚强的地位，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地方政府和一支以当地为基地的、经过训练的军事力量。如果尼迈里被另一个北方领导人所取代，而此人又能够赢得南方人的信任，那么，将不会出现重大的破坏。但是，如果新上台的政权是由年老的地方宗教领袖所组成，或者更坏的情况，是由好斗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组成，那么，出现政治上新的动乱的危机就将无法排除。近年来，苏联是卷入苏丹内部冲突的主要大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都密切注视着苏丹的政局。

苏丹的任何新的动乱都将波及到其邻国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扎伊尔。

马格里布 在全部非洲大陆，只有其西北部靠近地中海的这几个国家正在成为民族国家。如果断言这个地区将不会出乱子则为时过早。

摩洛哥的哈桑二世国王基本上仍然属于个人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虽进一步加强了，但是地区性的紧张（特别是卡比利亚区）仍然存在。马格里布的一个桀骜不驯者、利比亚的卡扎菲，除了被邻近国家看作肇事者以外，迄今还没能在本地区建立起任何真正的势力。他的革命伊斯兰复兴思想向阿拉伯世界的反对派发出了某种号召，而他对巴勒斯坦斗争的支持又为他赢得了一些声誉。不过他在国外寻求重要的支持基地方面从未得手过。如果卡扎菲在八十年代仍能生存下去，并能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那末在未来的十年里，他将会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尽管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迹象，马格里布仍然是一个潜在的多事地区。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军事对抗，首先是发生在两国边界争端上；最近又发生在西撒哈拉问题上，这就会使人想起这两个强大军事邻国之间的关系是何等脆弱。马格里布国家都同西方国家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又同俄国人发展新的联系。

此外，若干非洲国家之所以能保持目前的相对稳定，主要是那些曾经为这些国家赢得独立的领袖仍然在进行着领导的结果。他们统治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既没有准备好顺利接班的道路，也未能创造一套经得起考验的政治制度，更没有促进本国民族一体化的发展。在一定数量的非洲国家中，目前的领导人代表着某些部族的利益，或者代表某个地

区的利益。到了八十年代，当这批领导人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后，接班人的争夺将会使这些国家陷入动荡不安。而且由于这类斗争势必牵涉到社会和地区性的支持问题，可以预见将来会面临着一个尖锐而内部紧张的时期。

上述论断适用于几内亚（塞古·杜尔总统）、马拉维（班达总统）、象牙海岸（博瓦尼总统）、塞内加尔（桑戈尔总统）和较小程度上适用于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

结 论

在摆脱殖民统治后，非洲大陆的政治动荡局面在八十年代将比过去二十年显得更加严重。在种族繁多的非洲国家里，争取实现内部均衡的斗争和建立本大陆安全体系的斗争不仅短期内无法解决，而且在五十多个非洲国家内还可能遇到新的挫折，加上非洲国家之间还可能突然爆发破坏性的冲突。非洲大陆现代化武器的猛增和大部分国家支出用于军备，将会使上述的冲突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与此同时，大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的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将加剧非洲大陆和各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并使非洲国家同西方工业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南部非洲种族对抗的危机在未来的十年中将严重损害非洲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尽管泛非主义者的思想是倾向于不结盟，但是非洲再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冲突之外。只要那些重要的大国如苏联、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准备向非洲敌对的国家 and 组织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从而势必会产生一股强烈的引诱力量，驱使那些处于敌对国家的政府和组织不惜采用最利于吸引外国支援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身的任务。非洲地区冲突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招来国际干涉。有时还会因此引起国际性的冲突。即使西方国家想摆

脱对非洲事务的干涉，可是只要苏联仍然不愿象西方那样停止对非洲的干预，西方国家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任何想从非洲事务脱身的打算，肯定是难以实现的。

总而言之，在未来的八十年代，非洲问题仍将受到国际上的极大重视。

第 二 篇

八十年代非洲的社会和政治趋势

威廉·扎特曼

导 言

在那些未卜先知的人们手下，非洲的遭遇是相当可怜的。非洲大陆最早的预言家一再表明他是无法用简单一句话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新鲜的事情总是来自非洲。”感到无比惊奇的普林尼长老^①这样说过。贝特朗·戴·儒维纳尔^②创办的“未来学”（一九六三年），是有着先见之明的，因为其中包括勒内·泽瓦瑟^③写的有关非洲的长篇章节。该文章的经济部分后来证明还是正确的（其主要内容与本文所论述的基本相同）。但是该文章的政治部分却完全错了（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一党制和非洲的统一问题）。

在未来的十五年中，有四个因素将成为非洲大陆内部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也是非洲国家同外部国家关系中的中心

① 普林尼长老，公元二十三年生于现今意大利的科摩，著有自然历史，曾经到过非洲。——译者

② 贝特朗·戴·儒维纳尔，法国经济学家，一九〇三年生于巴黎，现任法国经济、工业、社会研究学会会长。——译者

③ 勒内·泽瓦瑟，法国人，一九一七年生于河内，现任法国外交部参赞。他是“法国外交中心”的成员，也是法国经济学协会会员。——译者

问题。本文将突出地就这四个因素进行探讨。这四个因素是：自然资源；世代接替问题；地区性的结构；外界对非洲的渗透。以自然资源问题作为讨论的开端似乎意味着政治是从属于经济的。虽然这仅仅是牵涉到名词定义的问题，但这并非说明两者的从属关系。如果我们把“对于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看作为政治的标准定义，那末，政治就会同这类可以分配的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类的分配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完成，但是，能否进行分配却要受到资源基础的制约。

当然，自然资源不仅是指石油矿藏这类的物质财富，也包括某些更加流动的物质集合体。例如国民总产值，这类的物质集合体既可以创造，也可以分配。甚至还包括某些无形的项目，例如组织能力和活动能量。政治的任务就是从事于创造和分配，组织和动员。政治同经济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将社会比作一枚金币，那末，政治和经济就是这枚金币的两面。很难说金币的这一面比另一面更为重要，或者更加依附于另一面。

纵观非洲大陆，各种自然资源本来就很稀缺，或者未能充分利用，而人口的增长同资源不足的紧张矛盾又会形成种种冲突。这类冲突可能表现为种族的或者阶级的冲突，但是，从根本上说来都是经济上的冲突。目前非洲的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悬殊将会越来越大。非洲的贫穷国家常常是独裁统治，政府集中力量以维持社会的秩序，并且对于国民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进行强力压制。比较富裕的非洲国家，在新的文官一代的领导下，将会继续得到发展。这种新兴的文官一代对于国家发展和政治竞争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只有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可能还有摩洛哥和扎伊尔

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使得它们有资格争当非洲大陆的领袖，并在第三世界发挥其影响。但是，对于非洲来说，更加感到关切的是地区性的合作（或者冲突），而不是要求整个非洲大陆都采取行动的各种呼吁。由于这些国家将更密切地注视本国问题，非洲的各个地区将不会更多地关心于意识形态，南部非洲除外。在南部非洲，反对白人政权的斗争将会日趋激烈。

整个非洲大陆的外国势力肯定要减弱，这是因为本地生活方式、本地的产品以及各种问题的就地解决越来越成为非洲人民的一致要求。外国投资肯定不会消失，不过这类外国的投资将更多地符合于非洲的条件。在八十年代期间，为数不多的外国军队将会撤出非洲大陆。殖民主义重返非洲将是不可想象的。外国政府在非洲建立傀儡政权也是同样似乎不可能的。

非洲国家过去都是依附于某一个殖民国家，与此相比，在未来的年代里，非洲的主权国家将趋向于采取多样化的外交联系。就整个非洲大陆来看，那些一心要当非洲领袖的国家，为了其政治上的目的，将会对北方国家采取好斗的政策，而地区集团将会变得更加温和。非洲国家集团只有在地区的范围内才能更有效地同北方国家打交道，这不仅是因为地区性国家集团采取更加实用主义政策，而是因为地区范围内，这些国家享有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上的一致，从而才有可能同外界国家达成真正的协议。

对于八十年代非洲所作出的这些预言能有多大的把握呢？这是难以肯定的。部分地因为在南部非洲尚存在着爆炸性的潜在势力，而苏联同美国之间的和缓局势也仍处于前途未卜之中。如果津巴布韦能够通过谈判尽快地实现独立，那

末，在南非就会比较容易地出现和平改革。但是，如果津巴布韦痛苦的游击战争拖延过长，民族主义运动就会变得更为激进；全面战争可能会突然爆发；全世界的国家都可能被深深地卷入这场冲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南部非洲的局势将会给其他的种种问题投上一层阴影。非洲的经济增长和非洲内部的合作以及同北方国家的富有成效的联系都将因此而遭受沉重的打击。

考虑到上述的两种预言，在本文的后部分将提出两种“前景”，一种是“安定的”，因而比较乐观的；另一种是“动乱的”，因而是悲观的。八十年代非洲的历史将不可能完全符合于这两种前景，但是，更多的可能性是两种前景中的某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兼而有之，而且将不断地彼此来回地转换。

第 一 章

趋 势

自然资源和领导权的斗争

在对非洲的资源与政治进行具体讨论之前，最好先将政体明确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实体，这种政治实体既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同时又要承受人民向它提出的种种需求，并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便保障国民需要的各种供给并对本国实行控制。简单地说，所谓**支持**就是指爱国主义和对本国忠诚的种种表现；公民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提供的各种服务；这种生产能力提供的税收；公民对政府的各项事业的参与，例如文职官员、选举、军队或司法系统。所谓公民对政府的**需求**是指他们期望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例如法律和秩序、国防、就业、保健、社会变革、住宅、教育和交通以及这些项目的分配等等。所谓**供给**包括政府资助的各种项目；对私营工商业的扶持；对于个人的各种方式的帮助，从职业训练计划到福利的分配；还有各种无形的事业活动，例如对发展问题的研究，确定本国优先发展项目以及寻求外国经济援助和投资等。所谓政府行使的**控制**包括对稀缺的物质资源的分配；对于物价、工资、货币供应量以及财政金融系统的其他方面进行调节的政策；依靠警察来保证法律和命令的执行；以及其他项目等等。

社会越是复杂，那末，这类社会中的支持、需求、供给

和控制也就越加多种多样。但是，支持和供给往往主要牵涉到社会的自然资源，而需求则更是直接关系到资源的分配方式。如何使得上述各项能够保持彼此之间的平衡就成为各种不同政治策略的主要课题。例如，当一个国家公民对政府的需求大于对政府的支持时，这个国家就必须加强控制（以抑制公民的需求），或者加强支持（以增加供给）。而当国家公民的需求超出供给时，就必须或者加强对政府的支持或者加强控制。这里不是进行理论探讨的场所，但是，详细说明一下政策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却是很重要的。

在八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以后，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同本国需要能否取得平衡，将取决于人口的规模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当非洲国家正在竭力想保持或实现经济上稳步增长时，这方面的任何变化都将会给他们带来困难。据联合国一九七〇年统计，按目前每年2.7%的比率增长，预计到八十年代末期，非洲人口将增加75%，在二十五年之后，非洲人口将会翻一番。在通常情况下，非洲最大的国家，也是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十个人口最多的主要非洲国家人口增长率都超过3%（如果加上埃及则为十一个国家）。其余非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也都在此数字的上下。名列前茅的十个非洲国家，按照顺序为：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扎伊尔、南非、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但是，这些国家都不一定是最富裕的。除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南非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一九七五年按人口平均国民总产值超过三百美元。除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南非和尼日利亚，没有一个国家到一九八〇年或一九八五年，按人口平均国民总产值会超过三百五十美元，而且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会得到迅速的改善。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

年，按人口平均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超过4%的七个非洲国家中，只有石油生产国尼日利亚是属于这十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余的六个国家都是些小国家，他们是：几内亚比绍、加蓬、斯威士兰、博茨瓦纳、利比亚和突尼斯。另一方面，一半以上的非洲国家，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的这段期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均低于2%。而且有些国家（赞比亚、苏丹、塞内加尔、尼日尔、赤道几内亚和上沃尔特），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参见表一）。即使有一项有效的人口控制计划，也不可能在一九八〇年以前改变这种情况。

在整个八十年代，非洲人口的结构也将似乎不但不会减轻，而且会加重非洲国家政府的负担。目前非洲近半数的人口是属于需要别人赡养的部分（十五岁以下和六十五岁以上）。如果生育翻一番后的妇女留在家中看管小孩，那末，这个百分比还得提高。这部分受赡养的人口，不仅不能从事生产，而且是对于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需求最多的人。更加矛盾的是，目前非洲的劳动力正在遭受着失业和半失业的威胁。必须增加相当数量的工作位置才足以解决每年增长的3%人口的就业问题，此外，城市人口增长率为4%到7%（相比之下，农村人口增长率则为1.5%到3%），上述数字必须翻上一番才能满足城市人口就业的需要。非洲国家必须将国民收入的12%进行投资，方可以在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根据资本与产量比^①为4:1的标准）。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则投资在国民收入

^① 资本与产量比，为反映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每一单位产量的产品所需要的资本量。——译者

表一：基本情况资料

国名	人口		国民总产值		人口平均国民产值		军费		教育	
	1975 单位：百万	1975 美元	1975 单位：10亿 美元	1975 增长率 (%)	1975 单位：美元	1980 单位：美元	1976 单位：千美元	1976 单位：千美元	1970 （各个年龄集团受教育的百分比）*	1980 独立时间
尼日利亚	80.0	28.8 ^b	330	5.3	425	720	270 ^a	34	4-0.3 60-8-1	1980
埃及	37.3	11.3	310	1.0	325	360	400.0	68-32-7.8 70-40-12		1922
埃塞俄比亚	28.0	2.9	100	1.3	105	125	65 ^a	18- 4-0.2 25-8-0.5		d
扎伊尔	24.9	5.5	220	2.0	245	300	55 ^a	c-11-0.8 c-15-1		1960
南非	24.5	29.2	1,200	2.0	1,920	3,000	109	c-27-4.8 c-40-6		1910
苏丹	17.8	2.8	150	0	150	150	50	33-6-1.0 50-10-2		1956
摩洛哥	17.3	8.4	520	3.1	605	825	90	55-12-1.2 65-20-3		1956
阿尔及利亚	16.8	11.1 ^b	680	3.8	790	1,100	85	76-11-1.7 c-20-3		1962
坦桑尼亚	15.2	3.1	170	1.9	185	230	25	36- 3-0.2 55-5-0.5		1961
肯尼亚	13.4	3.1	220	3.1	255	350	9	64- 9-1.0 85-15-2		1963
乌干达	11.6	3.4	250	0	250	260	25 ^a	50- 4-0.6 55-4-0.7		1962

(续)

国名	人口		国民总产值		人口平均国民产值		教育		独立时间	
	1975 单位: 百万	1975 美元	1975 单位: 10亿	1975 美元	1975 单位: 美元	1965—1975 人口增长率 (%)	1975 单位: 美元	1980 单位: 美元		1976 单位: 千美元
加纳	9.9	5.3	460	0.8	480	520	20a	58-9-0.7	60-12-1	1957
莫桑比克	8.7	3.6	400	3.8	480	700	21	70-9-0.5	75-10-0.5	1975
马达加斯加	8.7	1.7	180	0.6	195	210	17a	85-11-1.0	c-12-1.5	1960
喀麦隆	6.4	2.4	330	3.7	395	600	10	c-9-0.6	c-15-1.5	1960
津巴布韦	6.3	3.2	510	2.9	565	750	17	c-5-1.0	c-9-2	1978①?
象牙海岸	6.2	3.6	500	3.9	605	890	8	75-5-1.2	c-20-2	1960
安哥拉	5.9	3.4 ^b	580	3.5	690	970	35	75-9-0.5	85-12-0.5	1975
上沃尔特	5.9	0.6	100	0	100	100	10a	13-1-0.0	20-1-0.3	1960
马里	5.7	0.6	100	2.4	115	145	6a	20-3-0.1	30-4-0.3	1960
突尼斯	5.7	4.4 ^b	760	5.8	1,000	1,770	21a	c-21-2.3	c-30-4	1956
几内亚	5.5	0.7	130	1.1	135	140	10	33-13-0.6	35-10-1	1958

(续)

马拉维	5.0	0.8	150	3.5	175	250	4	50-2-1.0 60-5-1.5	1964
赞比亚	4.9	2.7	340	-0.5	330	350	17	80-12-1.0 c-15-2	1964
尼日尔	4.6	0.6	130	-3.0	130	130	4 ^a	14-1-0.0 20-2-0.3	1960
塞内加尔	4.2	2.0	370	-0.4	370	370	11	43-10-0.5 60-15-1	1960
卢旺达	4.2	0.4	90	1.5	100	115	4 ^a	75-2-0.2 70-2-0.5	1962
乍得	4.0	0.5	120	1.4	130	150	11 ^a	30-2-0.0 30-2-0.1	1960
布隆迪	3.8	0.4	100	1.3	105	115	7 ^a	28-2-0.2 30-2-0.1	1962
索马里	3.2	0.3	100	1.0	105	115	31 ^a	10-4-0.4 30-10-0.5	1960
贝宁	3.1	0.4	140	0.6	145	165	3 ^a	40-5-0.1 50-5-1	1960
塞拉利昂	2.8	0.6	200	0.8	210	235	3	35-9-0.5 40-10-1	1961
利比亚	2.4	11.5 ^b	4,270	5.8	5,400	8,600	25 ^a	c-22-3.4 c-50-10	1951
多哥	2.2	0.6	270	1.5	290	335	4 ^a	75-8-1.5 c-12-1	1960
中非	1.8	0.5	230	0.6	235	250	4 ^a	73-5-0.1 85-9-1	1960

① 津巴布韦系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八日宣布独立。——译者

(续)

教育

国名	人口		国民总产值		人口平均国民产值		军费		教育	
	1975 单位: 百万	1975 单位: 10亿 美元	1975 单位: 美元	1975—1975 人口增长率 (%)	1975 单位: 美元	1980 单位: 美元	1976 单位: 千美元	1970 单位: 千美元	1980 单位: 千美元	1980 独立 时间
利比里亚	1.7	0.7	410	2.1	450	540	6a	43-12-1.1	70-20-2	d
刚果	1.4	0.7 ^b	500	2.6	570	735	10a	c-25-2.2	c-60-5	1960
毛里塔尼亚	1.3	0.4	310	2.7	345	450	15a	18-3-7	20-5-0.5	1960
莱索托	1.2	0.2	180	3.5	215	300	1	95-7-0.5	c-15-1	1968
纳米比亚	0.8	0.9	980	3.0	1,135	1,525	0	na	na	1978?
博茨瓦纳	0.7	0.2	290	9.0	300	670	1	66-8-0.3	80-15-1	1966
几内亚比绍	0.5	0.2	330	5.0	420	590	5	38-6-0.0	75-9-0.5	1973
加蓬	0.5	1.0 ^b	1,760	8.0	2,400	3,500	3	c-16-0.4	c-30-3	1960

(续)

斯威士兰	0.5	0.2	420	6.0	560	1,000	2	84-17-0.4	c-35-1	1968
冈比亚	0.5	0.1	180	3.0	210	280	1	32-9-0.0	40-15-0.5	1965
赤道几内亚	0.3	0.1	260	-1.0	250	250	5	c-17-0.0	c-20-0.0	1968
吉布提	0.2	0.2	1,580	2.0	1,750	2,200	0	na	na	1977

符号说明： 表明 0 岁到 12 岁、13 岁到 18 岁和 20 岁到 24 岁三个年龄集团中分别受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数百分比。

a 表明为军政权。

b 表明为石油输出国。

c 表明已普及初等教育。

d 无法说明。

富国的国名下加黑线，穷国的国名下加底线。na = 空白。

中所占的比率则要增加一倍。只有那些资源丰富并且在过去的十年里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这个数字的国家才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里实现这些要求。

非洲人口的构成也包含富有希望的一面。在一九九〇年以前，任何非洲国家都不可能扫除文盲，也不可能象其他许多地方所已经达到的那样，全部学龄儿童都能读完小学。但是，将会有日益增多的儿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教育。在各种年龄的人口中，受教育的百分比会悬殊很大，这方面主要是取决于各国的经济资源和教育政策。不过非洲社会中日益扩大的现代化部分将有利于促进生产就业和某些政治活动。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文的下面章节中进行详细地讨论。

到现在为止，关于非洲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这类展望均认为在未来的年代里，非洲国家将以过去的同样速度进行着变化。但是，认为非洲经济增长率将持续不变的这种假设将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实际呢？少数国家可能发现新的原料。有些比较先进的西非国家，如塞内加尔、加纳、象牙海岸或喀麦隆，如果能象尼日利亚那样发现近海石油矿藏，那末这些国家的情况就可能大大改善。到本世纪末，不少非洲国家的原料资源将会耗尽。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就是一个例子。多数非洲产油国的石油储存量也将是同样的遭遇。能源价格的高涨多少会挫伤非洲国家的增长率。若干非洲国家，象利比亚、博茨瓦纳、斯威士兰和加蓬等这类经济增长率特别高的国家，将不会长此继续下去。根据同样的理由，另外一些国家如塞内加尔、尼日尔这些经济增长率为负数的国家，也同样不会是长期不变的。在一般情况下，非洲大陆上的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仍将保持不变。一项明智的经济政策肯定地会给某些国家的命运带来重大的变化；而一项浪费政策将

会耗尽国家的储蓄和资源。然而，总的说来，如果考虑到由于种种限制，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既不可能特别高，也不会特别低。那末，经济增长率的延续性就可以为我们认识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之内非洲国家可能出现什么样情况的范围，提供一个切实的依据。

从另一个方面看，资源和负担将无法长期保持均衡，而且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坏，这也就是非洲养活自己的能力的问题。过去二十年内，非洲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一直是原封未动。在未来的十五年内，粮食增长的速度也不可能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现就这种发展趋势的四个方面简略地说一下：第一，非洲传统的农业越来越加无力养活农村人口，尽管农村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日益下降，但是，同其他方面的人口一样也是在不断地增长。第二，非洲的现代化农业也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因为城市里的职业和福利政策所具有的吸引力，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都感到的购买货物的困难，农业信贷和各项设施的缺乏，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遂对农业和矿业这类一次产业部门^①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非洲只有依靠大量资本输入和技术输入（其中包括种子和肥料）才能提高农业生产。而这点又只有依靠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计划才能实现。大部分国家谷物短缺的数字会大大增加。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有些较穷的非洲国家谷物短缺数字增加了三倍，而尼日利亚在同时期内则增加二十五倍。第三，凡是重视农业的地方，都是以农产品的出口作为发展方向的，这类农产品可以为城市的商业、政府部门和工业的发展争取硬

^① 一次产业部门，系指农业和矿业，即农产品与原料采掘的生产部门。相当于“初级产品部门”。——译者

通货。第四，在非洲的某些地区，特别是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萨赫勒地区，所有上述的不利因素，都由于气候不好而更加严重了，从而造成撒哈拉周围的农田无法抗拒沙漠的侵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可耕地约有六亿四千三百万公顷，目前估计只开垦了27%；通过农业生产可以提供 $11,681 \times 10^8$ 公斤的食用蛋白质，而目前的生产还不到这个数字的百分之一。更有甚者，平均每年被撒哈拉沙漠侵蚀的土地估计要达二十五万公顷。邻近受害最重的国家对于保持生态平衡已感到无能为力。任何非洲国家全都无力使开垦土地的进度能够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立刻产生了后果。非洲国家或者必须大力改变农业政策，或者依赖粮食的大量进口（购买粮食或政府援助），否则就会面临粮食严重短缺和社会不安这个根本问题。在七十年代，埃塞俄比亚、乍得和尼日尔等国的政府都由于这个问题而垮台了。在八十年代，将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向国外采购粮食，将耗尽发展中国家的难得的货币储备。即使发达国家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援助，非洲国家也得付出另外的代价，其中包括严重的政治干涉和对外国的依附。第一种抉择，也就是加强农业生产，当然是最可取的，从理论上讲也是最可行的。农业产量和耕地面积都可能增加，因此，不一定把继续下降作为对八十年代的预测的唯一基础。但是，快速发展农业的政策要求具有更大的控制、动员、调查和实施等方面的能力，至于政府投资所需的资源问题就更不用说了。而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显示具有这方面的能力。

所有这些趋势说明，非洲作为一个整体仍将继续遭受与

分配危机交织在一起的马尔萨斯危机^①的折磨。这也就是说在本世纪交替的前后，在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之前，人口的增长将会使得资源短缺的矛盾显得更加严重。这方面形成的压力又同非洲国家内部的各个集团为了平均分配稀有资源而进行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近年来非洲局势的发展主要地就是围绕着这个方面的问题。任何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种族矛盾或者阶级冲突都不过是这类基本问题的种种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殖民统治年代（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〇年），非洲的一个特点就是普遍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主要是为那些外国移入殖民地的人口所享受。作为对于这种不平等分配的反抗，于是就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继而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以此作为在本国范围内重新分配这种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但是，在最近的十五年中（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五年），非洲国家一旦赢得独立，经济增长的速度便立刻缓慢下来。此外，民族主义运动提出的再分配的斗争目标使得人们产生种种期望，而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一点点资金又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期望。在那些拥有丰富资源足以满足国内需求的非洲国家，少数执政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处于最优越的条件下，并且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非洲，具有较高程度的经济增长的国家，例如肯尼亚、喀麦隆和象牙海岸、突尼斯、马拉维、加蓬（新近发现石油和解放的国家除外），毫无例外地都是由原来的单一政党的上层人士在

^① 马尔萨斯危机，指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倡导的一种人口学说。他认为人口增长速度总是高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前者是几何级数而后者则是数学级数，当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危机，简称为马尔萨斯危机。——译者

继续执政，这全不是偶然的。更为常见的是原来当政的一小伙人已被军人所取代了。这伙军人的作用就是强力压制国民的需求。在非洲，凡是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常常出现军人政权，如苏丹、乌干达、上沃尔特、尼日尔、贝宁、中非、马达加斯加和加纳等，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些条件仍然是预测八十年代非洲局势发展的参数。在那些资源供应可能增加的国家，采取新的方式处理需求的人员可能会通过各种政治竞争的形式而接管政权；但是，在那些资源无法增加的国家，将无法进行政党竞争。维持秩序和控制需求成了国家政府的首要工作，因此，要求增加供给的压力也会减弱。在扩大本国资源方面，比较富裕的国家较之贫穷的国家将会是更加优越些。

重新分配的措施在短期内常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执行得当，这类措施会长期推动经济增长。人的能力可以得到解放，竞争可以为开创新的形势和机遇打开道路。日益增长的货物和劳务方面的需求可以刺激生产。如果进行了重新分配，但并未能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那末失望情绪和一种被人剥夺的意识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由于日益不满而爆发的革命可能会产生新的领导。但是，这种革命将在重新分配中消耗自己的力量而不会促进新的经济增长。为了防止这类革命的发生，非洲国家的当权派如果无法增加供给，就只好采取措施加强控制。如果无法取得经济上的增长以实现重新分配，公民对于政府的要求终于是会落空的，即使在此过程中，这些要求可能是为了对付外来的因素，诸如外界提出的非难、要求和条件等。无论如何，这类突然事件很少能导致经济的增长。

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并不象某些指示器所显示的那

样，彼此之间如此明确地相互联系着。非洲国家将更多地趋向于权力集中而不是平均主义的体制，并且将由社会政治中的少数人加以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服务于他们的。上述收入较富裕的那些非洲国家似乎可以允许在内部开展争夺领导权的竞争。但是，大多数收入较低的非洲国家，可能要经受不同种族和不同社会经济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和突然事变，这些集团为了分享本来已很稀少的利益而在进行着竞争。

到八十年代末，某些发展中的非洲国家，在对本国资源的控制和使用方面将比其余的非洲国家搞得更好些。因此，它们能够要求在非洲大陆的事务中处于领导的地位，并且还诱使一些国家作为自己的追随者。这样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并且为人们提供了一幅较之通常所描述的“经济发展鸿沟”更为确切的图景。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可能还有扎伊尔和摩洛哥具有持续发展的良好机会，从而使得这几个国家同其余的非洲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将拥有相当高的国民总产值和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依靠这些，它们就有条件在非洲充当领袖。另外的一些非洲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也可能增长得相当快，在非洲的政治事务中也很活跃，但是似乎缺乏上述第一类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和气魄。这类国家有：利比亚、象牙海岸、突尼斯、喀麦隆，还有肯尼亚、马拉维、利比里亚、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独立之前，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也是较高的，到八十年代，也可能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正如本文附表一中所列出的，同这些富裕国家在一起的，还有一些贫穷的非洲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不到1%或者更低些。这类国家是：布隆迪、

中非、乍得、贝宁、埃塞俄比亚、几内亚、赤道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乌干达和上沃尔特。还有另外一类非洲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也相当高（超过三百美元），可是就是一直停滞不前，这类国家有：加纳、塞内加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将是越来越大。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一些非洲国家就会变得强些。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会变得弱些。出于对资源开发的共同关切，它们可以联合一致。但是，由于在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成效不同而又彼此分裂。

某一个国家在资源问题上爆发的冲突，有可能为那些争当非洲领导的国家引进外来干涉创造条件。更有甚者，非洲出现的分配危机将引起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在非洲大陆充当领导的国家将试图带领其他的非洲国家和第三世界中观点相同的国家去反对发达的国家。如同七十年代阿尔及利亚所已经干过的那样。当非洲国家正在为了本国资源问题而进行斗争时，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划分非洲大陆政治势力的一个主题。如同独立初期那样，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可以为国内反对派寻求非洲盟友提供机会，同时也为非洲的强国要求建立与它们同观点的国家政权提供机会。这种危机可以使得那些充当非洲领导的国家获得更多的追随国家；如果这些追随的国家是强烈地反对发达国家的话。或者相反的使得那些充当非洲领导的国家的号召力量大大削弱，如果这些贫穷的国家是坚决反对它们的话。这样两种前景，到底何去何从，目前尚不清楚。但是，这点似乎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的非洲国家，能否成功地保持本国的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发达国家能否成功地同比较

强大的非洲国家取得密切的合作。

世代接替

在分析当前的非洲趋势中，必须注意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世代接替问题。八十年代开始，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将分别地处于下列两代人的统治之下：独立时期的一代，或者称之为**一九一八年的一代**（这里的数字系代表国家元首的平均出生年龄）；**军人一代**，或者称之为**一九三一年的一代**。在八十年代期间，另外两代人也将会崭露头角，这就是**独立后的一代**，也是一九三一年一代的一个部分，这一代人还只在很少几个非洲国家当权；还有**文官一代**，或者称之为**一九四五年的一代**。为了便于识别，我们采用国家元首的姓名和出生年月作为这个国家领导班子的代表。当然，在这个元首领导下的执政班子的成员都是比较年轻的。当元首死去或者下台，无人会认为整个领导班子也会全都死去或下台。但是，把他们说成是一个班子仍然是不会有错的，因为无论在态度、经历和个性方面，这些领导班子的成员都是一致的。高层领导人变动或者观点的改变常常会引起从上到下的重大变更。

在一九七八年，独立时期的一代所统治的国家约二十多个。到八十年代，其中将有三分之一的领导人会先后下台，其余的人也将陆续地从政治上消失（只有七十年代刚独立的六个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保持不变）。独立时期一代的领导人大多参加过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并且成为独立后的首任政府首脑。国家领导权的更替通常是通过下列两种方式进行：由独立后的一代的正常接班，如同摩洛哥、加蓬和利比亚所已经出现过的那样。这种接班就是前任领导人辞退，由

执政的领导班子中比较年轻的成员上台接任。这位新上任的领导在工作中经受过锻炼，并得到同事们支持，然后再由公民投票赞同。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种直接的正常接班。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正常接班。那就是由独立时期的一代或者独立后时期的一代先接班，然后再转交给文官一代的一位年青的领导人（例如在突尼斯，可能由执政党、曾任党部主任的穆罕默德·萨亚赫来取代努伊拉总理）。由于独立时期一代领导人大多是受人尊敬，因此难于从政治中引退。他们的年事已高，甚至死在职位上，然后由当权派中的一位年轻的领导者接任。当后一种情况出现时，就很可能跳过独立后时期的一代，而由文官一代直接接替（例如在塞内加尔，一九〇六年出生的桑戈尔的接班人则为一九三五年出生的总理迪阿夫）。

军人一代通过军事接管将继续取代独立时期的一代而上台执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人一代的平均年龄将会逐步升高。七十年代当政的二十多个军政权，在八十年代可望继续执政。他们都具有纳赛尔式的气质，反对实行多党竞争，但又不能建立有效的一党制，只有依靠军人同文官技术专家的联盟来实现其维持秩序和加强紧缩的纲领。他们认为政府需要的是摆脱对人民应负的义务而不是恢复民主。然而军政权在八十年代将越来越不合时宜，因为当政的军人和被他们统治的人民全都明了，军人充其量也只能收拾独立时期一代统治下的杂乱残局，而不能比其前任统治得更好一些。军政权特别无法解决那些需要高度重视的动员群众、而不是命令群众的问题。事实上，这一点对于军政权及其被统治的人民都是越来越清楚的。由于政治上的抉择通常都不是在全面选择的基础上作出的，而更多的是对于过去形势的

反应，因此，统治时间越长和越加有权势的军政权，越是更加愿意恢复文官统治。目前仍在当政的军人一代的领导人，都年岁已老。他们对于曾经亲手清除独立时期的一代感到满意，但是，他们对统治国家的重任越来越感到厌倦。正如其他各种军事集团一样，他们宁愿退居于监督的地位（最近军事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将继续当政，其理由如上面所述）。

在七十年代中期，三十岁上下的文官一代还未能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掌握政权。但是，在八十年代，由于文官统治的恢复或者通过正常的换班，文官一代将会领导许多国家的政府（在八十年代，文官一代的成员似乎将不会成为许多国家的元首，但是政府总理以下的职权都将由他们控制）。文官一代都受过良好教育，历任文职官员，他们都重视秩序和效率。他们要求自力更生而不是向往与原来的殖民者平起平坐，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具有更多的民族主义。文官一代的成员都同时具备了目前相互对立的各种类型政治家和技术专家身上的各种特点。

作为文职人员，他们需要一个政党作为自身的后盾。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一党制是独立时期一代和独立后时期一代的主要政治制度，而军事委员会则是军人一代特有的组织。那末，多党竞争制将是文官一代的典型特征。文官一代需要一种新的支持性的机构，这种机构与其说是一种动员组织，倒不如说是一种选举组织，它是同议会或执政的党派密切联系，其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制造舆论的工具或者合法外衣以支持他们的政策。由于政策、个人性格、地区，甚至还有社会联盟的不同会给各种争论带来更大的分歧。这样就容易形成各种互相竞争的党派。目前非洲国家有相当多的人受过中等或更高的教育，其数量之多甚至超过职业市场所能接

纳的程度，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人民可供各种竞争的领导集团的利用。肯定地说，党派竞争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竞争肯定地包含着这个党或者那个党的暂时优势，对于不忠诚的反对派的责难，党派的分裂和冲击以及其他种种多元政治的交替等等。

互相竞争的各种党派或者是由单一的民族主义政党分裂而产生的，或者是议会中的派别形成的，这是竞争性党派体系形成的两个典型的根源。这些政党不管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很可能摆脱不了其前身的影 响，并且不得不设法肃清民族主义运动和种族的再分裂的残余（这些问题在六十年代曾压倒了在贝宁和加纳出现的主张用党派竞争取代军人一代的势力）。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出生的这批人，同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以前出生的这批人之间在态度上是有差别的。前一批人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他们还很年轻时就已经登上当权的位置。而后一批人则是在本国学校中接受中等教育，考虑到老一辈领导班子早已牢固地掌握了各个高级职位，因此，他们只好竭尽全力沿着本国的官阶一步步地爬上去。在各种政治体系中，如果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他们的态度就是积极响应，并仿效当前的做法，如果他们的愿望落空，他们的态度就是赞同对立的活 动和评价。独立后时期一代的文职人员及其军人同伙，都把领导的效能看成是国内的主要问题，但是他们很少忠于民主制度和人民的呼声。他们以东西双方对峙的背景来看待外交问题，并且只是努力争取非洲内部逐步实现一体化。文官一代的成员都是以技术专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把普遍的落后看成是主要的政治问题。他们是忠于民主制度和忠于“人

民”。他们反对政府采取极权统治方法。他们以南北双方的背景来看待本国外交问题。他们把地区联合看成是优先的政治目标。正当非洲国家人民对于目前的一党制和军政权的失败而深为不满，并且企图从“对立”类型的政权和活动中寻求解答时，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就显示了政治局势中的一种可靠力量。当然，如果这种积极态度得不到满足，就有可能转变为对于一切政治活动的冷淡，甚至采用更加严密的组织作为改组社会的唯一途径。

非洲国家当权的上层人士不仅其信奉的意识形态可以转变，其所代表的地区也可以变换。原先被人们忽视的地区和种族集团日益增多地臻于发达，那末政权的基础就得转换。可以设想两种相反的趋势，而且这两种趋势将会同时发生。一方面是外围地区和次要部族集团的力量可能发展壮大起来，并且足以向本国已确立的领导发动挑战（象牙海岸的阿肯族、肯尼亚的吉库尤族和突尼斯的喜拉尔族，这些占统治的部族将会沿着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族或者尼日利亚的豪萨族、马达加斯加的滨海族曾经走过的道路，虽然不一定需要通过暴力来推翻已有的政权）。当各个新的集团开始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利益并同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融为一体时，它们便开始从事政治权力的角逐，并以此作为在本国稀贵的资源中享有更大好处的一种必要的手段。

另一方面，日益资产阶级化的本地城市人口，包括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竭力要将政府保留在城市里，由城市来控制，并且服务于城市。受过教育是在政府中谋得职位的关键，而城市居民上学比较容易，因此，政府很容易被掌握在城市居民的手中，并且代表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城市以外的居民只有流入城市以后才能享受同样的利益，才有机会参加

政治活动。这样，流入城市的人口始终不见减少。非洲的城市发展得很快，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到八十年代末期，城市人口将比独立初期增加一倍。有的地方会更快些。城市的过分膨胀标志着非洲农村遭受忽视，也标志着农村人口宁愿转移到城市而不愿在政府的手下为反对忽视农村而斗争。

但是，城市总得依靠外来资源的供应，这种供应或者来自本国农村，或者来自外国。因为城市无法重新返回大自然，也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而且城市需要的是越来越加多样化的货物和劳务，城市所具有的回旋余地就大大地小于农村。这样，城市就必须同内地建立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也可能是一种剥削性的，或者是一种合作性的。否则，城市就得更加依附于外国。依附于外国是要付出代价的，为此，控制城市的上层统治阶层需要寻找一些东西来向他们的外国债主进贡，而非洲的这些上层统治者又是两手空空。他们唯一可利用的物品就是政治支持和各种原料，其中包括热带农产品或矿产。由于原料多产于农村而不是产自城市，因此，城市的统治阶层需要对农村实行控制和剥削。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在于首都的规模及其建筑能同宗主国的城市相媲美，对于非洲城市的统治阶层来说，这点是越来越明显了。其结果就是普遍采用权力分散的政策，这并不是作为发展农村的一种措施，而是一种发展外围城市的努力。这种权力分散是以首都为中心向外扩张，并且为日益增长的地区利益提供基础。

按照社会和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政府都需要拥有各种联盟，也就是依靠政府统治得到利益并且支持政府的各种集团。七十年代，在非洲的许多国家，这种联盟大多表现为地区性集团或者部族，更多地是一种地区性的实体而

不是一种社会政治性的实体。喀麦隆、扎伊尔、苏丹、贝宁、象牙海岸、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几内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依靠在本国的各个地区和部族之间小心地保持利益上的均衡，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政权统治。在八十年代，这种政策仍然是很重要的，正如同各个地区和种族的代表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完全一样。在本世纪内，清除部族影响的政治将不会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特征。但是，非洲国家政府需要的却是超越部族和地区的社会集团的联盟。

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不会进入这些联盟之列，尽管在所有的非洲国家中，农民仍然占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或农业的现代化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都不会进展得很快，从而农民也不会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此，从目前看来，似乎不会有一个农村政党或者农村政党的竞争以农民革命组织的面目而正式出现。除了北非以外，整个非洲大陆都不准备实行任何意义上的“绿色革命”。但是，如果国家政权落到部族领袖的手中，而且他的同伙大都是来自农村，或者国家政权落到“毛主义”^①的领导人手中，他们都具有着倾向于农村的自力更生的思想（如同坦桑尼亚和几内亚比绍的情况那样），那末就会出现例外的情况。

但是，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处于发展中的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且产生了某些原始的派别利益集团。他们组成城市联合阵线，作为支持政府的联盟。随着各国的结构的不同，这类原始的派别利益集团也有

① “毛主义”系西方对毛泽东思想的通称。——译者

着很大的变化。但是，商业、劳工和文职人员将一方面发展本部门的特性，同时也努力唤起对自身特殊利益的意识。只是在少数的非洲国家里，这类的集团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组成支持政府的独立联盟，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被控制的支持力量。

对于未来的非洲上层人士的划分及其利益之所在，目前尚难以确切地识别。但是，在任何地方，一党制联盟所具有的那种稳定性和军政权中军人和官僚联盟所具有的那种稳定性，均将要为一种更加团结的现代化的城市联盟所取代。这种城市联盟将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生产分配。

地区领导和地区集团

另外一个决定非洲国家经济和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就是非洲国家的地区性关系的模式，也就是全非洲性关系的模式。一九六三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内所建立的地区性组织，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类地区组织内，通过定期会议和特别调解活动来处理成员国之间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和各种争端。关于这类组织的原则和特性均已得到一致的公认。这种安排基本上属于一种集体安全体系，并在处理“中等水平”的国家关系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就是解决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促进他们的合作。严重的边界问题，明目张胆的干涉以及非洲国家之间的“恶性流血事件”等等，统统都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围内进行了调解。不论何时，即使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达到某种紧张的严重关头，“非洲统一组织”也能加以处理。

这种严重的关头也可能是一场短暂的消耗性战争。但是如果沒有系统的调解，卷入战争的双方都将无法从中摆脱

(例如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的摩洛哥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远未达到战争的程度，甚至连非正式的战争行动也都不是。一九六四年以来，只有下列情况属于例外，那就是一九七三年在坦桑尼亚支持下对乌干达的军事进攻。当时，坦桑尼亚支持乌干达流亡总统奥博托的军队，从坦桑尼亚的国土上向乌干达发动了一次进攻，但是失败了。奥博托是在阿明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撵下台的；还有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发生的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向西撒哈拉发动的军事进攻。西撒哈拉原属西班牙，一九七六年西班牙退出后，由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加以瓜分；还有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东部欧加登地区发动的远征。当同一地区领导下的国家发生冲突时，即使地区组织仍然可以进行活动，但是，一旦地区国家陷入争夺优势的更高级斗争阶段时，那末，地区组织处理冲突的能力也会大大削弱。

非洲国家的冲突常常是由冲突地区以外的国家来进行调处。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也并非取决于这个特点。但是，未来的非洲国家冲突的处理方式将会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通过其他地区的调解人的作用，以加强非洲大陆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冲突地区内调解人的作用，以加强本地区的团结一致；通过来自地区性领导集团以外的调解人的作用，以加强这些集团之间的团结。在非洲国家刚刚取得独立后的十五年期间，上述的这几种方式都曾先后出现过。

地区组织无力对于其他有关的任务作出决定，更缺乏必要的力量来处理这类的任务，从而感到非常苦恼。在有效地协调非洲国家对外政策方面也成效甚微。其中包括消灭南部非洲种族主义顽固堡垒这项重大的对外目标。从一九六五年

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到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军事政变的十年期间，非洲国家“高级”关系中出现的这种失败，使得非洲地区组织成员国经常感到苦恼。由于本国民族主义组织坚持斗争并经葡萄牙新上台的国家领导人的同意，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终于获得独立，从而使得罗得西亚陷入了新独立非洲国家的包围之中。这样就为地区以外的国家对非洲问题的干预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也为非洲国家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新的地区性活动舞台。

全非洲性组织感到苦恼的第二类问题，就是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处于一种更低级的水平。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便会在非洲国家关系中产生严重后果。尽管非洲国家都宣布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是，由于它们重视非洲的相互支援，加上“非洲统一组织”成了“国家元首俱乐部”的这种性质，它们仍不断被卷入这类冲突之中。“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即使有了实现和平的良好时机，往往也是无能为力，而对于被困国家元首的呼吁更无力作出有效的反应，

“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而且在危机解决之前，“非洲统一组织”的活动经常处于停顿之中。“非洲统一组织”无力量对于各种问题作出及时的解决，从而削弱了这个组织解决另一类问题的能力（例如那些“高级”关系中出现的問題）。从一九六五年刚果第二次危机到一九七〇年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结束的这段期间内，这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且在一九七六年又再次得到证明，当时“非洲统一组织”在安哥拉问题上曾经出现了分裂。

非洲国家之间出现的这些高水平或低水平的紧张关系，是同争夺领导权的潜在势力密切相关的。因为这类紧张关系会给策略上的竞争带来种种的争论。在一种增进全非性关系

的机构的推动下，正在出现一种地区关系的联络网。一九六〇年以来，语言集团和各种海关关卡都逐渐被打破。地理的（地区性）集团日益显得重要。意识形态的集团已经消失，但还可能再次出现。上述第一种倾向是自然的，并且肯定将会持续下去。语言集团和种种海关关卡都是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并且阻碍了非洲邻国之间通过共同特点和共同的问题，来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并克服各种冲突。在那些地区合作成为独立前已有的合作模式的继续或者发展的地方（例如前英属东非、前法属赤道非洲或法属西非），这种合作模式的持续只会带来好处，因为这种合作加强了当前的努力。但是在大多数非洲地区集团中，要实现这点还必须克服殖民统治形成的分割。

第二种趋势，就是地区合作的兴起曾经一度成为“非洲统一组织”时期的特点。自从一九六三年“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以来，非洲各个地区内国家之间的交往或邻国之间的交往的次数已经超出全非洲性外交活动的一倍。大多数外交上活跃的国家都集中力量搞好地区范围内的外交活动。地区性事务也都通过政府级官员（经常是内阁级官员）的访问来加以处理，而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使团。

第三种趋势，就是意识形态集团的出现受到了限制。

“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就是为了弥合各种妨碍非洲国家共同行动的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如果争夺全非洲大陆领导权的斗争转变成为寻求建立各种联盟，以便破坏协调一致的体系，那末，意识形态集团就会东山再起。六十年代的非洲，曾经出现过两极分化的格局，那就是温和的布拉柴维尔集团和激进的卡萨布兰卡集团之间的相互对立。这种对立的格局后来遂为“非洲统一组织”的协调一致所取代了。八十年代的

意识形态集团将不会类似于上述的这种情况，而是更加受制于地区间的紧密合作这种深刻的现实。意识形态的联系可能会加强，甚至会破坏合作，但是反过来，合作也会削弱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人们肯定会列出原法属西非或者英属东非的例子，在这些地区，殖民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邻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意识形态和主权独立的冲击下便立即瓦解了。在八十年代，这样的一种政策还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尽管有这种可能性，却是不大会实现，这就是因为新式地区主义是本国政策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外国人强加的一种组织。

在这些条件限制之内，地区主义的发展，将会在八十年代形成非洲国家关系中的主要模式。地区主义就意味着邻近国家之间，将在共同的发展工作中和共同面临的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但是，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同另外其他地区的工作和问题远远隔绝，从而造成同全非洲性的工作和问题的远远隔绝。虽然，在非洲的某些角落，地区主义就意味着地区体系的一种更高级的组织，以及他们就某种任务达成的一种协议。但是，在南部非洲，地区的作用和组织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在这个地区，殖民统治仍然是很活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特别严重，暴力行为成了合法的权力形式。地区组织又无先例可援。解放斗争又很可能在策略和领导问题上出现纷争。

民族的解放可以看成是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民族解放和经济发展又常常是相互对立的。这两个方面不仅在要求上不能协调一致，而且在他们的焦点上也是互相对抗的。因此，南部非洲地区的性质和利益，都同非洲其他地区是大相径庭。到八十年代末，罗得西亚无疑地会成为津巴布韦，其

政权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所采取的解放方式是外交的还是军事的。纳米比亚也将获得独立，这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国家，可能会成为安哥拉与南非之间的桥梁，或者成为缓冲地带。但是，肯定要同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发生冲突的。

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各个方面注意集中的焦点仍然是南非。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将不会超出下列三种观点：非洲革命派及其非洲和外界支持者的观点，他们要求摧垮白人的南非；南非自由派及其外界支持者和非洲同情者的观点，他们希望能通过谈判议定一种向多种族社会的过渡。不管他们在设计社会结构的解决办法中，如何富有想象力，但是，他们缺乏一个有力的谈判对象。南非的强硬派及其少数外界同情者从革命派的强大和自由主义者的软弱中为自己的立场寻找理由。一九七六年六月，在索维托，革命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南非青年自发地表现出没有任何物质力量和精神恐惧能够阻止他们采用暴力行动。除了内部革命和外界压力之外，南非问题中还包括黑人种族家园问题（班图斯坦）。八十年代结束之前，许多黑人家园将变成倔强的“小莱索托”。黑人家园也将要分化，一部分仍然依附于南非，成为南非境内支离破碎的小块飞地^①。另外一部分将实现他们所设想的独立。由于这类矛盾，黑人家园的居民将更加迫使他们的领导人处于紧张之中。

这样，民族解放问题就转变为关于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的热烈争论，并且为非洲大陆领导权竞争带来了重大的政策分歧。与此同时，民族解放问题在非洲其他地区已经没有象

^① 在一国境内的外国领土叫飞地。——译者

在南部非洲那样具有更大的号召力量，特别是因为各个地区都逐渐重视本身的发展问题。在津巴布韦出现的对抗中，这点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与津巴布韦邻近的五个国家，即莫桑比克、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博茨瓦纳等前线国家，在津巴布韦问题上就比其他地区的强国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虽然，预测非洲大陆相互关系的动向，比起尖锐地指明非洲各个地区的未来的焦点似乎要容易些，可是，非洲各个地区的某些特点已经是非常明显。北非、西非和中非都各自有了一个巨人国家。或者是以这个巨人国家为中心形成的合作，或者以反对这个巨人国家为目标而形成的联合。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扎伊尔必然将会分别地成为在本地区占优势的国家，即使它们也象尼日利亚过去那样处处感到胆怯。除了经济实力和人口众多以外，这些国家在本地区所处的中心地理位置，也大大提高了它们的作用。在北非，正规的合作或者是完全按照阿尔及利亚的条件，或者是干脆不存在合作。在西非，可能会建立起合作，但不包括尼日利亚，在某种程度上而且是反对尼日利亚的。在中非，建立的任何集团如果不包括扎伊尔，都将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个地区的某些国家总是企图同这个巨人国家加强联盟关系。

下面将按地区分别地进一步阐述这些论断：在北非，八十年代将不会出现过去的那样的本地区的三个国家或四个国家之间的严重敌对。过去这些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邻国是敌人，邻国的邻国才是盟友。北非国家都拥有持续发展的良好机会，并且都迫切希望加强同欧洲国家的联系，因为它们都要求取得发达世界更大的承认，并且争取同它们平起平坐。这项政策或者使北非国家同

非洲其他国家更加疏远，或者导致北非国家利用非洲其他国家作为它们活动中的马前卒。

在西非，象牙海岸将领导一个中小国家的集团同尼日利亚领导的小国集团进行有克制的竞争（争取外国援助、市场、投资资金和国际活动能力）。不管它们的竞争是限于“西非经济共同体”之内，还是在两个这类组织^①之间，每个集团都包括有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虽然，本地区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在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这类关键性的法语国家保持文官统治和在加纳和尼日利亚这类关键性的英语国家恢复文官统治，但是这些问题似乎不会对地区关系的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只有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利比里亚，可能还有加纳这样的三、四个国家拥有真正的发展机会，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将会出现日益增长的现代化部分同全国人口中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巨大差距，尽管这些国家都在努力缩小这方面的差别。其他国家将会出现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不过这些国家将继续向发展中的非洲国家输出大量人口，这项活动将增强地区的合作，同时也会形成地区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说，日益增强的西非地区主义是以真正增进利益为基础的，其中既包括紧张的时期，也包括合作的时期。对于这种地区主义的干扰与其说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权上的分歧，还不如说更多地来自物质利益上的冲突。

在中非，扎伊尔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其次就是喀麦隆，不过中非地区的国家关系不会象西非那样高度正规化。事实上，革命的刚果和新殖民主义的加蓬，在意识形态上的

^① 两个这类组织，是指“西非经济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分歧，以及贫穷的沙漠国家乍得和经济上均衡增长的喀麦隆在发展策略上的分歧，似乎都将使得地区主义的意义在这儿比在其他地方都更加受到制约。

在东非，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尚未出现，因此在国家关系中很可能形成北非马格里布国家那样的模式。东非的几个主要国家都是旗鼓相当的，只不过经济发展水平低一些而已。即使在乌干达的阿明下台以后，东非的主要国家之间仍然处于对立的状态。自由企业的肯尼亚和农村社会主义的坦桑尼亚，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将随着政权的更迭而继续保持下去。由于这种分歧而带来的紧张关系又不断地折磨着正规化的合作。在东非地区的两个侧翼（北面和西面）正受到邻近冲突地带的包围，因此东非国家肯定要彼此影响的。但是，即使取得合作，其中也夹杂着冲突。东非地区的新边界可能要向南延伸，坦桑尼亚不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于莫桑比克，甚至对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具有吸引力，而且还在市场的经济合作、服务事业、基础结构以及支援等方面也同样具有影响。在非洲之角，发生冲突和出现联盟的地区将向北和向西扩展至苏丹、埃及和阿拉伯世界，而不是进入黑非洲。

在所有上述地区，各种类型的纷争将时刻阻碍着各国之间的合作。这类的纷争又可以为本地区国家或其他地区的国家提供调解的机会。可能出现的任何的国家联合也都不会改变这些特点。这类的国家的联合是最难以预测的。正是一个冈比亚，一个赤道几内亚，一个吉布提，或者一个卡宾达（位于刚果和扎伊尔之间的安哥拉的飞地），这些国家的边远的地理位置就足以支持它们的存在。它们都是领土很小，本

国的领导也易于控制，并且拥有主权作为自身的坚强防护牌。此外，还有各种自然的经济集合群，都拥有一个中央流通系统并进行货物的流通和交换，诸如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马里；或者象牙海岸和上沃尔特；或者尼日利亚、贝宁和尼日尔；或者肯尼亚和乌干达，或者马拉维、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可以将他们经济上的互通有无转变成为政治上的合作，但是，这种动向将取决于政治理论和政治目标，而不是取决于经济。在七十年代中期，尚未出现这类动向的任何端倪，如果要在八十年代出现这种动向的话，那末就要求将现任政府进行更换。同样的，任何一个松散的地区性经济组织要想解决它们之间的严重分歧，并且决心依靠一体化政策来克服这些分歧，就得要花费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办得到。这类地区性经济组织有：四个或五个国家组成的“中非经济和关税同盟”，成立于一九六六年；由三个成员国组成的“东非经济共同体”，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七年曾经进行过活动；十五个国家参加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于一九七五年；在这个组织内，又由四个或五个成员国组成了协商理事会，建立于一九五九年；和六个成员国组成的“西非经济共同体”，建立于一九七二年。这些都是成立时间较长，或者比较健全的组织。”

由于地区性交往的日益开展，全非洲性的相互交往和作为非洲的组织论坛的“非洲统一组织”的重要性，肯定将会逐渐减弱，甚至可能成为上文所分析的那种争夺全非洲领导权斗争的牺牲品。在非洲出现的这样两种不同等级的相互交往，将会使非洲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立场变得复杂起来。虽然，我们曾经认为，对于问题的切实了解和采取实用主义的解决办法，是新的文官一代和日益发展中的地区结构中的突

出特点，但是，在争夺全非洲的优势和第三世界影响的地区性斗争中，它们是否会持这种态度将是大可争议的。激进的领导，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支持，南北对话中坚持强硬立场，所有这些都将逐渐上升到全非洲的水平。与此同时，温和的领导，国家之间的合作，强调经济发展，更加灵活的外交立场似乎将普遍地出现在地区的范围之内。南部非洲当然除外。另外，地区性集团将不会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因为地区成员国所处的条件及其观点都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因素将不可避免地会使非洲国家在南北协商中的立场变得更加不可接受和更加不团结。这种不团结又反过来会刺激那种想要依靠意识形态的领导作为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企图。

外部渗透

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国家对外关系是以宗主国的交往为中心而构成的，特别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葡萄牙的殖民地以及法国的殖民地较之英国所属殖民地表现得尤为严格。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间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这类双边模式外交关系的日益减弱。只有当原来的宗主国的地位被另一个冷战大国所取代时，偶而也会出现新的互惠主义。

多边贸易 是指几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这种安排内，非洲以外的国家同非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完全出于双方集团内部已有的集体协议的需要而形成的直接联系。“欧洲经济共同体”同参加“洛美协定”的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作为原料消费者的发达国家同原料生产者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同联合国中少数发达国家同多数第三世

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相类似。每个国家集团内部的平衡取决于集体利益同各个国家的方针政策的相互配合。每个成员国都必须对于促进本身利益的各种时机进行认真的衡量。多边贸易依靠共同的选择和共同的利益以加强国家的实力。

多样化的对外关系 是指一个非洲国家同若干个非洲以外的国家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结成的相互关系。作为互惠主义的延续，多样化的对外关系是用同几个国家结成关系以取代只同一个国家的关系；用自行选择来取代对别国的依附；用转向别国的这种威胁来取代忠诚的许诺。多样化的对外关系通过扩大行动自由以加强国家的独立自主。多方面寻购武器就是一个例子。多方面寻购武器已经成为非洲军事采购的突出特征，在摩洛哥、索马里、坦桑尼亚或者尼日利亚等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只要条件许可，这种情况似乎将会持续下去。

如果说互惠主义是殖民统治时代的特征，那末，由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交往关系拼成的一种混合体将成为当前非洲国家对外关系的典型形式，而且事实上已成了摆脱殖民统治后独立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形式。在八十年代，某些非洲国家仍将保留在法国法郎区，而法国法郎将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货币区。只有少数非洲国家将参加非洲货币区（例如贝宁和尼日尔可能参加尼日利亚货币区）。剩下的非洲国家仍将保持本国的货币。

总之，在某些同语言有关的文化问题上，互惠主义将会长期保持下去。当然，这些文化问题在政治上都是属于次要的问题（但又不是完全无关重要的）。对于许多独立已二十年的非洲国家来说，一旦需要就外国大学、外国军事学院、外国商业网，甚至外国援助计划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

的是原宗主国的语言及其声望。不论在非洲什么地方，如果出现学生、士兵、商业，甚至发展事业都对其他国家感到兴趣时，这种排他主义就会受到挑战，并且接踵而来的就是对外关系多样化。共同语言也将成为对外关系多样化的一种工具。因为非洲人可利用共同语言来扩大他们同外国的交往，并以此作为进入大国政治的敲门砖，或者作为同外国结盟的一种手段，而这些外国已经同它们所属的地区内的其他国家有了联系。这样一来，尼日利亚人可以到美国上大学。安哥拉可以接受古巴的援助。尼日尔的公民可以进象牙海岸的军事学院。

虽然，殖民主义重返非洲和主权国家之间建立排他性联系都是可能的。但是，这类互惠主义的新事例似乎将不会发生。不但是从力量上考虑，目前任何一个外界国家都将无力量取得并保持一个殖民地，而且从国际政治原则而论，都坚决反对出现新殖民主义。至于新型的卫星国关系，想象中缓和局势和国家主权原则，都不允许一个超级大国在非洲建立代理人政权。即使象七十年代中期的扎伊尔和安哥拉政府那样地亲美或亲苏联，但也不能算是超级大国的卫星国。

由于同样的原因，八十年代非洲国家对外关系的多样化，也不会简单地就转化成为伪装的冷战互惠主义，在这种互惠主义中，各种各样的同伙都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的同盟者。相反的，目前同所有北方工业化国家进行的交流将会持续下去。即使在七十年代中尚分别地同苏联和美国疏远的象牙海岸和安哥拉，十年以后也将会向所有的国家开放。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暂时的冲突和愤怒都已成为过去，也不是意味着所有非洲国家将同所有北方工业化国家都保持着完全同一类型的外交关系。特别是因为非洲大陆

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逐渐上升，各国内部各派为了争夺稀贵的资源正在进行着混战，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政府将会寻求外部支持，并且可能会同这个或那个北方的主要国家打成一片。但是，如同七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和塞内加尔那样，非洲国家宁愿同更多的北方工业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相反的，北方工业化国家也宁愿同更多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便谋取最大的利益和掌握更大的杠杆作用。

如果从互惠主义走向对外关系多样化这种总趋势是一种独特的结构模式，那末多边贸易又将是如何呢？非洲国家联合一致以对付北方国家的时机是很多的，例如，商品集团、地区集团、“非洲统一组织”的地区集团、意识形态联盟、独立后的代理人集团（例如大英联邦的独立成员国）和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大多数南方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俱乐部”）。虽然对上述任何一项的效果如何，人们都有理由加以怀疑，但是这些确实都是同北方国家打交道的地区集团。

七十七国集团中的南方国家集团在发动对抗和保持谈判的过程中是很得力的。但是一旦这类谈判进入具体细节的讨论时，“两方面”的利益集团将随着各种特定项目而有着巨大的变化，以致于南方成员国很难取得一致的行动。“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后又成立了一些商品集团，这些商品集团所面临的问题同“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存在的问题正好相反。这些商品集团的共同利益通常都是过于狭隘，以致于参加国在其他问题就无法团结一致，而且这些集团所控制的商品也不象石油那样举足轻重。在非洲生产国的参加下，关于咖啡、可可、铜、镁，可能还有铀等项目的协议已经谈判议定，协议中甚至还可能附有稳定收益的条款，但是不会象石

油外交那样带来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和有效的市场控制的功能。

在非洲大陆的范围內，“非洲统一组织”将集中自己力量解决地区问题。同时，如上文所分析的，“非洲统一组织”由于未来的非洲大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将日益趋于分裂。独立后建立的各种集团将会失去其重要性。英联邦将保持有限的联系。法语非洲国家俱乐部也可能是作用不大。

从欧洲的观点来看，欧洲同非洲关系将会继续向着普遍优惠制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让非洲享有特殊的待遇。预定将要签订的第二个“洛美协定”将只是一项商业协议，附有某些关于援助的条款和一项比第一个“洛美协定”更大一些的出口收益稳定计划，但是，这个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欧洲对非洲贸易实行优惠的条款。到八十年代中期这项协议期满时，北方工业化国家将会使所有的南方发展中国家都能享受这些条款的某些优惠。

地区联盟最有可能成为同北方工业化国家打交道的有效的一种多边贸易组织。这种组织能把政治任务同其他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从而保持了团结一致。如上文所讨论的，地区集团会因各个地方问题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变化，但是在非洲各地，地区集团的潜在力量还是很巨大的。在地区集团范围内，非洲国家可以就外国渗透的形式、条件和限度等方面协调一致或者使其合法化，并且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它们决议的效能。对于外界渗透和非洲内部关系来说，非洲地区经济群都呈现出一派积极的形势，因为成员国都会从中得益很多而损失很小，不论是强国还是弱国，也不论这个国家是发达还是不发达。

国家关系结构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促使变化的条件。

在什么情况下，通过维持彼此的良好关系来实现从互惠主义的转变，从而使原有互惠的双方都有机会获得更多利益？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这种从互惠主义的转变会使非洲国家的内部实力突然面临挑战，从而造成双方的对抗和关系的破裂？非洲国家与原宗主国的关系变得突出的紧张的事例尚属不多。互惠主义的自然衰减是早已开始了，随着而来的是态度上的变化。上层政治人士很少倾向于以欧洲为中心，或者是面向北方工业化国家。实际上，非洲早已充满了对外国的畏惧和仇恨的巨大浪潮。外国的顾问和企业界巨头都被看成是殖民统治时代的畸形产物。许多外国消费品遭到蔑视，而本国产品和本国方式却大受欢迎。非洲化，民族化和非殖民化将会成为非洲的主要政策。

但是，只要存在着互惠关系的自然衰减，由于敌对而破裂或者形成对抗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因为宗主国已经不再成为唯一的集中攻击的目标。当然，贫困和实行再分配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成为南北对话中的基本内容。但是，一旦南北对话进入解决问题的阶段，这些问题就不再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了，而且可以转化为能够同时处理的技术性的具体细节。

除了对于非洲国家同非洲以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进行分类以外，最好还要明确双方关系已达到的程度，或者真正渗透的程度，因为各个方面势力不平衡的状况肯定将会持续下去。极端的孤立，或者完全一体化，这两种极端都是不现实的，可能出现一种中间关系的混合体。例如，非洲国家将继续依靠原料同北方工业化国家交换工业品或者挣些购买武器的现金。其汇率将会随着政治因素和市场上的经济因素的变化而有所不同。非洲将继续通过外国援助和投资而

接受外来资本的转移，并且可以获得技术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这些，非洲国家通常都是感到不足的。到八十年代末，西方国家可能会实行债务延期偿付，并且允许新债一律重新开始。但是，更为可能的是发展一种有选择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最具有吸引力的那些非洲国家将被允许延期偿还债务，或者将本国的经济活动完全置于债主的控制之下。北方工业化国家的人员将继续留在非洲国家，不过人数会大大减少，而且将处于当地的控制之下，尽管这种控制仍然是很不够的。

在八十年代，非洲国家在与外国的人员交往方面也将有一系列的变化。到八十年代末，外国军队有可能撤出非洲。当然，总是还会出现外国军事干涉和外国军队的临时驻扎（参见本文的最后部分）。尽管可能会签订一些“友好”条约，而且还会同原宗主国或者同中国或苏联签订许多训练和军事援助协议，但是，非洲国家似乎不会同外国签订任何双边防务协定。外国的文职人员将减少到占全非人口的0.5%，而且在那些选择自力更生政策的国家，外国人员作为一种技术人员毕竟还是受到欢迎的。只有少数几个非洲国家的旅游事业会得到发展，因为旅游事业需要专门的自然资源，以及大量投资和特定的政策。结果，非洲人在本国的国土上同外国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就比过去大大减少了（这个事实也可能加强地区联系，因为非洲人宁愿更多地了解自己的邻国而不愿去了解外部世界）。同原先的经历相反，成为外国企业经理的非洲人将通过学习访问和考察旅行同外部世界进行接触。

非洲少量的外国人士并不意味着非洲外国商业势力的衰微。通过彻底国有化或者通过联合企业中非洲股份占多数的

办法，企业资本的非洲化将会进一步加强。尽管有上述措施，但是投资和商业势力将会持续上升，在多数情况下，甚至赶不上非洲国家经济起飞的需要。不论是否实行非洲化，外国投资的水平将会根据非洲国家的市场、资源和政策条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有些国家，由于市场狭小，资源缺乏或者对外国采取敌对政策，因而处于相当孤立的境地，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则在不同程度的国家控制下积极开展同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

在教育领域内，虽然将仍有大量的非洲人在欧洲、美国和亚洲的大学留学，有的则担任教师。在非洲国家的国立大学里，将有少量的外国学生和教师。语言争端将会日趋激烈而且无法加以解决。估计将有三分之一的非洲国家将采用当地的非洲语言作为本国的官方语言，并且处于不同语言改革阶段。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决心将英语、法语或者葡萄牙语变成为本国的交流工具。

因此，很少几个非洲国家的对外活动需要重新进行评价。也就是说在同别国的交往中是否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或者更大的政治实力。工业化曾经使某些经过改进的原料或轻工业产品获得更高的出口价格，商品协议或生产专利的许可将提高少数产品的价格，非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同寻求扩大影响的外界供应国之间的竞争为供应非洲武器条款的改善创造了条件，不论国际组织将来如何发展，但是象联合国这类的国际机构要想通过任何国际法律，都更加需要非洲国家的投票赞成。不过，国际贸易条件将不会有重大变化，而且按照非洲的需要和应得的标准来看，非洲的货物和劳务的价值都是远远偏低的。与此同时，由于非洲国家日益意识到本国主权的力量，对于外国经营者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非

洲国家既无力量去吸引更多的外国业务，却有能力对外国业务施加严格的控制，从而使得外国的渗透大大减弱，并且更加需要本国的自力更生。

这些特点是同上文已提到的其他特点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文官一代的兴起；地区协调解决问题计划的发展；以及企图利用意识形态作为一把大保护伞，把全非洲领导人的追随者都集结于它的庇护之下。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尽管某些“权威性的”象征主义的残余依然存在，可是，非洲的主要国家早已为它们自己的“象征主义”烦恼够了，它们宁愿作出真正的努力以解决各项基本问题。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非洲国家都倾向于将它们本身的问题归之于北方国家，并且施加足够的压力以争取按照它们的意愿解决这些问题。非洲问题非洲人自己解决，或者北方国家的援助必须按照非洲的条件，这种趋势早已开始，并将在八十年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论这种趋势是否就是意味着将形成一些北方国家援助计划以解决非洲的发展问题，或者意味着将减少国内需求，并且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外援以增加对国民的供给，但是，这种趋势却表明非洲国家将继续吸收更多的技术文明，并使其内容适合于本民族的形式。这些发展中的非洲国家将增进同北方国家的外交联系，并在这类联系活动中坚持自己的条件而不致于成为北方国家的一个分支机构。其余的非洲国家将仍然保持着温和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状态，而且将被外部世界所忽视。在八十年代，完全与世隔绝将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过去的年代里，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所经历的与世隔绝程度更深重些。今后的情况仍将是如此。

在国际事务中，非洲国家将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努力

寻求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体制，以替代过去的殖民统治和冷战的世界秩序体制。现成的样板是没有的，而过去的模式，例如权力平衡，世界议会等似乎都无法实现。在本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年代中，世界将处于一种中间的状况，在这种形势下，主权平等和对于个人和国家在需要上的不平等进行的补偿，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目前尚缺乏实现这种普遍要求的有效的权力平等。尽管全世界都要求实现预定的秩序，但是八十年代的世界，除了为十几年以后的新世纪的到来进行某些临时性的准备以外，将不会有更多的作为。

第二章

前景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左右非洲局势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是可以事先预测的，但不可能绝对肯定。一九六〇年比利时从刚果^①撤退时刚果就垮台了，这件事既不是必然会发生，也不是难以理解，更不是只有刚果才会发生。当然，事后认识这件事还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非洲石油的发现，特别是尼日利亚石油的发现和“比夫拉”战争都属于类似的情况。如果对非洲几十个国家的每项特定的事件都要求作出预断，那是毫无意义的。例如，任何非洲国家都可能分裂；都可能向别国提出边界要求或者沦为其他国家的牺牲品；都可能招引俄国海军或空军建立军事基地（视该国的地理位置而定）；都可能同邻国合并，也都可能购买一颗原子弹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讹诈。试图推测这类事件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将是徒劳的。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出两种前景：一种称之为“平静的”；另一种名之为“动乱的”。虽然，一定时期的国际缓和同非洲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两者之间很难说应以何者为主。但是，这两种前景都将与国际局势的缓和密切相关。这两种前景还与南非局势的发展有关，特别是与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方式尤其密切相关。

^① 指现在的扎伊尔。——译者

平静的前景

经过一番复杂的外交协商以后，津巴布韦终于在七十年代的末期获得独立，实现了黑人多数的统治，但是白人在国家生活中也得到了满意的地位。在日益激烈的游击战争造成双方的一定伤亡并陷入僵持局面之后，在英国、美国卡特政府和赞比亚共同的压力之下，经过在卢萨卡同津巴布韦国内民族主义领导人举行的谈判，协议终于达成了。八十年代初期，大多数津巴布韦的白人将流向南非、巴西和澳大利亚。津巴布韦可能演出一幕军事政变，废除原来商定的宪法，成立立宪议会，通过新宪法，规定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利，从而取消了保护白人的专门条款。

由年轻的和年老的民族主义者混合组成的集团将在紧张局势和外界的严重怀疑下上台执政。这批民族主义者都是来自国内的民族主义联盟，其中也包括部分民族解放军。当立宪的军事政变爆发后，老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将全被淘汰而由温和的独立后的一代上台掌握政权。津巴布韦的国家经济将比独立前有所衰退，但是生产和消费都将全部掌握在津巴布韦人民的手中，并将在今后十年内逐步得到恢复。在发展政治和经济的合作中，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将联合一致。这两个国家将加强与马拉维、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的交往。当班达死去后的马拉维和津巴布韦都举行选举时，本地区的五国集团将采取不寻常的步骤以支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上台执政，并反对倾向于南非的民族主义集团，从而保证了这五个国家自力更生政策上的一致性。安哥拉则急于向人们显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之内也是行之有效的，尽管安哥拉建立全国有效的统治尚需要一些年头。换句话说，南部非洲的这片激进

地带的国家将转而致力于国内问题，也就是发展中的那些基本问题。

在八十年代，南非将出现一系列惊人的事件。美国从支持向南非投资变换为同情南非的社会变革，并且参加了抵制南非运动的行列，从而给南非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莱博瓦和博普塔茨瓦纳这两个黑人家园的领袖也要求在本国享有“正式合作”的地位。尽管南非政府还能继续控制城市青年的骚乱，但是，如果提出一些导致成立联邦国家的制度改革，南非政府还是会感到够苦恼的。一度成为独立黑人家园的特兰斯凯和克瓦祖鲁同斯威士兰和莱索托组成为柯萨联邦，只是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干预，才保住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免受南非的侵扰。这个联邦从北方工业化国家得到了大量援助。

纳米比亚将获得独立，其独立的条件将是更加接近于南非的条件而不是联合国承认的“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条件。尽管没能实现“西南非人民组织”要求的黑人多数统治，可是新政府里将包括许多“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成员。新政府将不仅改善了与安哥拉的关系，而且还改善了同博茨瓦纳的关系。纳米比亚和柯萨联邦都将为非洲国家所承认，并将成为“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成员国。

时松时紧的苏联同美国的缓和关系将在整个八十年代起作用。苏联虽然宣布支持南部非洲革命，并且答应提供物质支持。但是，在南部非洲很难出现可以支持的革命，而且通过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危机的解决一再证明，如果同美国采取联合措施，将比单独行动会收获更大。在八十年代初期，在埃及、象牙海岸、扎伊尔、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和摩洛哥的倡议下，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的压力，苏联和古巴的

军队将会从非洲大陆撤出。然后，俄国将同美国达成谅解，苏美两国都不在非洲驻扎任何军队或军事技术人员。尽管在吉布提出现过战争（将在下文加以概述），但是这项协议还是得到遵守。

除了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游击战争以外，非洲大陆还可能出现一些战争，尽管不象吉布提战争那样严重。当肯雅塔总统逝世后，乌干达入侵肯尼亚（在入侵中，许多乌干达军队被打败，阿明总统也因失败被推翻了）。利比亚和乍得可能爆发提贝斯提^①战争。在赤道几内亚可能爆发几方面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按照以往的程式：爆发事件，军事集结，暂短的战争，彼此筋疲力竭，双方僵持，和平调解，恢复原状。可能爆发的吉布提战争将成为美国和苏联武器的接受国家在重大利益上的一个试验场所，也是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欧加登战争这场未完插曲能否完结的一个试验场所。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这场战争可能在八十年代由于吉布提发生亲索马里的军事政变而突然爆发。直到两国武器都消耗殆尽之前，双方的战争行动一直在持续不停。这时的苏联同美国可能重申要恪守原先达成的协议。在这种条件下，战争可能陷入僵持的局面。“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可能提出一个在非洲之角重新划分领土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将欧加登部分领土（原属埃塞俄比亚）划归索马里，而将大部分吉布提的领土划归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的港口将对两个国家都自由开放。然后由索马里发表一项声明，宣布索马里民族统一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在北非，摩洛哥哈桑二世可能提出让阿尔及利亚可以自由出入摩洛哥在德拉河口

^① 提贝斯提，系乍得北部一个地区名。——译者

建造的磷酸盐港口的协议。经过适当考虑后，阿尔及利亚接受了这项协议。这样就使得摩洛哥同阿尔及利亚在西撒的领土争端得到彻底解决，因为摩洛哥早已将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威胁压缩到西撒的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然后，摩洛哥正式批准了一九七二年同阿尔及利亚签订的边界协议。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共同体正在缓慢而谨慎地在非洲大陆形成。在尼日利亚的影响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正在持续缓慢地发展。尼日利亚也同其邻国尼日尔、贝宁和多哥签订了一些不平等的经济合作协议。“西非经济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适当地改变了形式，并在西非的九个国家中开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这九个国家是：塞内加尔、象牙海岸、马里、上沃尔特、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个经济集团协调了它们的计划，对一些重大问题在采取立场前进行磋商，废除国内关税，从而消灭了走私。在赤道非洲，由于加蓬、刚果和喀麦隆的持续发展并缩小了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而使“中非经济和关税同盟”能继续发挥作用，并且更加齐心协力了。在东非，肯尼亚同乌干达的关系仍然冷淡。肯尼亚将成为经济上自由主义成功的个别例证。在南部非洲，尽管在实现国家联合之前，更加需要的是国内政治体系的进一步巩固，但是赞比亚西河国家（莫桑比克、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可能会建立一个共同的权力机构负责处理劳力、能源和交通运输上的合作。在东非找不到合适伙伴的坦桑尼亚，也可能加入它们的行列。

“非洲统一组织”是赞成建立这些非洲经济共同体的。“非洲统一组织”的本身除了作为一个调解场所之外，

对于非洲的政治越来越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早期，“非洲统一组织”将倡议三年一次的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协调并传播经过改进的教育方案。由于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语言集团越加变得很少。“法语非洲和毛里塔尼亚共同组织”富有成效的组织作用，大部分已被“非洲统一组织”取代了。

非洲大陆国家的政治体制将根据每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而有所不同。那些贫穷的小国仍将处于军政权或者文官个人专政的统治之下。在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象牙海岸、扎伊尔、利比里亚、赞比亚、几内亚比绍、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仍将保持一党制。在五、六个经济发展最快的非洲国家，社会团结的实现，包括出现稳定的政权，是由于日益增长的资源联营的多元化竞争所具有的吸引力。一党制有时可以成为一种公民参预政治的渠道和一种联合的力量，但在另外的时候也会成为向下进行控制和宣传的渠道。在任何情况下，政党都是拥有权力的。人民群众和各种思想都是通过政党的领导机构才能对政府发挥协调作用。除非通过政党，任何人民群众和任何的思想都将无法进入政治体系。当一个政党的创始人死去后，政党就成为保持稳定秩序和实现继承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正如同所有非洲这类国家的党的创始人所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只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算是例外。在加纳、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和摩洛哥，一个活跃的多党制已构成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塞内加尔和突尼斯，当这些国家的缔造人去世以后，新的反对党可能在一次选举获胜而上台执政。在加纳和尼日利亚，军政权将让位于以新政为基础的文官统治^①。

总的来说，非洲国家正利用同北方工业化国家建立互利关系的前景来进行谈判，以便为它们自己在财富重新分配中赢得更为有利的条件。多边谈判不仅包括技术条件还包括一般原则。到一九九〇年，在伊朗进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组织的鼓舞下，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也将努力争取同样的待遇。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这两个国家将通过不同的方式，力图将一些非洲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阿尔及利亚强调意识形态和地位，并要求非洲的“真正代表”能够在“大国的协作”中享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尼日利亚则迫切要求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具体项目中能组成共同的阵线，并且要求继续执行“洛美协定”。不过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将无损于为了对穷国进行补助和促进较富国的进一步发展而建立的日益增长的贷款。

动乱的前景

经过一场痛苦的游击战争之后，津巴布韦终于在七十年代末期获得了独立。这场游击战争造成原有联盟的破裂，而且在各个方面形成政治关系的多极分化。没有任何人主动站在罗得西亚白人的一边，但是西方国家却努力限制流血的战争。当俄国佬挑起双边冲突时，西方国家尽量避免同苏联一起支持同样的一派。一群年轻的激进者很快地把年老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全部加以清洗，并且同莫桑比克结成联盟。与此同时，安哥拉和古巴正在推动纳米比亚的游击战争。俄国佬在联合国关于对南非禁运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路线。由于美国

① 加纳和尼日利亚，分别于一九七九年通过大选，实现了文官统治。

——译者

和南非都试图在罗得西亚享有特权，非洲国家遂认为它们已勾结在一起，因此有些非洲国家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因此，当津巴布韦独立时，与其把它看成是一个孤立事件，倒不如把它看成仅仅是南部非洲最后一幕的开场。尼日利亚可能停止向美国输送石油，因为美国支持了南非。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也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非洲国家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施加压力，要求对非洲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斗争中给予的支持作出相应的报答。在八十年代，南非可能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南非邻国使用俄国武器和非洲士兵，并且在艰苦的战争中遭受沉重的损失。虽然美国和英国通过使用否决权使得联合国安理会无能为力，但是，苏联和非洲国家通过联合国大会控制了联合国机器，谴责南非为侵略者，并且使它们进行的战争打上联合国的印记。一旦陷入贪污泥坑的尼日利亚新政府，被一群年轻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以后，新上台的统治者可能通过纳米比亚将本国士兵开赴南非的战场。使用中国武器的坦桑尼亚军队则从莫桑比克向南非出击。这场战争可能要持续好几年。南非可能丧失半数的国土，但是仍能坚守兰德和开普省一线。西德供应南非武器。美国一心只想避免对白人的大规模屠杀，并且争取谈判解决，可是美国所得到的下场只是世界舆论一致谴责，认为美国是与南非一鼻孔出气的。

国际缓和遭到挫折。苏美之间虽然仍保持官方联系，但武器协议和谷物贸易都暂时中断。在一些多事地区，如中东和东南亚，俄国佬继续保持着紧张局势，因此，不论是对付俄国也好，还是对待非洲也好，西方国家都无法集中力量并发展共同的策略。

到一九八八年，南非战争最后以筋疲力尽、僵持不下和分

割状况而告结束。虽然交战双方的国家签订了举行谈判和合作的条款，但无法完全消除双方的敌对行动。双方保持着临时人为的分割，并且继续忍受着战争的消耗。双方的地区都发现了新的金矿，但黑人国家将会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援。

非洲大陆的另外两个角落里也在遭受着战争的折磨，交战双方都被打得七零八落，筋疲力尽。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可能在西撒问题上进行战争。阿尔及利亚政权依靠极权统治而得以支持下去。摩洛哥的哈桑二世可能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毛里塔尼亚也在不断地经历着军事政变。西撒共和国的命运也是朝不保夕。在非洲之角，索马里可能重新发动欧加登战争，并且向着吉布提挺进。但是索马里的境遇并未好转。厄立特里亚运动经历了一系列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战争仍在继续。

如象在刚果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八十年代非洲的三场战争将左右整个非洲大陆形势的发展，并留下创伤。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在反对南非的斗争中，非洲国家总应该团结一致。事实上，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温和派与激进派也在斗争的策略和任务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有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可能会由于这种分歧而导致垮台。西非、赤道非洲和东非可能分裂成为对立的国家集团，彼此公开指责并暗地进行颠覆活动。地区合作组织可能陷于四分五裂。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都竞相争当非洲的领导。

但是，这三个为首的非洲国家的财富也无法满足非洲较小而又贫困的国家的需要。其中有些这类国家将集结在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喀麦隆和肯尼亚等这些温和国家集团的周围。这个温和的国家集团同西方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听任外国继续渗透。而这样严重的外国势力又给这些国家带

来了一批贪污分子，而且创造出来的大量财富不是流入外国就是落入统治集团的手中，从而引起低层社会的不满和动荡。在八十年代，上述四个国家的创始人将失去其原有的特色。他们的部下都将竭力保住自己的职位，只关心眼下的利益而不愿加速国家的发展。当年事已高的领导人都相继去世以后，他们部下的统治将是不得人心，接着便是军人上台执政。上台的军人在大力恢复秩序的同时，首先要干的就是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措施（国有化）吓坏了外国投资，于是军政权便将他们的策略改变为保持既得的特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来维持秩序。接着又一次发生军事政变，在此过程中，在邻国流亡的人士当中出现了激进的反对派，于是这两个非洲国家的关系便恶化了。

已经缩小成为一个空谈原则讲坛的“非洲统一组织”，目前又由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更加四分五裂了。“非洲统一组织”甚至对于非洲国家之间的一些细微的争端都无法解决。这种细微争端，起初仅表现为口头攻击，然后发展成为具体的形式：颠覆活动，支持流亡的反对派，提出边界要求，边境事件，甚至动员国家军队。互相竞争的几个主要非洲国家，不仅不出面努力调解，而且总是希望属于自己的一派能够占优势，一旦某一派因此得势后，另一派便向非洲以外的国家请求援助。

非洲大陆由于到处发生争吵，因此经济萧条，极权统治政府日益增多。因为只有这种极权统治才能保护本国稀贵的自然资源免受外来侵略，才能压制国内的需求，并且使本国长期处于军事戒备状态。更为荒谬的是，由于战争的消耗和非生产性活动造成的这种情况，使得非洲小规模的对敌状态不

会进一步变成为广泛的冲突。到八十年代末，外界国家将会认为非洲这个地区已经成为不值得加以征服的地区了。各国之间可能达成不干涉非洲的协议，从而使得非洲大陆成为一个自相残杀的黑人集聚区。

争 论

大家都公认上述两种前景都是相互交错的，因为普遍地认为一种前景与另外一种前景相重叠。一种“平静”的前景是否真的就会给非洲带来好处。而一种“动乱”的前景将会给非洲带来恶果，从理论上讲这是无法保证的。然而目前争论的焦点是，每种前景都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到一九九〇年，非洲的历史实际发展很可能是上述两种前景的内容都兼而有之，另外再加上一些事先无法预料的重要事件。

由于我们所说的未来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计算的，因此无法找到某种孤立的事件可以为人们提供机会，以便从不同的政策中看到不同的结果。津巴布韦经过谈判取得的独立，南非可能出现变革的各种机会，扩大的地区合作，一种新的农业上的自力更生，持续的教育发展，搞现代化的上层人士的不断增多，南北问题的解决方式等等，这些都是明显的重要事件，都是在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时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并且为有关国家提供机会，使它们能够对于非洲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在针对上述各种目标而进行政策上的考虑时，尚需要就各个问题分别地进行研究，本文的目的只是在于提示人们在制定政策的开始就会遇到的一些主要背景条件和内容。

第 三 篇

在日益变化的世界经济中的非洲

史蒂文·兰登、林恩·默特尔卡

导 言

正当非洲进入八十年代之际，整个非洲大陆到处都出现了新的变革模式。同旧的殖民主义明显决裂的国家政权正在纷纷建立起来，强调经济独立的政策正在执行之中，以调整非洲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策略正在形成之中。本文将力求探索这些变革的根源。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审查了独立后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增长策略为什么是不适当的，并且指出了非洲国家目前考虑进行调整的几种抉择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非洲已经明显地存在着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的力量，将促使许多国家采取自力更生的策略。本文将探讨在这种抉择中应采取的最好方针。

在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时，我们先从某些关于发展的概念和政治经济方式着手，按照这种方式就得强调历史过程、国际依附关系和阶级分析。在本文的简介中，我们将概括地论述这种思想，并对整个文章的主要结构进行介绍。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发展概念基本上是强调按人口计算平均国民收入的增加。今天普遍认为这种发展概念已经不

适合于用来评价各类增长模式的效果。事实上，如果主要强调按人口计算平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势必会忽视某种形式的收入增加反而会加重收入不均，就业机会减少和普遍贫困化的加深。因此显然就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概念，这种新的发展概念主要强调减少贫困，扩大就业，并向着更大的社会经济平等的方向迈进。

这样，发展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结构变革和资金积累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将使整个社会更加接近于那种条件，这就是：人民的基本需要（衣、食、住等）都能得到满足，人人都有职业，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在日益形成。相反的，不发达也可被看成是另一种社会结构变革和资金积累的过程，这种过程将促使整个社会向着更加难于实现上述条件的方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不发达的条件下，也可以出现按人口平均国民收入的增加，不过这种增长的方式是少数富人更富，而多数穷人却承受更大的社会负担。因此，不发达同落后是有区别的。

什么因素最易于促成一种经济上的发展过程易于走向不发达而不是走向发达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从下述两个基本设想着手的。第一，本文在分析中否定了经济因素决定一切这个概念。认为按照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纲领进行研究似乎更为有效些。在这种政治经济纲领中，承认广泛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都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第二，我们认为不能把第三世界任何国家的变革过程同世界经济中所出现的变革割裂开来。鉴于大多数这类国家的近代历史上的特点，就是外国的经济和社会的渗透，这点就显得特别真切。早在十七世纪或十八世纪，世界经济关系的体系就已经形成。这种商业一体化将种种外界的联系和

关系引进了“外围地区”^①，从而使得这类地区在其内部实现变革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根本上不同于欧洲宗主国所曾经经历过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学者们，在他们研究依附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用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就可以对外界联系的意义进行分析。

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是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处理依附地位的基础。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区都是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条件下被纳入一种国际劳动分工的。从而在各个外围地区建立了各种不同的制度，并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加勒比地区是奴隶制；在拉丁美洲是一种古怪的封建主义；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农民农业经济。这些不同的组合模式中的社会制度上的**遗留物**形成了“外围地区”的政治经济。即使在外界联系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也仍然是如此。于是在重商主义控制下的封建主义出口生产的残余被看成是拉丁美洲国家同国际经济的最终联系。这样，就在外围地区形成了两重性，在这些地区内，只有少数能进入更具有生产意义的资本主义关系，而大多数则仍然与资本主义无关或很少有关联。反过来，这种两重性又限制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活力（例如，限制了市场的规模）。同样的，加勒比的种植园（奴隶制度的遗留物）也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并阻碍了农民扩大农业生产的推动力量（种植园土地的垄断），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以后也是如此。

在依附国家的这种政治经济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就是

^① “外围地区”，西方经济学家有时也把世界上的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分别统称为“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全都属于“外围地区”。——译者

外部联系对于“外围地区”国家的国内社会关系的不断冲击。强大的外部联系在第三世界国家形成某些社会阶级在国内的统治，这些社会阶级是依靠这类外界联系而发家致富的，并且借此以获得其政治权力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直接地通过对外贸易关系的控制来加以实现，而这种外贸关系又是以同外部联系为基础的；或者间接地通过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加以实现。这个过程可以名之为跨国一体化。通过这个过程，某些“外围地区”的社会集团就更加彻底地被卷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因此，它们就可以从这种外部联系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得到利益。其结果是，在外围国家中形成大多数人民同少数人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它们只是以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的一个部分，或者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边缘地区的一个部分。对于它们来说，资金的积累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它们都面临着技术密集性跨国公司的竞争性冲击。

在依附国家的这种政治经济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保持现状的强烈倾向。当一种政治经济是以围绕某种形式的外部联系而构成时，如果要将这种政治经济向着与这些外部联系相抵触的新的内部结构转变，那末，短期内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高昂的。这种高昂的代价很可能招致强大的社会政治集团的不满，并且形成紧张局势，结果将会促使现政权的垮台。出于对这种高昂代价以及某些人可能从跨国一体化中获得利益的担忧，遂使得一些国家政府倾向于保持已有的外部联系。虽然在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已经着手进行。

这样的三个组成部分，可以综合构成一项分析性的纲领，它对于考察非洲目前的变革将是非常有用的。这项分析工作的中心点，就是论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和调整

对于外围的非洲社会所产生的外部压力和联系。据认为这些压力和联系对社会制度将产生一些作用，并影响当前的变革。更有甚者，这种外部联系还会影响非洲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最后，这种外部条件，还将会对于向新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变形成一种持续的制约力量。甚至在某些已摆脱跨国一体化的政权，以及某些摆脱历史负担任务的政权，也都不能例外。

这方面的基本理论，就是认为在同这些强大的外部联系结成关系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变革和资金积累，过去曾经导致，现在还正在导致许多非洲国家的四分五裂和贫富的悬殊，导致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大多数非洲人的严重贫困化。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考察这类过程的动向和非洲国家所能选择的策略，并且据此而对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发展前景进行估价。

在本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对于非洲经济的历史形成进行论述，并对于非殖民化进行了探讨。在第三章中，我们研究了黑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并且提出许多非洲国家被迫在当前条件下，寻求新的抉择的原因。在第四章中，我们审查了上述这些抉择，并且指出这些抉择的发展局限性。最后，在结论中，我们探讨了自力更生的策略。我们相信，本文所探求的走向自力更生策略的变革方式，将在八十年代为许多非洲国家所采用。

第一章

非洲政治经济的形成

非洲经济是在以往的五个世纪内，通过同欧美国家的扩张性商业经济往来而形成的。这些欧美国家一心寻求的只是奴隶、棕榈油、棉花、咖啡、铜以及其他种原料。非洲则是在强力压制下（如直接的殖民统治、课税政策、军事的或政治的行动），或者通过国际市场价格关系的渗透而被迫提供这些货品的。非洲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被压榨的对象而进入国际劳动分工的。本文将专门就非洲的上述发展过程及其后果进行探讨。

开始，欧洲人同非洲接触的动机只是希望能冲开非洲大陆，使非洲同欧洲国家及其属地建立起直接的贸易。原来都是跨越撒哈拉大沙漠经由北方出口的黄金、象牙和其他珍贵的货品，也同样成了新的非洲沿海贸易中的早期商品。虽然直到一四八二年前为止，葡萄牙人还未能在非洲沿海建立起第一个贸易据点，但是到了十六世纪初，来自埃尔米纳^①贸易据点的黄金就已占当时全世界提供的黄金的数量的十分之一。十九世纪，阿散蒂^②经过一系列战争之后才被英国征

① 埃尔米纳，系位于加纳南部的一座海港城市。一四八二年，葡萄牙商人开始在此建立贸易据点。——译者

② 阿散蒂，位于加纳中部的一个地区，面积二万四千多平方英里。原为一个古代黑人王国，十九世纪初叶，英国殖民者开始入侵，经过四次战争，终于在一八九四年沦为英国保护地。一九〇一年并入黄金海岸成为英国殖民地。加纳独立后划为一个地区。——译者

服，然而在此之前，欧洲人从未能控制黄金或黄金的生产。

巴西黄金的发现，使得欧洲人在非洲淘金热潮有所衰减。与此同时，新世界对劳动力的需求却日益上升。奴隶遂成了非洲的主要出口商品。到十七世纪末期，当时最大的贸易公司“皇家非洲公司”的收入中，有五分之三系来自奴隶贸易。

关于奴隶贸易的后果，即使不能在这里详细叙述，但也值得扼要地列出。因为我们看到的，目前非洲这种不发达的格局中的几个主要特征，都是同奴隶贸易有关的。

第一，奴隶贸易在非洲开创一种牢固地依靠单一商品的开放性交换经济。围绕着奴隶贸易出现了许多财富和权力中心。因此，一旦奴隶贸易被废除，就必然要激发起对新的主要商品的寻求，并且宁愿努力加强对外贸易也不愿发展以本地或本地区市场为主要对象的商品生产。

第二，奴隶贸易推动了沿海城镇的兴起，从而加速了原有的萨赫勒商业中心的衰落，并造成非洲内陆贸易联系的中断。非洲的商业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沿海的集散地，进而通往欧洲。到十八世纪末，法国旅行家报导说，在非洲只保留着一个原有的商队，沿着西撒哈拉的路线在活动，每隔两三年往返一次。

第三，以奴隶作为主要商品，就毋需改革当时已有的生产方法，也毋需进行生产的商品化，因此也就不会刺激更多的发明创造。以奴隶作为主要商品，使得非洲人口大伤元气，从而进一步缩小非洲内部市场。再加上奴隶贸易控制在少数人手中，财富自然就相对地集中，所有上述因素综合起来，就极大地阻碍着非洲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通过进口消费品的办法以满足非洲上层人士的需要，而不去发展本地技术，促进当地生产，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上述发展

过程中，非洲早已建立的炼铁、食盐和纺织工业都遭到了摧残。奴隶贸易对于其他商品的生产 and 出口贸易也都具有抑制性的消极作用。

第四，靠贩卖奴隶而发家致富的非洲上层人士，只有通过同欧洲贸易行业密切相联才能保持住自身的财富和权势。实际上，对欧洲武器的依赖造成非洲上层人士的软弱性，从而使得欧洲国家得以在那批争权夺利的人物当中进行操纵，并且终于迫使这些非洲沿海的王国都沦为殖民地。一八〇七年宣布废除奴隶贸易^①，后来英国又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要求加强这项禁令，并且要求有权拦缉非洲沿海港口贩运奴隶的船只，从此英国在非洲的势力就明显地日益扩大了。

总之，在奴隶贩卖时期，西非的贸易输出实际上已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毫不相干，而是一种典型的外国圈占领地的活动。这种活动对于非洲收益的分配、劳动就业和企业职权都发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就在这个时期里涌现了一批非洲上层人士，他们由于同欧洲人的贸易利益紧密相联而得势致富。因此，除了迎合欧洲人的需要以外，不可能指望他们能在生产和贸易方面采取任何主动。

当奴隶贸易在西非日趋衰落时，这项贸易却又在东非兴盛起来。整个十八世纪，坎巴人和尼卡人控制着象牙和皮革的陆地贸易通道，他们再通过以蒙巴萨为基地的斯瓦希里商人的贩运，输往欧洲、印度和美洲。此外，为了在同内陆贸

^① 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非洲很早就出现了奴隶贸易。只是到了后来，由于各种因素以及一些英国人道主义者的大力呼吁，英国政府才在一八〇七年宣布在所有英国领地内禁止奴隶贩卖。——译者

易中以项圈、鼻烟盒和火器作为交换品以换取象牙和皮革，坎巴人也能进行生产并同内陆人民开展各种以当地产品为主的市场贸易。坎巴人箭用毒药，从铁矿石中冶炼的铁，作装饰用的项圈，以及野味肉类、铁砂、烟草、蜂蜡、三帆船袋和其他食品在内陆的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沿海象牙产地的大象日益稀少之后，斯瓦希里商人便开始向内陆市场扩展。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对奴隶的需求又大大兴起。在法国统治的毛里求斯岛和留尼汪岛上的种植园事业日益兴盛，桑给巴尔和奔巴岛上阿拉伯阿曼人从事的丁香生产也发展起来，这样就大大地刺激了对东非奴隶的需求。到一八一〇年为止，每年在基尔瓦和桑给巴尔岛卖出的奴隶达八千人之多。虽然，由于英国废奴主义者的压力，法国对奴隶的需求减少了，但是桑给巴尔对奴隶的需求却仍然在上升，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估计当时在桑给巴尔市场上贩卖的奴隶每年有四万五千人之多。只是到一八七三年，英国同桑给巴尔签订了条约之后，东非的奴隶贸易才逐渐消失。

与西非情况相同，奴隶贸易的废止才有可能在东非出现“正统”的商业。这时的商业并不是以珍贵货品为基础的贸易，而是一种向当时正在进行的欧洲工业化提供基本物资的贸易。

在西非，棕榈和花生取代了奴隶，一跃而成为主要出口商品。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欧洲的肥皂工业和各种机器的润滑都需要油类。这种新的主要商品带来的物质财富又为新的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阶级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出口市场。个体的农户拥有少量资金，雇用家庭成员的劳动，使用传统的工具，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这种

生产。向棕榈和花生生产的转移，使得更多的非洲生产者被卷入国际劳动的分工，而且标志着非洲开放性的交换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在十九世纪期间，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激起了非洲内陆地区，如现在的马里、上沃尔特、卢旺达、布隆迪和马拉维等国家向矿业和农业生产中心的大量移民。随着沿海贸易中心的开发，矿产地区和以出口为主的农业地区的加速发展，非洲内陆地区就充当了保留地的角色。劳动力逐渐地变成它们的主要出口商品。

对于一般农民来说，棕榈和花生的生产很少有可能使他们能积累资本，也不会促进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或者使用机器。由于棕榈和花生的生产完全依赖欧洲对油类的需要而定，这方面经济活动的起落又是同欧洲经济的兴衰密切相关。当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〇年，欧洲两次处于萧条情况时，油类的价格也随之大跌，对此即使采用提高生产的新技术也完全无济于事。非洲的棕榈和花生生产收益也大大减少，生产自然就要出现倒退。

正是在这段时期里，黄金海岸的农民自发成功地引进了可可生产。在一九一〇年，可可在黄金海岸输出的总值中占34.5%。到一九一五年又上升到64%，从而取代了棕榈油和棕榈仁的出口。自从一八八六年以来，棕榈油和棕榈仁一直构成黄金海岸出口的一半。另一方面，欧洲也希望非洲的生产进一步实现商品化，以便为他们实施殖民统治提供新的尝试，因为一八八五年的柏林会议规定了具体占领是作为享有领土主权的先决条件，因此，首先必须实现生产的商品化。

第二章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政治经济

尽管在殖民主义统治下，主要的生产方式有着千差万别，但是任何地方的殖民统治，总是要加强非洲在国际分工中的被压榨的地位，总是要进行大量掠夺，从而使得非洲国家内部难以积累资金；总是要加强内部生产的垄断性，并且总是会使非洲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殖民主义已经使非洲的政治经济有了固定的形式，因此，在独立初期，要想进行重大社会变革就显得非常困难。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殖民地中，摆脱殖民统治后上台执政的那批人物正是后来同国际资本休戚相关的理想伙伴。

商品生产

用以取代棕榈和花生的品种是很多的。因此，殖民地国家面临的任務就是寻求新的出口商品。这点既反映了宗主国的经济需要，也反映了殖民地国家课税基础的需要。当尼日利亚仍然是棕榈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时，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殖民地，肯尼亚和赞比亚的外国移民，直接管理着赞比亚和扎伊尔的私人公司以及法国建立的在赤道非洲进行商业生产的租让公司，都纷纷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马里、上沃尔特、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农民被引向棉花和可可生

产。在坦桑尼亚建立起西沙尔麻种植园，在肯尼亚和象牙海岸建立起咖啡农场，在加蓬开发木材，在赞比亚和扎伊尔开采黄金、铜、镁、锌、铁、钻石和铀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最大规模而又协调一致的力量是花费在试图发展棉花的生产上。

纺织工业是第一次欧洲工业革命的主体。欧洲纺织工业的发展又是依赖从美国进口原棉的。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后来美国本身纺织工业的发展，造成欧洲国家原棉的严重短缺。这样就推动了非洲殖民地国家同欧洲纺织工厂主结成后来的联盟。

一九〇二年，英国成立“棉花生产协会”，以推动坦桑尼亚棉花的生产。到一九一二年，坦桑尼亚输出的棉花价值近五十万美元。一八九九年，在法属赤道非洲成立了领土租让公司，目的是为了发展并攫取工业用的出口农产品，主要的是棉花。到了一九五〇年，法属赤道非洲提供的棉花占法国殖民地棉花生产总产量的80%，可以满足法国对原棉的需求的11%，每年替法国节省了三千万美元，否则，法国就得花这笔钱到美元地区去购买棉花。在中非帝国和乍得，当时至少有一百五十万成年劳力，是部分地或全部地依靠出售棉花以挣得现钱。法国政府资助的机构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发展工作，其目的也是为了支持向法国出口热带农产品。四十年代建立了第一批这类的机构：“油类研究所”、“棉花和出口纺织品研究所”。它们同“法国发展纺织纤维公司”这类的私营公司配合工作，并接受殖民国家的委托研究促进热带产品的商品化问题。在西非，棉花种植也兴盛起来，并且成为与花生竞争的主要商品。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棉花对土地具有特定的要求，集中生产棉花必然导致粮食生产的下

降。由于畜牧业的扩大和土地使用不当，使得农牧业的灌溉系统和土地肥力都遭到破坏。这样就影响了萨赫勒地区人民抗拒不正常气候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都屡有出现，而且使得后来的粮食饥荒更为恶化了。

坦桑尼亚的种植园体系也给坦桑尼亚未来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遗留了消极的后果。因为西沙尔麻和其他种植园发给工人的工资太低，工人只得被迫依靠住居在农村的家庭成员提供生活上的保障。因此，种植园的工人大部分是季节性的。种植园主无力雇用固定工人，因为雇用季节工人既可节省劳动资本，又可以减少雇工。这样就使得坦桑尼亚工人长期处于缺乏技术的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

最后，象肯尼亚这类的移民殖民地同象乌干达这类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殖民地，两者对比，就可看出在生产、就业和输出数量方面的明显差别。到一九三七年为止，乌干达的出口量两倍于肯尼亚。在乌干达的出口中，80%来自非洲农业，主要是棉花。与此同时，肯尼亚的出口商品中，来自非洲人的产品不到15%，而且其中一半以上的是皮革。在乌干达的生产中，小商品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相对照之下，欧洲人则多移居在肯尼亚，以便从蒙巴萨到乌干达产棉区之间提供足够的公路运输。为了充分利用在肯尼亚吉库尤高地已获得的大片土地，欧洲人允许吉库尤人耕种他们占有的土地，但要付出一定的租金，他们或者雇用少地的吉库尤人替他们耕种。由于殖民政策，这些吉库尤人得不到足够的土地来养家活口，更交纳不起应付的捐税。在二十年代中期，一半以上的吉库尤人和邻近的罗族人的强劳力都是替欧洲人干活。远在一九一二年，在肯尼亚的总输出中，非洲人的产品输出占70%，到一九二八年下降到20%以下，从一九二五年

起，非洲人出口的产品总值又进一步下降。因为他们的保留地要更多地用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而且还要用以支持欧洲人农场里雇用的非洲农业工人，这些农业工人的生活通常是非常艰苦的。对吉库尤农业劳动工人的压榨，并剥夺他们的土地，终于驱使吉库尤人群起造反，并发展成为有名的“茅茅反抗运动”。

盈利的分配过程

非洲的农业、矿业和输出均日益增长。但是这些部门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盈利，即使大部分生产都集中在非洲人手中，也未能促进殖民统治下非洲人民资本的积累。其中原因很多，主要的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殖民地国家总是希望能经费自给。这就是说，它们要自行负担一切行政费用。当个别殖民地无法取得收支平衡时，它们就同比较富裕的殖民地结成联盟。例如“法属西非联邦”、“法属赤道非洲联邦”和“东非经济和关税同盟”等等，通过这类的组合，盈余就可以转移。法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投资基金会”建立于一九四六年，即使法国给这个组织拨出了一笔基金，但也都是用于非生产性建设，例如一些基本设施的建设，特别是行政大楼和飞机场，这类的建筑反而使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背负着高额的维修费用。还有就是用于地质勘探和促进出口农业品的生产，所有这些都加强了殖民经济对外倾向的特征。用于工业发展的拨款如此短缺，只能使这类殖民地经济中倚重于初级产品生产的现象长期不变。

第二，根据殖民地必须自给的政策而制定的预算说明，外国移民的工资是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项目，其次是退休金。

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九年，加纳预算中的经常性支出平均约占63%。直到后来的五十年代，塞内加尔的总预算支出中，政府工资仍占46%。殖民地政府的预算中，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用于住宅、卫生和教育事业方面。尽管当地非洲人担负着沉重的捐税，而拨款中却大部分都是为殖民地的外国移民谋求福利。

铁路只经过欧洲移民住居的地区（如肯尼亚和赞比亚），或者专为欧洲移民拥有的矿山服务（如加纳西部），而非洲人的可可农场却没有铁道交通（如加纳的东南部）。道路、医院和卫生设施都修建在欧洲移民住居区，而非洲人的城镇和乡村地区则完全置之不管。非洲人要交纳额外的捐税用以维修公路和开办非洲人学校，而欧洲人移民区的上述费用却完全由政府总预算中支出。欧洲商人通过关税保护享有的进口特权，可以在市场上大获赢利，并且享有铁路补贴，而他们的非洲同行却因此而大受其害。

第三，垄断权的建立，也是为了在积累资本的过程中排斥非洲人，并按照外国移民的利益来分配这些积累的资本。利润最大的出口农产品（如肯尼亚的咖啡），或者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如最优良的农业土地（如肯尼亚的白人高地），或者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应（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法国、比利时在非洲的海外领地都实行的徭役制^①）。所有这些，都由殖民地国家建立并长期保持不变。采取发许可证的方式，也是为了打击非洲的竞争者。在公路运输的竞争中，他们就利用外国移民矿山和农场专用铁路线这个有利条件来挤

^①：在法属西非，徭役制一直执行到一九四六年，规定有劳动能力的非洲男人每年必须为公共工程劳动十五天。——译者

垮对方。

欧洲私营公司建立的垄断是得到殖民地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类垄断可以控制外贸、航运的价格以及可可和棉花收购的价格。在出口贸易方面，“联合非洲公司”、“法国西非公司”等几家外国移民企业，就操纵了西非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二；在航运方面，“埃尔德尔·登普斯特”控制着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航运，“搬运公司”和“法布赫·弗赫西内”则控制着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航运；在可可收购方面，则由一九三七年在加纳建立的“可可联营”控制。在法属西非的棉花收购，则由“法国纺织和纤维发展公司”控制。带垄断性的外国移民买主同非洲本地的商贩和小生产者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严重地限制了非洲资本的积累。信贷上的不公平对待和少数外国移民银行的垄断，使得非洲农民和企业无力扩大生产，赚取盈余，积累资本，并对先期带动^①企业进行投资。

“销售局”这个机构也是用以调节农业生产并对获得的盈余进行分配。加纳可可销售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加纳可可销售局通过对可可收购的垄断，可以将可可的收购价格规定在世界市场价格之下，因此，这个“销售局”很快地就积累了大量盈余。如果世界市场上的可可价格下跌，“销售局”仍然保持原来的收购价格，以便可可农民保持稳定的收入。从理论上讲，可可“销售局”通过稳定可可收购价格，就可以鼓励可可的生产。但实际上，从一九四七到一九六一年，可可农民每年的平均收入只抵可可出口价值的54.7%。

^① 先期带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外国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有两种促进作用，促进利用外资企业的产品的本地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先期带动”。——译者

结果是可可“销售局”积累了大量盈余，到一九五八年就已达到一亿四千八百万美元。这笔盈余是以低利率投资于英国的长期安全事业方面。事实上，也是殖民地给了英国大批贷款以帮助战后恢复工作。

英国在东非建立了货币局。法国也在西非和赤道非洲建立了同样的机构。通过货币局，可以稳定外汇兑换率，并推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此外，货币局还被用来作为促使非洲的盈余向欧洲转移的一个机构。货币局可以决定非洲国家货币的供应量，因此也就掌握了非洲国家外汇储备和国内的信贷政策。

工业的发展

非洲农业和矿业的日益增长的输出不仅没有使非洲能积累更多的资本，而且在大多数殖民统治时期内，殖民国家通过压制殖民地国家的加工和制造业的发展，竭力限制殖民地内部的带动效应^①，进一步造成殖民地经济更加支离破碎。十九世纪，法国禁止在塞内加尔提炼石油。西欧的中心国家保持着制造工作，而象非洲这样的外围地区国家则负责提供矿产品和农产品原料。殖民国家就是要巩固这种国际劳动分工。这样干的并不单是法国一个国家。为了上述同样目的，英国的殖民政策也积极压制殖民地的先期带动作用。例如，当坦桑尼亚的西沙尔麻的生产者开始生产麻线，英国麻线工厂的老板们在同这些坦桑尼亚西沙尔麻生产者发生竞争，可能会遭受挫折时，于是英国就强迫坦桑尼亚的公司同英国

^① 带动效应，系指一种工业带动另外一种工业的建立或发展的能力。

——译者

的有关联合会进行商谈。只要达成协议，规定由英国的联合会来决定英国西沙尔麻产品的价格，坦桑尼亚的西沙尔麻工业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垮台的。

到一九四九年为止，非洲的工业还仅限于轧制棉花、磨面粉以及剥皮去核等行业。在刚果，只是到一九三八年才开始制糖。在喀麦隆，一九四四年才开始建立锯木厂。进口烧碱并利用当地的油脂制造肥皂的工业，在非洲是在三十年代才开始的，在象牙海岸用的是棕榈油，在坦桑尼亚用的是椰子油。而且所有这些加工活动的极大部分都不是掌握在非洲人手中，在西非掌握在欧洲人手中，在东非掌握在欧洲人和亚洲人手中。

到了五十年代，殖民地国家工业化的格局有了改变，一些大的欧洲企业开始对殖民地的装配和制造行业进行投资，而且这些工业都是面向当地市场。欧洲消费品制造商原来都是通过输出商品而打入非洲市场。当他们发现由于殖民地国家的国际收支问题限制扩大这些国家的进口，而且由于进口税的负担和垄断性航运业以及外贸利润等业务上的负担，使得非洲的市场日益狭小。更为重要的是，殖民统治时期新生的非洲资产阶级早已倾向于购买欧洲货物，而且他们对于欧洲企业在非洲设立工厂表示赞同。在五十年代，喀麦隆开始自行车的装配行业；中非帝国和塞内加尔开始纺织工业的生产；西非和赤道非洲的许多国家开始啤酒的生产；尼日利亚开始有了服装制造行业；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刚果开始香烟的生产。可是这类工业大部分都掌握在欧洲人的手中。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社会结构

表一从国民收入、带动效应、社会基础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的效应方面，对殖民主义时期所形成的工农业生产和所有制的模式加以广泛地总结。然而本表对于殖民主义孕育下产生的并一直持续到独立以后的时期的社会结构，未加披露，而这种社会结构又产生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利益同国际资本有紧密的联系。

处于发展中“外围地区”经济的社会结构由于各种殖民地生产模式的不同而具有相当大的差别(参看表一)。例如，在农业地区，国际资本的渗透使得非洲那批仅能糊口的小生产者也卷入一种新的商业关系之中。在加纳、乌干达和尼日利亚这类的殖民地国家里，农民是作为重要的社会阶级而出现的。而在一些大型矿产地区，例如赞比亚和扎伊尔，在政治经济中，农民就不显得重要，相反的，城市的工人却是作为一种更加自觉的社会力量而出现的。在拥有大量种植园的坦桑尼亚，格局又有明显的不同。在坦桑尼亚，有组织的种植园工人成了殖民非洲社会的主要力量，而且也是反对殖民社会结构的民族主义力量。在肯尼亚这类外国移民的经济中，农村中擅自占地的农民(一种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成了重要的社会阶级。在肯尼亚，随着外国移民的来到而产生了一些工业和社会基本设施，同时也就出现了一批以工资为生的城市劳动大军。上述的肯尼亚农村无产阶级同这批城市劳动大军，在相互影响下，终于形成一种反对移民统治的社会基础。这种外国移民统治可算是一种非常顽强的殖民主义形式。

尽管社会的基本结构有所不同，但是在整个非洲殖民

表一：非洲殖民地经历暂时分类表

殖民地生产性质	
农业经济生产，如加纳（可可） 乌干达（棉花） 塞内加尔（花生）	大规模矿业生产，如赞比亚和扎伊尔（铜）
种植园农业生产，如坦桑尼亚（西沙尔麻）	外国移民经济，如肯尼亚，安哥拉
劳动力输出地区，如上沃尔特	
影响的领域	
当地收入效应	高，广泛
社会两极分化的效应	非洲人民和地区之间中等
带动效应	后期带动中等 先期带动很低 最终需求很高
收入波动问题	高
基本结构的建设情况；教育，通讯，保健	高，广泛
	低，集中
	在非洲人民和地区之间很低
	在种族之间很高，在非洲人民地区之间中等
	低，集中
	在种族之间很高，在非洲人民地区之间中等
	低，广泛
	在非洲人民和地区之间很低
	先期带动和后期带动都低，最终需求属于中等
	低
	中等
	高，但很集中
	低
	中等
	高，广泛
	低
	很低
	很低
	十分低
	很高，特别是先期带动
	中等
	高，广泛
	很低
	很低

资料来源：系本文作者自行编制。

地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现象。在每一个殖民地，宗主国的经济交换关系和宗主国文化制度的渗透，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是随着贸易和殖民官僚制度提供新的经济机会而产生的，它们同宗主国的文化紧密相联。戈弗雷·马蒂索将这个阶级的成员描述为：他们“反对传统社会的现存的结构。……在殖民社会，他们被传教师任用为助手，并替行政长官充当秘书和小职员，这样他们就转变成向非洲社会渗透的工具。”

上述的这个概念很巧妙地表达了宗主国的文化和教育的同化作用，这点也正是它们将要达到的经济地位所具有的特征。在贸易往来和国家机构中，这些非洲人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这种中间人要求具有通晓宗主国文化和使用宗主国语言的能力，当然也要求对宗主国以外的非洲边缘地区的文化拥有一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功。这些人在一个殖民化的国家官僚机构中所担任的角色，完全是从属的，在经济上所享受的机遇是微小的而且深受占统治的宗主国经济活动家的严格限制。

加纳的情况，就是上述这类人的作用受到严格限制的一个突出的证明。在加纳完全实现殖民化以前，英国在沿着黄金海岸向内地渗透的活动中，有一点表现得最为突出，那就是在商业贸易和英国管理机构的高级职位中，非洲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加纳沦为殖民地以后，信贷条款变得更加偏向于贸易公司，非洲人发现他们同这些贸易公司的竞争力量大大降低了。他们于是被迫充当掮客的角色，自己积累资本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而更加依赖于他们的雇主外国企业。这样一来，如果按照资产阶级这个名词的定义来衡量，在非洲根本就不存在着资产阶级，而取代他们的是一

个受限制的、以小商贩和运输行业为主的小资产阶级。这批人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级而出现了。同样的，直到殖民时代的末期为止，由于肤色的限制，非洲人难以进入政府担任重要职位，结果在殖民机构的次要部分又出现了一个以秘书和教员为主的小资产阶级。

在非洲某些国家，有些酋长有可能依仗他们在传统社会所享有的权势，摇身一变成了殖民统治下经济界的重要人物。例如成为加纳的富有的可可种植农和象牙海岸的可可种植园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末就可以说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农村出现了资产阶级。不过这批人即使成为资产阶级，通常也都是很软弱的，而且在不断发展的殖民化的变化中，所具有的社会力量远远不及小资产阶级。

非洲的这类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觉悟和政治思想是很鲜明的，法朗兹·法隆曾经对此作了一番刻薄的描述，

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既不从事生产，也不从事于发明创造，既不盖房子，也不做工。他们完全投入于中间人这种类型的活动之中。他们最核心的职业就是领导非法买卖，而且成为这种非法买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是一种商人的心理，而不是工业界巨子的心理。如果说由于外国移民的贪婪和殖民主义建立的禁令迫使他们别无选择，那也是不真实的。……民族中产阶级发现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发挥中间人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变革是同他们的使命毫不相干的。他们的使命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相互沟通。他们虚伪而猖狂。今天，这种资本主义又带上了新殖民主义的面具。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的商业代理人感到非常心满意足。他们心安理得地带着一种高傲的心情来完成他们的这项任务。但是，这种赚钱的角色，这种短浅的目光以及这种雄心的湮灭，充分地说明民族

中产阶级毫无力量以完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①。

这类小资产阶级常常成为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因为殖民主义者，出于他们的本性，总是企图将重要的中间调节的作用掌握在宗主国的手里。而这些非洲集团却利用独立的机会将这种中间调节的作用完全转入了他们的控制之下。由于在殖民统治下，这批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作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的这段发展历史应被看作非洲小资产阶级无力完成独立后的社会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

政治上的独立是实现了。由于肤色的限制和宗主国贸易公司的控制，这类小资产阶级并未能完全被西方同化。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出现了。用马蒂索的话来说，一个所谓“不调和的小资产阶层”出现了，切断了走向彻底资产阶级化的进程，并且转而反对社会上的另一部分人，以便使工人和农民中长期对殖民主义的不满情绪更加激发起来。面临着加纳和乌干达的暴乱，马尔加什的反叛，肯尼亚的茅茅运动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罢工和政治抗议，欧洲国家感到维持殖民统治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与此同时，西欧主要的经济界开始其策略的转变，也为原有的殖民统治的变更铺平道路。例如，宗主国的贸易公司准备打入外围国家的工业生产，正如五十年代“非洲联合公司”在西非所干的那样。欧洲的工业企业也表示宁愿在殖民地国家内建立从事工业的分公司，而不是更多地依靠这些国家的进口市场。总之，西欧在贸易上通过中间人而谋取的经济利益是大大地降低了。

① 见法朗兹·法隆著《地球上的受苦者》一书，纽约一九六八年版，第一四九—一五三页。

第三章

独立后的非洲

非殖民化对于非洲的发展前途并不是毫不相关的。殖民主义“强加的贸易互惠主义”被取消了，非洲国家商业上的选择自由有所扩大。曾经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利用他们新近掌握的国家政权，将中间人的作用完全抓在自己手里。非洲地区开始建立了货币控制和关税壁垒，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经济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封闭”了。然而，新生的非洲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特性，改变发展格局的任何策略所需付出的代价，再加上西欧国家为了保持原有的联系所施加的压力（从外援到军事干涉一整套的手段），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大大地限制了非殖民化的冲击力量。

非洲各地的资料表明，独立后的非洲经济中仍然保持着严重的收入不均；大部分居民仍陷于绝对贫困之中（参看表二至表四）。此外，非洲经济仍然是以生产原料并向原宗主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市场出口作为主要的方向。当然，出口的市场也有些多样化，那就是扩大到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其他国家，突出的是西德和荷兰。在三十五个独立的非洲国家中，只有八个非洲国家是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外的国家作为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同样的，我们发现只有毛里求斯的主要出口的货物中包括着工业产品。非洲的社会结

表二：收入的分配

年	人口平均国民产值 美元	国民收入分配			1969年收入75美元以下者 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估计	
		最低 40%	中等 40%	高级 20%	百万	占人口的比例
贝宁	87	15.5	34.5	50.0	2.3	90.1
乍得	78	18.0	39.0	43.0	2.7	77.5
加蓬	497	8.8	23.7	67.5	3.1	15.5
象牙海岸	247	10.8	32.1	57.1	1.4	28.5
肯尼亚	136	10.0	22.0	66.0	—	—
马达加斯加	120	13.5	25.5	61.0	4.7	69.6
尼日尔	97	18.0	40.0	42.0	2.3	59.9
塞内加尔	245	10.0	26.0	64.0	1.3	35.3
塞拉利昂	159	9.8	22.4	68.0	1.5	61.5
坦桑尼亚	89	13.0	26.0	61.0	9.3	72.9
乌干达	126	17.1	35.8	47.1	4.1	49.8
赞比亚	230	14.5	28.6	57.0	0.3	7.5

资料来源：霍利斯·切纳里等著，《增长的再分配》，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表 1.1，第八—九页，表 1.2，第十二页。

表三：1961年和1975年非洲输出的组成和去向

国名	产品	贸易组成		贸易去向		
		1961 (%)	1975 (%)	贸易伙伴	1961 (%)	1975 (%)
西非						
贝宁	皮棉	—	27	法国	73	53
	可可豆	—	19	尼日利亚	—	14
	棕榈产品	72	15	西德	—	14
	总额	72	61 ^a		73	81
冈比亚	花生油、肉类			英国	50	50
	石油、食品	93	95	荷兰	—	21
	总额	93 ^b	95	意大利	—	—
				50	71	
加纳	可可	60	64	英国	29	15
	木材	13	11	美国	23	11
	总额	73	75 ^c	荷兰	12	10
				64	36	
几内亚	铝 ^d		72	法国	18	
	菠萝		10	喀麦隆 ^d	11	
	咖啡		6	苏联	9	
	总额		88 ^e		38	
象牙海岸	咖啡	43	24	法国	52	27
	可可豆	21	19	美国	14	10
	木材	18	14	荷兰	7	10
	总额	82	57		73	47
利比里亚	铁矿砂	57	74	美国	46	22
	橡胶	29	12	荷兰	22	—
	钻石	5	5	西德	—	21
	总额	91 ^b	91		68	43
马里	棉花	6	39	法国	18	23
	花生	38	15	象牙海岸	25	6
	鱼类	23	2	中国	—	29
	总额	67	56		43	58

(续)

国名	产品	贸易组成		贸易伙伴	贸易去向	
		1961 (%)	1975 (%)		1961 (%)	1975 (%)
毛里塔尼亚 尼日尔	铁矿砂	82	88	法国	32	22
	花生	67	15	法国	78	66
	铀	—	43	西德	—	15
	总额	67	58	尼日利亚	16	—
				94	81	
尼日利亚	原油	7	93	英国	44	13
	可可豆	19	4	美国	11	26
	棕榈仁	11	—	荷兰	13	10
	总额	37	97		68	49
塞内加尔	花生油	83	39	法国	76	47
	食品	4	22	英国	3	8
	磷酸盐					
	总额	87	61		79	55
塞拉利昂	钻石	54	54	英国	79	52
	铁矿砂	16	11	荷兰	9	13
	棕榈仁	8	4	美国	—	12
	总额	78	69		88	77
多哥	磷酸盐	3	79	法国	58	39
	可可豆	28	12	荷兰	10	32
	咖啡	27	4	西德	—	10
	总额	58	92 ^c		68	81
上沃尔特	牲畜		36	加纳	78	—
	皮革和毛皮		18	法国	11	29
	棉织品		16	象牙海岸	3	26
	总额		70		90	55

(续)

国名	产品	贸易组成		贸易伙伴	贸易去向	
		1961 (%)	1975 (%)		1961 (%)	1975 (%)
中非						
布隆迪	咖啡	87	88	美国		45
	棉花	6	—	西德		22
	茶叶	—	3			
	总额	93 ^b	91			67
喀麦隆	可可	21	25	法国	59	27
	咖啡	17	24	荷兰	14	22
	矾土	17	—	苏联	—	11
	总额	55	49		73	60
中非	咖啡	29	23	法国	69	42
	棉花	45	23	美国	5	8
	钻石	11	20	荷兰	—	8
	总额	85	66		74	58
乍得	原棉	80	63	法国	76	10
	肉类	—	8	尼日利亚	8	15
	总额	80	71	日本	—	4
					84	29
刚果	石油	—	62	法国	26	22
	木材	51	19	西德	31	—
	总额	51	79 ^c	意大利	—	15
					57	37
赤道几内亚	na			na		
加蓬	石油	16	81	法国	56	20
	木材	49	—	西德	16	—
	铀	11	—	美国	—	18
	总额	76	81		72	38
卢旺达	咖啡	12	63	美国		40
	锡	79	13	英国		21
	总额	91 ^b	76	比利时		17
						78
扎伊尔	铜	64	63	比利时	47	39
	咖啡	10	4	美国	13	—
	棕榈油	22	—	意大利	7	14
	总额	96 ^b	67 ^c		67	53

(续)

国名	产品	贸易组成		贸易去向		
		1961 (%)	1975 (%)	贸易伙伴	1961 (%)	1975 (%)
东非						
博茨瓦纳	肉类及肉 类产品		33			
	钻石		29			
	铜、镍、冰铜		20			
	总额		82			
埃塞俄比亚	咖啡	50	31	美国	40	17
	油籽	8	17	意大利	10	0
	豆类	10	13	西德	—	11
	总额	68	61		50	28
肯尼亚	咖啡	25	20	英国	22	10
	茶叶	15	13	西德	14	—
	总额	40 ^b	33	乌干达	—	12
					36	22
莱索托	羊毛		35	南非	大于50%	
	安哥拉山羊毛		18			
	活牲畜		18			
	总额		67 ^c			
马达加斯加	咖啡	29	27	法国	54	25
	香草、香精	10	8	美国	15	15
	丁香	—	7	印度	—	13
	总额	39	42 ^c		69	53
马拉维	烟草	34	48	英国		35
	茶叶	27	20	美国		7
	糖	—	12	荷兰		8
	总额	61 ^b	80			48
毛里求斯	糖	92	84	英国	81	77
	服装	—	6	法国	—	6
	总额	92	90	美国	1	6
					82	89
索马里	活牲畜	27	65	意大利	56	10
	香蕉	48	14	沙特阿拉伯	—	60
	总额	75	79	科威特	—	5
					58	75

(续)

国名	贸易组成		贸易去向			
	产品	1961 (%)	1975 (%)	贸易伙伴	1961 (%)	1975 (%)
斯威士兰	糖		54	na		
	木纸浆		9			
	铁矿砂		9			
	总额		72			
坦桑尼亚	咖啡豆	13	19	英国	35	12
	西沙尔麻	28	12	西德	8	8
	棉花	13	12	新加坡	—	8
	总额	54	43		43	28
乌干达	咖啡	29	75	英国	18	20
	棉花	35	11	美国	14	20
	茶叶	3	6	日本	—	8
	总额	77	92		30	48
赞比亚	铜	88	90	英国	32	15
	锌	—	4	日本	11	17
	总额	88	94	西德	—	14
				43	48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贸易的方向》，一九六〇年——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六年年刊；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一九七六年）；国际货币基金，《国际金融统计》，一九七七年增刊，一九五二年——一九七六年年鉴资料；《撒哈拉南部的非洲》，欧洲出版社，伦敦，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版。

符号说明：a 1972年。

b 1963—64年。

c 1974年。

d 从几内亚船运到喀麦隆进行加工。

e 1971年。

na = 空白。

表四：加工业务和产值

国名	加工业产值 单位：百万美元		加工业占国内生产 总值（按现行要素 成本计算）的百分比	
	1960	1973	1960	1973
西非				
贝宁	0.1	26.5	4.3	7.6
冈比亚	0.45	1.8	2.2	3.3
加纳	118.6	220.7 ^a	9.8 ^b	10.3 ^{d, b}
几内亚	0.4 ^c	2.6	1.2 ^{c, d}	5.6 ^{a, d}
象牙海岸	39.3	403.2	6.9 ^b	15.7
利比里亚	9.3	26.6	3.7 ^e	6.7
马里	11.7	34.8	4.7	9.3
毛里塔尼亚	2.0	9.0	2.6	3.7
尼日尔	10.5	62.9	4.3	12.6
尼日利亚	150.6	873.7	4.8	6.0
塞内加尔	58.7	184.9	9.6	12.8
塞拉利昂	16.8 ^e	26.6	5.6	6.0
多哥	9.3	49.6	8.5	13.1
上沃尔特	12.6	61.7	5.6	14.9
中非				
布隆迪	2.7 ^f	6.3 ^f	4.7 ^{g, b}	8.7
喀麦隆	29.6 ⁱ	251.3 ⁱ	6.1	15.3
中非	7.3	35.9	5.7	13.1
乍得	7.7	26.9	4.5	8.9
刚果	10.1	47.1	8.2	10.6
赤道几内亚	—	—	—	—
加蓬	7.3	40.8	6.1	7.6
卢旺达	0.8	12.3	0.7	4.3
扎伊尔	28.0	255.0	13.2	9.2

(续)

国名	加 工 业 生 产 值 单位：百万美元		加 工 业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按 现 行 要 素 成 本 计 算) 的 百 分 比	
	1960	1973	1960	1973
东非				
博茨瓦纳	2.7	14.5	8.1	8.9
埃塞俄比亚	54.5	239.5	6.1	10.1
肯尼亚	68.6	298.4	9.4	14.3
莱索托	0.4 ^e	2.0	0.9 ^b	2.8
马达加斯加	22.3	156.9	4.1 ^b	12.5 ^b
马拉维	10.1 ^f	73.7 ^f	5.8	14.8
毛里求斯	15.7	45.8	13.1	15.7
索马里	—	—	—	—
斯威士兰	1.5	18.2	5.3	13.1
坦桑尼亚	28.2	174.8	6.1	10.9
乌干达	47.8	131.7	8.8	8.4
赞比亚	23.1	232.0	4.0	13.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表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华盛顿特区，一九七六年。

符号说明：a 1972年；b 市场价格；c 1962年；d 市场固定价格；e 1964年；f 包括矿业、天然气和电力；g 固定要素成本；h 1965年；i 包括矿业。

构也有了某些变化，非洲新生的资产阶级取代了原由欧洲人控制的中间人的作用。经济结构由于工业生产的增加而有所改变。但是，非洲的社会结构和非洲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却未发生明显的重大变革。

在独立后的这种情况下，新独立的国家要想掌握政权是极其困难的。遍及整个非洲大陆的政变和反政变以及各种政治危机，充分地标志着非洲国家在政权问题上的激烈冲突。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也反映了非洲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非殖民化所不可避免的动荡过程。在整个非洲，这部分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成功，独立后，他们企图利用新近掌握的国家权力，从国家财政资源和经济机遇中为自己捞取利益，从而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且变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未能实现这种完全统治之前，正在控制国家政权的这派小资产阶级（通常是一些部族的联合）的地位是非常软弱的，是经不起另一派小资产阶级（常常是以部族为基础的）的进攻的。这一派小资产阶级也渴望通过利用国家资源和有关的法令来加速本身的资产阶级化。以军队为基础的这部分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易于发动有效的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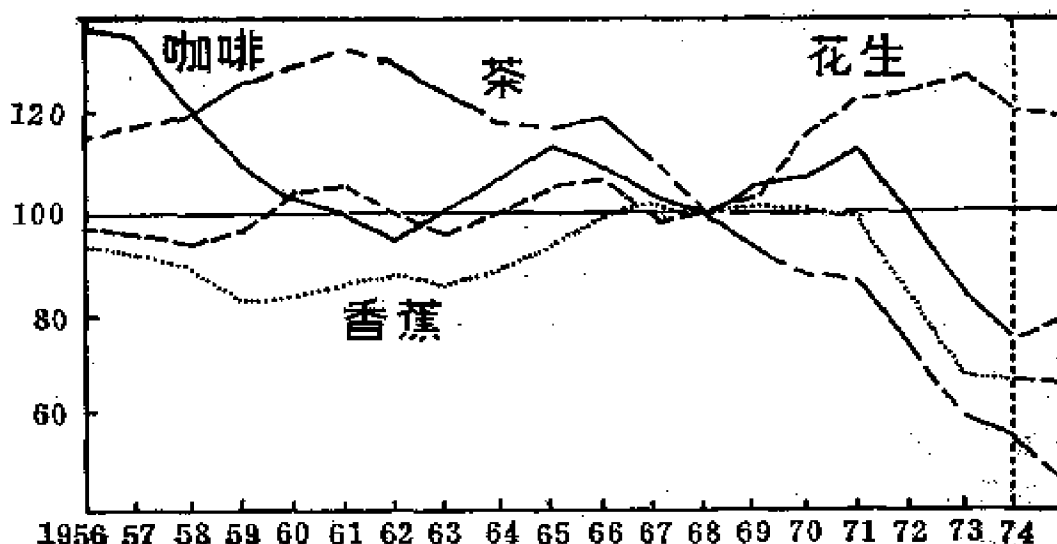
更为重要的是，独立后群众对新政权的不满，也助长了这种政权的更迭，因为独立以后，未能象政治家曾经许诺的那样，尽快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象加纳工会和尼日利亚西部农民所发动的对政府政策的普遍抵制，实际上就是对新独立政权的首次冲击，预示着这类政权将会被不同派别的小资产阶级所颠覆。

商品生产和出口贸易中的矛盾

群众对新政权不满的核心问题，就是大多数独立后的新政权，依靠传统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无法使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到目前为止，非洲国家仍然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经济上的主要支柱。突出的例子如加纳。加纳政府曾经打算对可可的出口寄予更大的希望。但是，这种商品会随着需求的情况而不断发生价格上的涨落。因此，由于市场上可可价格下降，来自这类农产品的总收入实际上就要大大减少。非洲国家出口的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仍然是很不稳定的（图一说明四个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产品价格波动的情况）。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四年，从黑非洲主要出口的商品看，按照这段时期内平均价格的百分比计算，其标准的差价情况如下：可可：21%；咖啡：21%；茶叶：23%；花生：10%；西沙尔麻：28%；棉花：10%；铜：26%；铁矿石：26%；锰矿石：36%。尽管花生和棉花的差价幅度不算太大，而其余商品价格波动的幅度就相当高了。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五年，这种价格上的波动造成非洲社会经济情况的极大起伏，从而给改革社会结构的计划带来极大的困难，并且使得非洲国家几乎无法避免周期性外汇危机。

图一：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

(1967—1969 = 1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主要初级商品的价格预测》。

自从独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国际市场上对大多数非洲出口商品的购买力都是在日益下降。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二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中，以货易货的总贸易比价^①每年下降0.3%，在同时期内，对上述出口商品的购买力（石油除外）每年下降1.4%。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上述这类商品的价格，有过一次明显的飞涨，打破了这种长期的趋势，但是，从那以后，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又下跌了，而且由于需要进口高价的石油，非洲国家贸易比价普遍恶化了（表五提供的详细资料说明，许多非洲国家的农产品相对出口价格如何严重地下降；表六以非洲国家出口收益波动的详尽资料，对这方面加以补充。两张表内都列有与

① 贸易比价，指一国出口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品平均价格之间的对比。

——译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典型国家的对比，显示出与非洲困难国家之间的明显差距)。除了产油国以外，许多非洲国家都深受贸易比价的压力，因为出口收益的波动幅度更加扩大了。

表五：选定非洲国家商品贸易比价指数

(1970 = 100)

国 名	1956	1961	1966	1971	1975
石油输出国					
安哥拉	147	102	100	96	121
尼日利亚	154	118	106	110	298
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埃塞俄比亚	114	82	92	91	81
莱索托	112	110	115	88	85
马里	105	93	102	91	56
卢旺达	120	85	95	86	65
索马里	103	88	96	98	79
乌干达	125	96	94	97	79
上沃尔特	98	86	93	101	70
扎伊尔	83	64	113	77	47
赞比亚	53	59	117	74	45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比					
加拿大	101	98	98	98	108
西德	80	93	95	104	102
美国	89	98	100	98	82

资料来源：A·R·M·里特：《加拿大和发展中国家在初级商品国际贸易中的冲突和一致》，加拿大经济理事会准备的报告，一九七七年，第四十四—五十一页。

表六：选定非洲国家输出波动指数*

国名	1960—1965	1965—1970	1970—1975
年国民平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			
加蓬	3.3	6.7	21.7
年国民平均收入401至1,000美元之间			
赞比亚	9.1	8.2	20.4
象牙海岸	6.6	3.9	13.1
刚果	12.2	11.2	10.7
年国民平均收入201至400美元之间			
尼日利亚	6.7	14.8	21.7
塞内加尔	5.7	6.5	15.0
喀麦隆	6.0	3.9	14.6
加纳	1.8	10.6	13.2
利比里亚	17.3	1.8	6.9
年国民平均收入低于200美元			
多哥	11.1	6.4	28.1
莱索托	4.5	6.6	21.2
冈比亚	9.9	13.6	17.6
扎伊尔	8.2	7.0	15.4
上沃尔特	19.1	8.1	12.4
几内亚	11.1	3.6	10.9
尼日尔	6.5	12.5	10.1
埃塞俄比亚	3.2	5.4	8.6
索马里	7.3	3.0	7.6
坦桑尼亚	7.9	5.2	11.2
马里	16.3	27.5	8.5
塞拉利昂	10.2	6.2	5.6
乌干达	7.2	4.8	5.5

(续)

国名	1960—1965	1965—1970	1970—1975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比			
西德	1.2	2.0	7.8
美国	2.6	1.9	7.8
瑞典	1.7	3.5	5.9
日本	4.9	3.6	5.6
加拿大	3.5	1.6	5.4
英国	1.3	3.7	3.1

• 这些指数为出口收益趋势的年平均百分比偏差数。

资料来源：A·R·M·里特，附表五引证的书，第五十六——五十八页。

少数非洲国家，独立后由于新的出口资源的发现，为它们摆脱这种紧张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尼日利亚和加蓬的石油开发，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博茨瓦纳的铜，都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出路。在其余的非洲国家，有的可能转向新的农业商品的生产（例如坦桑尼亚的楝如树属植物的生产）。在肯尼亚这类国家，农民的生产历来就是被迫用以支持外国移民的农业，因此，扩大农民经济作物的生产仍然会给国家经济带来新的推动力量（新发展的茶叶和除虫菊的生产就特别引人注目）。但是，一般地说，初级产品的生产并不能使掌握中间调节作用的资产阶级迅速提高收益，以满足其本身资产阶级化的需要，并使群众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其结果就是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

这种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策略带来的矛盾，又迫使非洲国家试图通过其他的手段来推动其经济的发展和盈余的

积累。突出的就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以发展取代进口工业作为自己的目标。许多非洲国家还努力建立超出一个国家范围之外的地区性一体化的联合。由于这些努力的动向也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同样地不能促使非洲经济的发展。下面两章将专门探讨这些策略为何遭到失败。

取代进口工业和技术转让

许多非洲国家独立以后都企图发展工业，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对消费品的需要，这类消费品原先都是依靠进口的。通过这番努力，虽然也建立起一定数量的工业，但这些新建工业的特性，并没有能对非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令人满意的贡献。其主要缺点可概述如下：

一、工业产量的增长并未带来工业就业方面的同等扩大。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〇年这段期间内，工业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可是同时期的就业增长率却是很低，甚至下降了。

二、新建工业给予工人的工资相当高，从而刺激了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得一些非洲国家城市人口的失业率显著增加，竟达10%到15%。

三、为了鼓励新兴工业而建立了关税保护，征收税率很高。在这种条件下，本地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大高于世界市场的水平，从而加重本国消费者的负担，并使得城乡贸易更加不利于农民，从而也打击了农业生产。

四、这种关税保护和由此而造成的高价产品，使得新建工业的产品难以输出。而这些新建工业通常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原料和其他中间产品，这样两方面的因素势必

促使非洲国家经济中的外汇问题旧病复发。特别是当一些国家面临初级产品收入波动的情况下，更加难以应付这类问题。

五、大多数非洲国家市场规模的狭小又加重了这种恶性循环。在通常情况下，各厂家建成之后，也不可能通过国内销售以实现规模越大越经济的效应，进而降低进口—保护关税。总之在一个很长时间内，高成本似乎注定要成为非洲新建工业的特点。

六、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由于基础结构^①上的需要，这些新建的工业都设在非洲的一些大城市，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的首都。这样的工业化，又会使城乡在经济收益和经济机遇上的差别更加悬殊。

在最近发表的文件中，都对工业化中的上述一系列后果进行解释，其中最通行的解释，都是以对于固有的分配模式、工会坚持高工资要求的压力，以及政府政策错误等这几个方面的相互作用的分析作为依据的。这些论点认为，畸形的收益分配意味着非洲国内潜在市场的需求，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富有者而进口消费品。取代这类进口货的工业也就变成了进口再生产设备，因为这类新建的工业也同样是面向那个狭小的市场。此外，这类进口再生产，一方面要求使用国外生产同类产品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同时也依靠从国外进口投入^②。这样一来，新发展的加工企业就不会提

^① 基础结构，通常指交通、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卫生保健、教育等部门构成的资本累积。——译者

^② 投入，系指生产中使用的—切货物与劳务资源，例如原料、劳动等等。——译者

供更多的就业和更多的带动效应。上述论点还认为，正是这样的一系列原因，说明外国资本为何会在非洲新兴加工工业部门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由于这类产品外国公司早已在国外进行了生产，因此这些公司在这类产品的再生产中拥有明显的有利条件。按照这种理论，有些分析家进一步强调指出，工会为了提高工资而施加压力，是促使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压缩就业机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关税保护政策，不过是非洲国家政府偶而犯的错误，是可以纠正的。

如果对于非洲工业化中的这类缺点另行提出一种解释，则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其原因并不仅是因为上述通行的解释在论据上全部是错误的，而且因为那种分析的出发点是过于幼稚。相反的，我们提出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则是从独立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宗主国对属于“外围地区”的非洲国家的经济策略的改变这两个方面着手的。宗主国经济策略的改变包括从依靠宗主国的贸易公司转变为依靠在外围地区国家从事直接投资以积累资金。

因此，独立后非洲国家着手进行的工业化，通常是具有跨国公司的背景，而且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〇年，埃塞俄比亚工业实收资本中，外国资本占43%；由外国控制的股票将会更多。一九七一年肯尼亚的工业产品中属于外国分公司生产的至少占43%。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喀麦隆的工业公司中有71%属于外国所有。一九七一年，尼日利亚工业实收资本中，85%属于外国所有。在七十年代早期，塞内加尔的85%的现代化企业属于外国所有。

现行工业化的这种特点，反映了跨国公司当前采取的国

际策略。在国际商业的环境里，依靠产品的革新和多样化来牟利是公司大赚其钱的核心。跨国公司的这种策略就必然要强调外国分公司要着重于名牌商品的生产，因为这种名牌商品早已在国际市场上确立了地位。通过各地的外国分公司，跨国公司就可依靠这些名牌商品获取垄断性的收益。

这就是非洲已经出现的模式。对肯尼亚跨国工业公司投资情况的调查说明，大多数外国分公司（占69%），在肯尼亚只生产它们总公司已在发达国家进行生产的那些产品。据统计，这种产品的选择又多倾向于采用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更少地依靠当地的生产投入，攫取较高的利润和较低的出口销售。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就业、带动效应、当地企业和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影响。

跨国公司引进生产的名牌商品，具有较高的质量和严格的标准化的要求，这样就会阻碍采用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技术。非洲的外国分公司通过其所属的总公司来确定其商品的生产，因此，必然会对非洲国家的就业带来不良的影响。

对东非工业部门的研究证明了跨国公司的这种产品选择对就业的打击。例如，在肯尼亚，合成纤维和棉花这两种纺织工业之间的生产技术就有很大的区别。同样的产值，棉纺厂要比外国分公司的合成纤维的纺织厂多使用50%以上的劳动力，投资则要减少一半以上。很显然，外国分公司在肯尼亚的服装行业提倡用合成纤维来取代棉织品，就必然会使肯尼亚的就业水平有所降低。提倡以名牌洗涤剂来取代非洲当地生产的洗衣肥皂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而且受其影响的部门将会更多。从喝的“可口可乐”饮料到交通运输使用的“麦西得”牌汽车，在所有这些部门，跨国公司都提倡使用高级的标准化用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对于本国企业来说，为了能同外国分公司进行竞争，也被迫进行同样的高级和标准化的名牌商品的生产。要进行这种生产就要取得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工艺的许可证。而使用这种进口技术必然要增加一笔相当大的新的支出。结果本国公司在提供劳动就业方面的作用就要大大减低。

在许多非洲国家，这种动向是很明显的。例如，在尼日利亚，跨国公司的投资都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生产部门，从而很少能给就业方面带来好处。在塞内加尔，跨国公司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主要部分。六十年代，塞内加尔的工业产量有很大的增长，可是由于这些公司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就业人数却未能增加。

关于跨国公司在带动效应方面的影响，我们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在发展理论中一向强调以一种投资的诱因对于进一步投资所起的作用，特别在工业化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常常偏重于标准化的产品，严重地阻碍当地带动效应的发展。由于这类产品本身的特色，在生产中排除了对当地投入物资的需求，因为当地的投入物资既不符合这类产品的规格，也不符合工艺技术现代化的要求。更有甚者，跨国公司从内部调拨价格方面赚得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以致外国分公司宁愿向其总公司的环球供应系统购买生产所需的投入物资。

对肯尼亚外国分公司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公司的机器设备全都是进口的。多数外国分公司的投入物资中，70%需要进口。同样的，在塞拉利昂，从外国分公司和本国公司在开采钻石方法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出，外国分公司的带动效应是相当低的。在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外国企业的带动效应也是很低的。最近对坦桑尼亚跨国公司投资的专题研究，

也可明显看出这种工业生产对进口物资的高度依赖。在通常情况下，跨国公司引进产品的标准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其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化，以及跨国公司强调本公司内部统筹调拨等方面，所有这些综合起来，都对非洲社会产生害多利少的影响，不如采取另外的可能途径来发展工业。

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一下，跨国公司如何影响当地企业家和当地专业知识的发展。跨国公司采用的技术在资本密集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地的需要，而本国企业又竞相仿效，这样跨国公司就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关于本国工人训练问题，如果工人经过训练以后能继续在本公司服务，那当然是件好事。相反的，如果训练出来的本地经理人员都出国任职，那末就会加速智能外流^①。

我们曾经就跨国公司在就业和带动效应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其中引用的资料可能不甚丰富。但是，现有的材料加在一起也就不难看出其严重的消极作用。来自肯尼亚的材料说明，跨国公司很少致力于发展当地的承包商。肯尼亚经营本地工业原料种植园的官员，曾经企图说服跨国公司共同协作，以发展这些种植园提供的本地资源，但是却遭到反对。在非洲的外国分公司的逻辑就是要同备有良好供应渠道的环球系统融为一体。这种逻辑同通过承包商以发展当地企业的逻辑是相互冲突的。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仅未能刺激当地工业的发展，而且从肯尼亚的制鞋和肥皂工业来看，跨国公司的生产反而挤垮了非洲小规模生产者。例如有制鞋技术的当地厂商就被迫将其业务转向限于修鞋方面。肥皂工业被迫

^① 智能外流，系指发展中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外流到发达国家去的现象。——译者

从制造简单的洗涤剂转向于采用跨国公司那种类型的生产技术。肯尼亚还不是最典型的例子，非洲其他国家也有相似的情况。从坦桑尼亚的经验中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塞内加尔商人对外国控制的不满也反映了这点。在尼日利亚，跨国公司显然同当地厂商在进行不平等的竞争。

至于在技术知识方面的效益，虽然非洲地区不可能完全相类似，但只要研究一下安第斯条约，就可以看到跨国公司投资所带来的微妙效益。本地公司对外国技术许可证的依赖，形成了本地公司的技术上的依附性，从而使得这些公司今后很少有力量发展自己的新产品。这些本地公司感到为了适应跨国的消费和生产技术转让的竞争，这种依赖是必不可少的。进口再生产工业胜于取代进口工业的情况将会持续下去。这样，跨国公司就可以获得优势的利益。

最后，仅就收入和支付平衡方面的效益再说几句，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获得最坚强的传统地位。人们基本上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弥补生产中短缺的两项要素：资本和技术，从而能够使现有的要素都得到生产性的利用。同采取其他方式相比较，这种有利的作用可以更快地扩大国民收入。如果由于结构上的原因（例如正在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正好缺乏货物资本部门），外汇限制成为国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附加的阻碍，那末，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而带来的外汇流入将对国民收入产生更大的效益。

最近发表的研究论文，对于这些普通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对于肯尼亚和印度的不同投资项目进行的得失分析证明，在某些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但是在某些取代进口工业的实例中也存在着消极的现实价值。这种结果反映为在创建这些投资项目中发挥作用的高关税壁垒。在“联合国

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研究论文中，这种收入和支付平衡上的不同作用显示得更加清楚。从印度、伊朗、牙买加和肯尼亚的八十八个公司抽样检查，发现同没有外国直接投资相比较，有二十六家显示出消极的影响。当取代进口工业的项目同进口有关产品进行比较时，对收入产生的效益更加值得怀疑。对于从事取代进口工业的外国分公司的社会得失分析证明，大多数这类外国分公司都要求发展中国家付出相当数量的真正资源和消耗。

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作为这种消极效应解释的关税壁垒是外国的政策，这种对关税壁垒的看法，是没有考虑到上文已论述过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对于这类贸易限制和国民收入上代价所援引的理论都是来自表面的好处，这些表面好处表现为投资项目带来的就业、带动效应、技术知识和企业等方面的效益。如上文分析中指出的，在外国直接投资的条件下，这类外部好处的作用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总之，正是跨国公司工业企业所具备的这种特性才是非洲国家取代进口工业产生许多缺点的主要原因，而不是通常解释中所强调的那些因素：畸形的收入分配、高工资、狭隘的市场、地理集中等。独立以后，这些因素常被用来作为维持和建立地区共同市场的依据。实际上，跨国公司支付的工资水平的材料说明，它们这种产品的选择与其说是反映了现有的收入分配上的悬殊，还不如说是更加严重地加深了这种收入上的悬殊。

根据上述分析，采取关税保护也不能认为只是非洲国家政策上的错误。相反的，关税保护也是跨国公司同非洲国家政府谈判中的一项重大要求。这种关税保护通常保证了较大的跨国公司分公司不受外国进口货竞争的影响，从而垄断非洲

国家市场。有时，跨国公司在同当地公司竞争中之所以能获得优势地位，非洲国家政府有着重要作用。“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条约就明文规定，跨国公司的资本和利润可以全部汇出国外，即使在已实行外汇控制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该条约还规定，跨国公司输入的资本和中间性产品可全部免除关税，五年内免交公司所得税，保证财务稳定和免征其他种类国内税收。但是，所有这些优惠条件并未自动给予本国人开办的企业。

非洲国家政府之所以心甘情愿地给予跨国公司如此多的支持，可以从独立后非洲国家社会的动荡中得到解答。已经控制国家机构的非洲小资产阶级，渴望改善他们作为经济上中间人的地位，这样就有可能同宗主国的贸易公司发生利害冲突，但是，如果是外国直接投资的话，则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事实上，非洲商人成为外国分公司的经销商以后，他们的资产阶级化的机会更加扩大了。非洲国家政府同跨国公司可以结成这样一种关系，依靠这种关系一方面可以保护新建的外国分公司（如上所述），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非洲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新建工业体系中的作用，例如充当外国分公司的总经理、少数股票的持有者及商业经销人等。新生的非洲资产阶级在积累资本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通过分享外国分公司积累的盈余，就可以有所减少。以进口再生产为主的外国分公司，凭借其对市场的控制可以谋取高额利润，也就是说可以匀出这样的一笔盈余。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同非洲国家（以及依靠国家政权的新生资产阶级）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利益相通的关系。

上述的这种利益相通的关系可以减轻资产阶级与社会上其他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例如跨国公司愿意支付较高的工

资，从而消除了工会对现行制度的反对。独立后非洲国家政府保持并扩大国民收入的悬殊，又为跨国公司从发达国家引进的产品提供市场。

凡是跨国公司的工业投资继续扩大的地方，凡是本国政府有能力平息当地资本同外国资本冲突的地方，非洲国家政权就能长期稳定，并且保持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例如肯尼亚和象牙海岸。但是，这种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仍然存在，例如失业，居民收入悬殊的进一步扩大，国内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工业缺乏带动效应以及出口能力的衰退等方面。跨国公司的一个明显作用，就是使得这些非洲国家政权在对付上述这些矛盾时，具有更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大量投资，无疑又鼓励宗主国使用经济援助和军事力量来保住这些国家的政权。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许多非洲国家中各分公司所面临的有限市场，跨国公司想要扩大投资往往很难实现。因此，非洲本地资本家和国际资本不得不考虑采取另外的策略，以避免发展取代进口工业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消极作用。其中一项的主要策略，就是通过实现地区一体化来扩大市场。

地区一体化策略中的矛盾

独立前，非洲地区一体化体系，更多地是适应帝国主义经济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对非洲人民经济发展的关心。为减轻财政负担，协调市场，在它们控制下建立共同的货币区，并建立边远地区同沿海城市的交通运输网，法国和英国都在它们的殖民地内积极建立联盟组织、共同服务机构以及共同的银行系统。在这类活动中，它们得到宗主国商业界及其在非洲的分公司以及当地移民商业人士的大力支持，

非洲国家纷纷实现独立后，国际资本又积极推行自由贸易区，以便维护其原有的利益。国际资本还竭力要挤垮那些地区性一体化体系，因为这种地区一体化体系通过制定的计划，可能阻碍国际资本的自由活动。如果跨国公司已有了一个中等的或者较大规模的市场，并在当地拥有一定的生产能力，那末就更加不愿促成实现地区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跨国公司谋求长期盈余的手段不仅是减低成本，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扩大成本与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市场的分割可能降低生产的效能，这是增加销售所不能补偿的。第二，跨国公司总是力求避免各种风险，例如竞争带来的风险。它们希望谋取相当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当某一家跨国公司在进行一体化地区的几个国家内都已有了平行的活动，而且设在每个国家的外国分公司又都同其总公司有着纵向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再实行横向的一体化及专业化就会遇到明显的阻碍，因为这种一体化体系如果分裂的话，就会带来各种风险。新近打入非洲的外国公司，比起原有的公司可能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但是，即使这些新建的外国公司也反对地区工业计划方案，因为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的工业合理化可能会削减企业数目，并且可能将这些新的外国公司排斥于市场之外，或者导致降低关税保护，这些都对它们产生明显的不利。由于跨国公司在非洲的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于它们在非洲地区一体化中的影响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体化系统的特点，就是参加一体化的各个成员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很大悬殊。由于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需要对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进行补偿，所以在地区一体化的条约中都包含着各种财政

的和计划调节的措施。地区性工业计划方案的失败和其他补偿作用的失效，使得一体化体系内部国家之间在利益问题上的冲突更加明显。在某些地区一体化体系（例如开发塞内加尔河组织）内，这种争吵造成机构的改组，并且放弃了原定的计划目标。其他的一些地区组织（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由于利益冲突使得条约的签署多次推迟，后来条约中规定的关于协调一致的条款也一再拖延执行。再如“东非经济共同体”，由于利益冲突，经常发生危机，终于陷入解体的状态。

然而，当前非洲地区一体化中的危机，并不纯粹是一种非洲国家之间的事务，尽管各国之间由于地区一体化中利益分配上的冲突而造成彼此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国家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一个同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利益分配有关的基本问题，因为跨国公司根据它们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不仅设法建立一个国家范围之内的市场，而且要进一步扩大为地区性市场。

对“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①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这类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跨国公司从地区一体化中谋求利益的方法首先是通过“单税制”保持市场的分割，其次是阻挠地区性计划的实现。这种地区性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地区的生产更加合理化，并对“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范围内工业不发达国家如乍得和中非，提供一些补偿。

^① “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系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八日，由喀麦隆、中非、乍得、刚果和加蓬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的五国首脑会议上决定建立的，以代替原来由四国于一九五九年建立的“赤道关税联盟”。“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的总部设在中非首都班吉。——译者

这里所说的“单税制”是根据“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条约中第五十九条和第六十条规定而建立的。该条约规定在本同盟国家范围内生产的货物向本同盟内一个以上的国家销售时，一概只在工厂里征收一次税。这项一次税的税率概由本同盟的协商委员会统一规定。征收了这项捐税以后，免收其他一切进口关税和制造过程中所用货物的税以及国内成品税。这种“单税制”的税率通常均低于这些工业品应征的关税。建立这种“单税制”的主导思想，首先是为了通过降低税率，以加强本地工业同国外进口货的竞争能力。其次是本同盟的成员国，如果由于“单税制”而使其对第三国进口应征的关税收入受到损失时，按照条约的规定可给予适当补偿。所有工业产品在本同盟范围内进行贸易时，都必须按照单一税率征税，而且这项税收的收益也必须在本同盟的成员国之间按照各国对这类货物进口数量的多少来进行分配。

在建立“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的谈判中，来自乍得和中非这两个国家的代表认为，“单税制”的统一税率，将使那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得到明显的好处。因为这些国家工业建立的时间较长，规模更大，效率较高。为了补偿这种贸易上的不公平，它们建议采用可变的税率。它们的这项建议得到认可。按照这种可变税率，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〇年，“拔佳分公司”在喀麦隆生产的塑料凉鞋输入中非销售时，征收的税率为33%。而“拔佳分公司”在中非生产的同样货品应征的税率则为13%（参见表七）。通过允许“单税制”的变动，“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条约的决策人鼓励本地区市场继续保持分割，因为控制中非地区各国工业部门的跨国公司，目前还不想促使本地区生产合理化。结果相反，在现有的高成本生产的条件下，市场的分割恰好符合跨国公司攫

取最大利润的策略。

表七：按照“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条约第64.01.11项规定的项目在1969—1970年(%)的单税率

生 产 户	消 费 者				
	喀麦隆	中非	刚果	加蓬	乍得
拔佳(喀麦隆)	25	33	33	32	33
拔佳(中非)	18	13	18	15	•
拔佳(刚果)	18	18	18	16	18

• 在中非的拔佳分公司为其产品获得单税率之前，中非就已退出“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

资料来源：“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的官方报纸，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的不同的各期。

由于只是单纯注意地区一体化对各国造成得失的争论，“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领导人无法理解这种体系首先有利于跨国公司的程度。最明显的就是，跨国公司从贸易中取得了好处。由于大多数实行“单税制”的公司均为外资所有，国际资本成了地区内部工业贸易中的真正得益者。虽然关于公司所有权的情况的材料尚不完备，但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在一九六九年，喀麦隆实行“单税制”的公司当中，68%属于外资（五十七家公司中占三十九家），属于喀麦隆本国资本的，只有两家。在中非实行“单税制”的公司中，属于外资的占53%（二十一家公司中占十一家）。在刚果为55%（二十二家公司中占十二家）。在加蓬为80%（五家公司中占四家）。在乍得为36%（十一家公司中占四家）。

为了正确估价“单税制”如何加速了市场的改组，并加

强跨国公司对市场的控制，就必须将“单税制”同“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的投资法规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按照这些规定，凡是愿意在“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地区建厂的外国公司都可以得到财政、关税和基础结构上的种种优惠。这样，跨国公司在同民族企业的竞争中遂处于有利的地位。“单税制”和投资法规定的优惠还降低了资本，从而刺激外国工厂过多地扩大设备能力。另一方面，每个“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国家的市场又很狭小，设立的工厂过多，必然导致开工不足，成本过高，并且使得当地的大量资源浪费在无效的生产活动之中。“单税制”和投资法规还造成少数厂商对市场的控制，跨国公司就可以借此将其过高的生产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并且保持其高额利润。由于关税及其他税收上的优惠条例，诱使跨国公司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这样，“单税制”和投资法规使得跨国公司，在当地国家和本地区的经济中，发挥先期带动和后期带动^①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向这个地区引进名牌产品和资本密集型工艺的吸引力却大大增加。尽管大量事实表明，跨国公司现有的生产能力已成倍地增加，开工不足，不适当地引进的生产和工艺技术，并且通过关税豁免和利润汇出，已从“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地区攫走了大量盈余。可是在“单税制”的刺激下，跨国公司仍然踊跃地涌进“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的市场。制鞋工业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他行业如香烟、纺织、食品、服装和其他消费品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货物在享受

^① 西方学者认为外国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有促进作用，表现为促进外资企业所需要的原料和零部件的本地工业的发展的作用，称为后期带动。——译者

“单税制”的生产和贸易中都占统治的地位。

一九六六年，在“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地区已有六家鞋厂。喀麦隆、中非和刚果各有两家。总产量为七百万双，可是一九六六年只生产了三百六十万双，仅达到生产能力的一半。六家工厂中有五家生产塑料拖鞋。这些制鞋工厂的设备和原料（聚氯乙烯）全部都是进口的。此外，只有喀麦隆制鞋厂使用当地的皮革。虽然会有人争辩说，刚果和中非都从乍得和喀麦隆进口皮革作为制鞋原料，从而推动了当地的皮革生产和其他有关行业的发展。但是，外国公司正在提倡的仍然是塑料拖鞋这类产品。一九六七年，在喀麦隆、中非、刚果和加蓬四个国家，生产和销售的皮鞋和帆布鞋共值两亿三千九百多万西非法郎，而塑料拖鞋一项就达到一亿八千多万西非法郎。到一九七一年，塑料拖鞋的生产和消费已上升到六亿二千多万西非法郎，比一九六七年增长了71%。而皮鞋、帆布鞋的生产和消费反而下降到两亿两千六百多万西非法郎，四年之间下降了5.2%（参见表八）。

尽管现有的鞋厂都已开工不足，本地区对鞋的需求也增长得很缓慢，但是在一九七二年，仍有两家新建的鞋厂投产。在喀麦隆，“喀麦隆鞋类公司”建立于1968年，专门生产皮鞋，一九七二年全部开工后年产皮鞋五十万双，这家鞋厂所有权的情况目前不详。一年后，“拔佳鞋公司”在中部非洲国家创立了分公司，塑料鞋、皮鞋和帆布鞋的年产量为一百五十万双。到一九七二年，该公司只生产七十五万双，只及生产能力的一半。同年，在刚果的“拔佳分公司”的生产也只达到生产能力的一半。尽管如此，由于在关税保护下不受外界竞争的影响，同时又享受“单税制”的优惠，更不受内部市场的影响，再加上中部非洲国家领导人为了鼓励外资

表八：1967年和1971年鞋类的生产和消费

塑料凉鞋的 生产者	(单位：1,000西非法郎) 产品的消费者					年得	总额
	喀麦隆	中非	刚果	加蓬			
埃门斯 工业公司(F)	1971	399,160 (77%)	53,969	24,222	42,777	—	520,128
	1967	71,579 (49%)	50,358	570	1,488	23,112	147,107
中非 拔佳公司(F) 莫拉-古维 亚公司(F)	1971	4,246	88,855 (95%)	—	120	—	93,221
	1967	—	49,644 (69%)	41	—	22,621	72,306
刚果 拔佳公司(F) 非洲塑料 公司(F)	1971	—	—	6,504 (96%)	303	—	6,807
	1967	—	3,000	4,230 (59%)	—	—	7,230

(续)

(单位: 1,000西非法郎)

塑料凉鞋的生产户	喀麦隆	中非	刚果	加蓬	乍得	总额
帆布鞋和皮鞋的生产户						
喀麦隆						
拔佳公司(F)	145,586 (75%)	12,047	16,212	20,303	—	194,148
喀麦隆鞋类公司(U)	1971					
	139,529 (73%)	24,348	7,074	10,169	10,576	191,696
1967						
中非						
拔佳公司(F)		2,626 (72%)	—	107	—	3,633
莫拉-古维亚公司(F)	1971	905				
光辉公司(U)		38,610 (74%)	143	—	12,953	51,706
1967						
刚果						
拔佳公司(F)	1971	1,540	26,400 (92%)	881	—	28,821
1967		6,654	11,777 (58%)	808	1,084	20,323

资料来源: “中非经济和关税同盟”的全面统计公报, 一九六八年四月第二十二期和一九七二年四月第三十八期。

在本国建厂而给予的关税优惠，因此，在本地区又先后建立了一些新厂。这些新建的鞋厂都同发达国家有着联系，以谋取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供应。

非洲小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策略就是既要加速其自身的资产阶级化，又可以适当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因此，迫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站在本国的立场来对待“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的地区工业计划问题。他们多倾向于在对等的基础上来衡量本地区工业部门实行一体化的得失。他们以竞争的眼光来看待其他国家的工业的发展，并且当本国工业速度受到限制时，他们便要求给予补偿。由于民族独立和竞相争夺外国的直接投资，在“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的内部，这种民族主义竞争的趋势是越来越迅猛了，而跨国公司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来破坏地区计划的执行。“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国家竞相争夺外国直接投资，还给跨国公司提供机会使它们得以按照自身的需要来改组本地区的市场，从而加强它们对各国市场的寡头垄断。

在法国政府的鼓励下，法国的阿加希—维罗集团，于一九五三年在现今的中非的博瓦利开办了第一家赤道非洲纺织工厂——“中非纺织工业”，这家工厂计划供应所有赤道非洲的法属国家。十年以后，随着民族实现独立，中非地区的乍得和喀麦隆两个产棉国，签订了一项协议，其中包括建立两个纺织工厂，一个设在乍得的阿尚博堡，专门从事纺纱和织布；另一个则设在喀麦隆北部的加鲁阿，专门采用乍得生产的本色布进行印染。除了这种纵向的一体化之外，两国的协议中还包括专门化生产的建议。喀麦隆市场将专门经营乍得生产的本色布，而喀麦隆生产的布匹将供应乍得的市场。这项协议系出自法国和德国集团的重要人士的主张，他们在

这两家工厂中拥有大多数股份。

到了一九六四年，中非政府和私商联合开办了“中非棉纺工业”（其中法国的阿希加—维罗集团占有56%的股份）。不到几年以后，这家工厂又同“中非纺织工业”合并了。无视于乍得和喀麦隆之间已有的协议，并且主观地认为可以保证可以控制乍得市场，于是这家工厂开展了一项扩展棉纺生产和增加品种的决心勃勃计划。中非打算根据“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的投资法规为“中非纺织工业”寻求税务上的优惠待遇。可是，在这之前，冲突便公开爆发了，这种冲突仅表现为非洲国家的竞争和要求给予补偿。考虑到中非纺织工业的历史地位，并且相信中非地区纺织品市场将会日益扩大，“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协商委员会”决定给予“中非纺织工业”一些税收和关税上的优惠。这样一来，不仅未能阻止反而加剧了跨国公司进入中非市场的竞赛和原有公司在牺牲中非公司的情况下扩大其占有的市场份额。

几年以后，对喀麦隆与乍得签订的纺织协议进行了修订，并废除了专业化协议。一九六八年，刚果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援助，在基松迪建成一座棉纺厂，现在是一家国营公司。一九六九年四月，加蓬建立了棉布纺织工业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进口布匹印染的工厂。工厂进口的本色布既不是来自中非或乍得，也不是来自喀麦隆，而是来自香港。拥有这家工厂股权的有：加蓬政府（9%）、荷兰非洲商业公司（42.5%）、德国的德意志经济合作协会（42.5%）。由于“中非经济和关税同盟”地区的纺织和印染工厂的不断增长，这个地区的五个国家就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就成为非常必要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召开了会议，拟

定中非地区纺织工业协议。如果说在本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非洲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共存共荣的关系，那么将这种共存共荣的关系扩大到本地区范围之内，并且加以制度化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次会议上，除了“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协商委员会”的成员，各国财政部长或发展（计划）部长外，还第一次邀请了有关工业的代表直接参加会议。会议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将通过分配出口定额的办法，来调节棉布在各国流通的数量，并且规定了各类纺织工业之间的专业化的分配。

这项协议首先是有利于控制喀麦隆纺织工业的法国纺织公司。如下面表九所列出的，只有这几家公司年营业额增长得最快。“喀麦隆纺织工业”和“乍得纺织公司”的生产已接近于全部生产的能力，这些工厂已宣布要扩大生产能力。对比之下，不论是“刚果纺织公司”或者是“中非纺织工业”（已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实行国有化）都无力扩大生产，而开工率只达到生产能力的75%。此外，中非地区的合成纤维纺织品的市场也是由法国的“纺织联合”伙同法国罗纳·布朗化学公司加以控制。这两家公司都打算大大扩展其海外产品。由“喀麦隆纺织工业”、法国“纺织联合”、“罗纳·布朗化学公司”和喀麦隆政府联合创办的“喀麦隆合成纤维纺织厂”已于一九七一年开工生产，最近生产能力的利用已达到88%。同塑料凉鞋一样，合成纤维纺织工业也是依靠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

表九：“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地区纺织工业的发展

公司名称	营 业 额		生产能力	生 产 量	
	1971	1975	1975	1971	1975
	单位：百万西非法郎		单位：百万米	单位：百万米	
喀麦隆纺织工业	2,348	6,200	30.0	17.9	20.2
乍得纺织公司	1,800	2,600	15.5	15.2	14.0
中非纺织工业	982	1,300 (1974)	17.0	12.1	12.9
加蓬纺织工业公司	675	1,667	8.0	4.3	6.3
刚果纺织公司	600 (1972)	600	3.5	2.3	2.5

资料来源：“非洲国家的纺织工业”，载《非洲工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第一二八期，第四十一—五十九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非洲地区一体化中的主要矛盾就是由于民族主义方向同依附于外国而产生的畸形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民族主义和对外国的依附这两个可变因素的相互影响，一直贯穿在许多非洲国家的阶级结构之中。因此，为了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利益，而对地区经济实行计划化的主观愿望和控制能力均依然是有限的，因为这一切的努力都是限于国家的水平，再加上跨国公司同掌握国家政权的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类的密切联系还使得当前的措施(如“单税制”)的有效作用大受影响。只要跨国公司仍然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来左右非洲地区一体化的进程，非洲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就会更加趋向于民族主义

的竞争，从而阻碍了地区一体化的种种努力。其结果是，非洲国家的盈余分配更加有利于国际资本，而且使得地区一体化这项策略，在非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受到一定的影响。

为了使地区一体化能够成为非洲独立自主地发展的一项工具，就必须制定一项以内部发展利益为目标来调节同外部联系的地区性政策。这样处理问题的基础，就是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实行集体调节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只有通过这种集体调节，才能抑制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并使得地区中心组织有可能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协调各项政策，那就是既能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又可以使未来的生产能力分布得更加均匀。如果对于资本输入不能实行联合调节，争夺外国投资的竞争将会继续阻碍非洲地区工业计划的进展。同样地，如果对于技术转让不能实行联合调节，技术输入将仍然是不适合的，并且将会产生成本过高，而且这种技术输入在本地区的经济中，所能产生的先期带动和后期带动，都将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技术输入，只能使当地人民有能力使用这类的外国技术而无能力去消化并改进这类的外国技术。只要这种技术转移的模式持续下去，非洲新建的工业，将会更加严重地同外国总公司或者其技术供应者联系在一起，而且地区政治经济中四分五裂的状态也将持续下去。

对于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实行集体调节，是建立一种新型地区一体化体系的基础。此外，还需要几项其他的政策作为其支持。首先，除了上述的对于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实行集体调节以外，还应鼓励在同外国援助国家谈判时建立联合阵线，其目的是为了 avoid 在争取外国贷款和赠款中的相互

竞争，同时还可以加速地区的协商和计划工作，并且减轻援助国家对非洲国家领导人所施加的压力。第二，各个地区性组织的工作机构要发展自身拟定计划的能力。目前，非洲的许多地区组织（如“西非经济共同体”、“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的机构里，都充满了外国移民，由他们来拟定关于向国外援助机构贷款的文件。因此，非洲本地人就无法获得拟定计划的必要技能。最后，非洲地区工业计划的概念必须从那种以摸彩的方式来决定成员国对单项产品的选择和布局的这种思想，改变为对于整个工业部门实行计划的思想。按照这项整体工业计划，通过在不同的成员国家安排中间产品和成品的生产，使得国家经济和地区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一致。工业之间的规范化和当地技术的更新，可以促使这种工业计划更为切实可行。此外，私人企业同国营企业在工业计划范围内的联合投资，又进一步提高了地区计划工作任务的水平。

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指望一个更加全面的地区一体化的策略会获得采纳，那将是一种痴心妄想。七十年代遭受非洲地区一体化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些缺少工业的贫困的内陆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追求他们的沿海资产阶级同伙们所已经取得的报偿，他们也坚持进口再生产的策略。非洲地区一体化计划的失败，使得这些内陆国家工业发展更加缓慢了，并且由于出口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和旱灾带来的歉收，使得群众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改善，结果是六十年代末期和整个的七十年代，许多非洲国家的局势极其动荡不安。

经济发展缓慢和政治动荡不安，又使得一些比较富有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非洲国家，如象牙海岸、尼日利亚和肯尼

亚不会对于这种政治经济感到赞赏。这些国家都是地区一体化计划中的潜在的伙伴。由于上述这些特点，这些国家新生的资产阶级也不会放弃同国际资本的密切合作关系，因为正是依靠这种密切合作才使得他们获得了加强本身资产阶级化的优越手段；同样的，他们也不会急于采取行动，以促使地区一体化带来的利益能够分配得更加均匀。对于这些工业化较高的非洲国家统治集团来说，如果接受地区一体化的策略，其中包括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实行地区性调节，必然会在八十年代导致现行体系中存在的几个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首先，市场和国际收支严重限制了取代进口工业的发展，影响了这些国家利润的收入，从而对于用来实现资产阶级化的盈余会形成一种冲击。第二，在某些非洲国家，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同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并在竞争中肯定会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那末这些国家大都喜欢采取减少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进口技术依赖的政策。第三，由于取代进口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从而剥夺了控制国家政权的小资产阶级用以实现资产阶级化的机会，他们遂转而选择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以谋取盈余来加强自身的经济地位。事实上，许多非洲国家都在积极地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并且设立许多优惠制度，其中包括取消取代进口工业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以便使他们的国家对于外国投资更加具有吸引力。非洲国家的利益在于发展面向出口的工业，而跨国公司的利益则在于使生产国际化，这两方面利益的吻合一致，使得非洲国家在八十年代除此以外就别无其他选择。

如果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采取集体调节政策所要求的三项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十年

内，似乎不可能采取这类的政策，或者有效地执行这类政策。更确切地说，在八十年代，非洲国家将继续积极倡议建立地区一体化和各种合作计划，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地区一体化体系内部的危机不断出现。在未来的十年内，作为促进非洲发展的一项策略，地区一体化所具备的作用，仍然将是非常有限的。

第四章

非洲面临的抉择

本文的前几章曾强调了下述几个方面：第一，殖民统治以前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外国经济渗透，如何形成了非洲的不发达状态；第二，非洲国家独立后进行的工业化和地区一体化，又是如何地加强了这种不发达的模式。虽然在七十年代，非洲国家就已经面临着新的策略抉择，特别是国际经济的变革促使非洲与西欧的经济关系中，展现出一种主要表现为围绕着“洛美协定”^①条款所建立的那种新的经济关系形式。

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形式，一方面包含着非洲的出口加工工业在欧洲市场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包含着稳定和改善非洲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收益的条款。由于体现了这种新的经济关系，“洛美协定”被看成是“革命的”而大加赞扬，并且称之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样板。“洛美协定”的贸易条款被认为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一种可靠的保证。

“洛美协定”的商谈过程也被看成是非洲国家摆脱依附地位

^① “洛美协定”，一九七五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同五十四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了一项经济协定。简称“洛美协定”或“第一次洛美协定”。一九七九年十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同五十八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又在洛美按照上次的协定并加以修订后又新签了一项经济协定，简称“第二次洛美协定”。——译者

的一种表现。因此，人们认为这种新的抉择已经跨越了上述的种种矛盾，并且可以促使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得以迎刃而解。

我们不相信情况会是如此的。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就“洛美协定”所反映的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些缺点进行论述。然后，我们提出要使得这种新的国际经济关系，能够对非洲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所必需具备的条件。我们还指出，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将不容易实现。最后，由于国际上正在进行国际商品市场的调整和加速发展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加工工业的种种尝试，关于这种尝试对于非洲所具有的意义，我们也将作出简略的判断。

非洲，变化中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洛美协定”

在最近的五年到十年的期间内，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在加速发展输入发达国家的二级出口加工工业。这种情况，反映了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在这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加工工业生产的格局正在跨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界限而走向国际化。

在世界加工贸易的总趋势中，这种加工业务分布不断变化的格局已经是非常明显了。而且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在这类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已由一九六二年的4%上升到一九七三年的8%。某些国家的某些工业的出口加工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例如，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五个国家和地区（台湾、香港、南朝鲜、墨西哥和巴西）一九七二年出口贸易占整个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增加，特别是服装类（从一九六二年的18%上升到一九七二年

的26%)、皮革和鞋袜(从一九六二年的12%上升到一九七二年的17%)、羊毛制品(从一九六二年的11%上升到一九七二年的13%)和综合类的轻工产品(从一九六二年的5%上升到一九七二年的8%)。一九七〇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特定生产部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进口市场上所获得的收益尤其突出。这些特定生产部门包括无线电通讯设备、小型电器、小型公路汽车和家庭设备等。有少数选定的非洲国家可以加入亚洲和拉丁美洲这类主要输出国的行列(参见表十)。

正当出口的本身在不断上升时,外国分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也在急剧上升。在拉丁美洲,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属于美国企业的分公司约占拉丁美洲出口加工的增长部分的65%。一九七一年,南朝鲜的加工工业的输出中,属于外国公司的约占15%;在台湾为20%;在新加坡为50%。不过这些数字远远不足以说明全部情况,因为这些数字并未包括企业之间贸易的数量。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测定公司之间贸易增长的情况,那就是查阅美国关税条例第806.30项和第807.00项。这两个项目中包括着以美国元件装配的输入美国的产品中,外国净增值应缴纳的关税。在这两种关税项目下,美国从发展中国家的输入,从一九六六年的六千零七十万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二十二亿四千五百九十万美元,陡增了三十多倍。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美国的总输入增长了56.3%,但是美国跨国公司从其所属的分公司的总输入增长了81.9%,而加工部门则增长了92.2%。

表十：向发达的市场经济输出制品的主要非洲国家

(单位：百万美元)

	1962	1972	1975
赞比亚*	309	575	857
扎伊尔*	213	430	542
加纳	32	110	216
象牙海岸	8	87	178
尼日利亚	33	66	117
喀麦隆	28	48	77
肯尼亚	16	32	55

* 基本上属于未经加工的非铁金属。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制造业和半制造业贸易的最近趋势的评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表15，第三十六页；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一日，表13，第二十四页。

多数进行国际化生产的大型跨国公司都是属于美国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英国、德国、法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其他国家的公司，也纷纷将其资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转移到国外。为了争取在变化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占有优势，许多跨国公司之间正在展开竞争。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正确评价“欧洲经济共同体”同五十四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订的“洛美协定”。“洛美协定”的关键性条款包括稳定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传统产品出口收入的措施，还有增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对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直接投资的措施，以及调节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加工产品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市场的措施。上述的这些措施，不能有效地解决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

日益增长的贫富不均、失业和普遍贫穷化问题，相反却可以创造出一些从事出口加工的小块发达地区，并且使得原有的从事原料生产的小块发达地区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仍然保持着支离破碎的经济，正是这种支离破碎的经济才会产生上述的种种社会问题。如果对于稳定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出口收益计划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对于“洛美协定”规定的直接投资和加工产品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那末对于上述的这种情况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了。

“出口收入稳定计划”只保证十一种农产品和一种矿产品（铁矿砂）的出口收入的相对稳定。它并不企图稳定产品的价格，而只对由于价格波动所造成的损失部分给予补助。只有“出口收入稳定计划”附表内列出的未经加工的货品的出口收入比前四年平均收入下跌7.5%时（生活条件较差的国家为2.5%），遭受损失的国家才有资格申请财政转让。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认为，申请国家的出口收入下降是由于采取了歧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策所造成的，那末就可以拒绝这种财政转让。任何一种规定商品应在国内加工，并且阻止商品以原料的形式输出的政策，都被认为是对外国的歧视。

这样，“出口收入稳定计划”的制度，既鼓励保持规定商品的现有生产水平，同时也制止了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多样化，妨碍原材料生产国的国内加工或者国内食品工业的发展。总之，所有促进国内生产的活动，以及促使生产与需求更加配合一致的种种活动，都将因此而受到阻碍。此外，“出口收入稳定计划”完全符合“欧洲经济共同体”领导人提出的保证原材料和能源来源的需要。自从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

以来，“欧洲经济共同体”领导人，就使用了相当大的力量来谋求这种地位。在利用“洛美协定”来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欧洲经济共同体”又重新肯定了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专门提供初级产品的传统作用。

但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的利益也决定于贸易和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洛美协定”既保持了第三世界的这种传统作用，同时又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内部进行工业生产结构的改革，以便更好地适应跨国公司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洛美协定”的第一章第一节的规定和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的规定，外国直接投资如何推动了贸易就是很清楚了（“洛美协定”第一章第一节规定，允许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工业产品，可以免税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市场；第三章第二十六节规定，鼓励“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跨国公司直接向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进行投资）。“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保证“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跨国公司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创办企业时，比其日本和美国的竞争对手享有更多的优惠权利。“欧洲经济共同体”赞成将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关税地区，并且表示有兴趣使所有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欧洲跨国公司的生产合理化。这样就有可能使得法国、德国或者英国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低成本，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生产元件，而在另一个上述地区的国家进行装配，然后再将制成品以免税的方式返销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市场，从而获得了最大利润。但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也迫切希望通过“洛美协定”来阻止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市场内采用上述同样的合理化生产过

程，这也就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普惠制的一个主要目标。

“洛美协定”中包含的冗长的产地法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确立的。

产地法规是专门适用于处理下列产品。这类产品不是“全部产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而是在加工过程中又添加了来自“欧洲经济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市场以外的成品。除非来自第三个国家的元件还需要进一步加工，并且规定这种加工应构成一定百分比的净增值，这项净增值可以高达到70%。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类成品方可以考虑作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产品，而准予免税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市场。尽管如此，但是还有某些加工过程被认为不符合于“原地产品”的条件。

“欧洲经济共同体”竭力企图保证本共同体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创办企业方面能比日本和美国的同行享有更多的优惠权利。与此同时，在大规模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企业同小型的国营企业之间实行平等对待（如第五章第六十二节的规定），其结果就等于在银行信贷、技术工人、税收优惠和其他国家提供的福利方面对于小型国营企业实行有效的歧视。这两类的企业又是互相竞争的。“洛美协定”第五章第二节的内容规定，禁止对外汇实行控制或者禁止对利润汇出实行限制，从而阻碍了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政府，根据本国利益或者地区发展的利益的需要，而对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实行管制的任何企图。总之，“洛美协定”的这类条款，使得不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跨国公司生产的成品的输出，将会受到种种限制，并使得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所选中的外国投资者的活动余地更加狭小，同时还阻止了这些国家向“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外的范

围去寻求更加适用的技术。这样一来，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在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时就更加缺乏力量。

第三世界加工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似乎成了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而且将这种工业的增长看成是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一个标志。这种看法可能是一种误解。如同取代进口工业的情况相似，出口加工工业是否有助于非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门新工业的所有权的构成情况。只要这门以出口为主要方向的工业成为国际化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末，这门工业就很少能促进非洲国家内部的生产与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一致，也很少有可能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提供动力，更不会减少非洲政治经济中的四分五裂的状态。另一方面，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来说，它们有理由指望“洛美协定”将会加强“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跨国公司同日本和美国公司的竞争地位。“洛美协定”似乎将促成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这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只能使得过去已存在的发展不平衡更加永久化。

出口加工工业和非洲的发展

本文前几章所阐述的思想并非是说非洲日益增长的出口加工工业，将不会对非洲的发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出口加工工业确实是能够（1）比大多数初级产品的生产，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多的保持高价的出口收益；（2）依靠出口加工工业中劳动密集这个特点，为改善劳动就业和收益分配提供良好的前景。在这方面非洲具有相当的“天然”优点；（3）将国内经济带动效应增加到这种程度，以使得出口加工工业能够广泛地吸收国内原材料和中间性投入资源；（4）通

过出口加工而实现生产上规模越大越加经济^①的效应，从而改进加工工业在国内市场的效能。

我们相信跨国公司国际化的策略，是不会鼓励这类具有积极意义的出口加工工业的。这类跨国公司的企业，通常只是将一体化生产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部门设在国外。这就意味着这些部门在当地所能产生的带动效应将是非常有限的。某些论文已经发现，这种有限的带动效应是台湾和东南亚的跨国公司出口分公司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此外，某些国外分公司的“自然”扩展又是同跨国公司宁愿实行货源多样化，并将某一种投入从一个货源地改变成为几个低价货源地的活动直接相抵触的。属于跨国公司的这类的分段企业也不会第三世界国家为其自身开辟市场，因此对于扩大生产规模，以降低成本从而降低消费者的负担，它们是毫不关心的。甚至认为跨国公司出口加工工业对于解决非洲国家就业方面的效应也是有限的。因为它们所要加工的产品类型，驱使它们采取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而不是象传统的工业如制鞋和纺织工业那样，更多地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

只有在一种条件下，出口加工才能有效地促进非洲的发展，那就是这类出口加工工业必须是在国营企业的控制之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加工工业才有可能成为非洲国家自然资源的自然扩展，从而最大地发挥带动效应，集中地解决当地劳动就业，并能通过扩大生产，降低成本，为本地消费者带来好处。（例如，人们可以想到坦桑尼亚的麻绳出口，这是以当地出产的西沙尔麻为基础的。还有以当地棉花

^① 规模越大越加经济，系指一个企业或工业部门，因扩大生产规模而得到产量增加和成本降低的经济效果。——译者

为主的纺织工业，这些工业都是由国营企业主持，属于劳动密集型的。）

非洲当地的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能否长期坚持下去仍然是个问题。这类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肯定将会冲击“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内部的工业生产。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这类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又大多集中于一些贫穷地区。在这类生产中，劳力和资金的转移都会受到限制，而且经济结构上的原因也会阻止这种转移。

在欧洲，“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签定刚满三年，就造成纺织部门的四十万人丧失工作。造成这种失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进口的竞争和合成纤维工业需用的石油涨价所造成的。失业的工人占全部纺织工人的10%，其中有许多是妇女。在制鞋工业、皮革工业和服装工业也有同样的趋势。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造成的这种失业，又是同长期高度普遍失业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高度失业在十年前就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而目前正在威胁着关于混纺协议的谈判。这种情况，就使得第三世界出口加工工业的扩张所造成的政治经济上的现实显得更加突出了。在欧洲，由于这种情况的转变，例如纺织品进口的增加，而遭受严重打击的部门又常常是集中于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是抗拒改革的。如果某一个集团被迫承担这类转变所造成的全部损失，那末这种抗拒就成为合法的。于是关键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的机构作用，使得这种转移的代价能够社会化，并使得已经完成的改革能为有关的集团所接受。”

必须承认，非洲国家的出口加工工业要想得到重大发展，就必须首先对于这种工业政策的调整问题作出有力的回

答。这种有力的回答又要求在工业发达国家保持一种高价经济。如果缺乏这种条件，工业化国家必然会建立起关税壁垒，用以阻挡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类产品的输入（例如最近法国对于纺织品的进口实行限额的规定）。

特别需要指出的，就是这类进口限制通常是有选择性的。当中心国家的强大政治势力，考虑到自身利益需要保护同第三世界的某个地区的贸易关系时，那末，第三世界的这个地区的产品就可以继续准予输出。这点几乎成了第三世界工业产品纷纷进入美国经济的重要基础。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种贸易关系比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模式将要跨越更多的工业部门。如果说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也有着上述同样的政治势力在发挥作用，这种形势必然会使欧洲的跨国公司，在新的欧洲—非洲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进行扩大贸易的活动中，处于强大的有利地位。此外，只要欧洲的跨国公司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新选定生产地点，这类跨国公司就不会急于建立综合性的工业调节手段。通过这种工业调节手段，可以使得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输入更加广泛和更少选择性。

于是非洲国家要想扩大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加工，只有经过下述两种模式：（1）一种非洲国家内部发展的简单加工产品出口同欧洲的积极调节政策的综合体。这种加工出口是以当地的资源为基础的，而欧洲的调节政策可以使这种加工工业的转变所带来的损失社会化。（2）一种跨国公司加工过程中的各个分段在非洲国家加工区的重新定点的综合体。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同欧洲的贸易限制结合一致。

虽然，第一种模式无疑地将是最有利于非洲的发展，但是依我们看来，实际上最可能采用的还是第二种模式。

现将其理由简述如下：第一，按照宏观经济学^①，在通常情况下，今后五年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情况将不会有大的好转，从而难以期望在欧洲会出现有效的工业调节策略；第二，在荷兰和瑞典等这类工业调节策略已经形成的地方，都在专心一意地建立起小型的结合严密的经济，有关政府也对经济实行干预。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反映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特点，但是，上述两种现实情况都说明在不久的将来，在第一世界，贸易限制将会进一步加强。

第三个原因系来自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现实情况，正如同上面文章中所已经指出过的。这类国家的当地统治阶级同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利益相通关系，也就是说，非洲国家的政策非常不乐意限制跨国公司的出口加工，也不愿意在国内建立自己的工业来加以取代。这样，有效发展的首要条件就难以实现。

非洲的出口加工工业无疑地将会日益繁荣；如同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加纳和肯尼亚所已经显示的那样。但是，这类加工工业将是处于外国企业的控制之下，而且将被纳入国际化的生产体系之中。因此，对于非洲来说，这类出口加工工业所产生的带动效应，及其在就业和收益方面的良好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些好处都是为当地的上层人士所享受。这些非洲国家的上层人士，已将他们同外国企业在取代进口工业中的利害相通的密切关系，扩大到了出口部门。从这类出口加工工业的增长来看，将不会带来有利于非洲大多数人民的重大经济调整。

^①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经济学。

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非洲？

本文关于非洲经济面临抉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非洲同欧洲的经济联系问题。但是，关于国际经济调整的可能性，已经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过讨论。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提出了调整国际经济的全面纲领。一些分析性文章已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情况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能出现这类的广泛国际经济调整呢？这类国际经济调整是否会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呢？

关于上述的第一个问题，范·阿凯第和罗根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谨慎而又实际的估价，并带有一个相当悲观的结论。我们最好是将他们的分析摘录如下：

“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遭到失败的历史条件下，而且鉴于民族主义国家政府目前还面临短期的压力，难道光凭人们对高尚情操和全人类福利的呼吁，就足以推动人们去为这样意义重大的、切实可行的变革而提出建议吗？

“可悲的事实是，即使这类建议是切实可行的，随着这类建议的实施，将可以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广泛的改善，而且比许多其他方案的实施的结果要好得多，但是这点并不意味着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中，就已形成了各种促进谈判的实际效果。……为了满足第三世界的要求和愿望，以重建世界经济，使南北两方均能互利为目标的政策，看来在工业化世界中还没有形成。”^①

^① 见范·阿凯第和罗根合著，《经济和政治背景》一书，第三十、三十九—四十页。

只有在世界商品市场实行变革的条件下，世界经济才有可能进行某些调整，其中包括建立一项原则上都已接受的稳定价格的公共基金（虽然在执行中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分歧），并且包括关于某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列出的原料种类中重要商品达成的协议。在一九七七年六月结束的南北会议上，“南方”的主席、委内瑞拉的佩里兹—瓜里罗先生总结说，作为对第三世界基本要求的反应，会议未能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在保护第三世界的购买力，或者促进第三世界商品进入第一世界市场和技术转让方面都毫无进展。

更广泛变革的可能性看来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对于潜在的国际范围的变革的重大意义，还需要从非洲的角度来认真地加以审核。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国际上的协助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国际上的协助，并不能代替发展中国家本身为了造福于最穷的市民而制定适当政策和进行适当改革等这类重要任务。特别是非洲国家，大多数人民仍然保持着农民生产方式，这个事实说明，国内的政策措施才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关键。商品价格的稳定（或提高），显然将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但是，按照非洲国家所特有的国内经济发展的策略来看，这一点就未必保证能一定实现。商品价格的稳定或提高可以促使非洲国家的取代进口工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可是这方面的利益，将大部分为外国的跨国公司及其在非洲国家的同伙或者经理人员所占有。或者是通过商品价格的稳定和提高促进了跨国公司在非洲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但是当地受益甚少，而且大部分好处却再次为当地上层人士所获得。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商品价格稳定和提高所得到的收益，干脆直接用于输入武器和奢侈品，以强化国

家的镇压力量并使非洲本地资产阶级抗拒变革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

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辩论，似乎将不会给非洲不发达的模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第 五 章

结 论

本文的结论是悲观的。对于非洲的殖民前期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分析表明，在整个非洲大陆，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在广泛的不平等、严重贫困和对变革实行严厉压制的情况中形成的。非洲国家独立后，仍然存在的跨国公司同非洲小资产阶级力量的勾结，阻碍了改变上述非洲现状的各种努力。其中，工业化主要是为很少一部分人谋得了好处，而地区一体化只能使那些富有的国家得益最多。从这些基本的分析中可以认为，从变革国际劳动分工中所获得任何潜在利益，也将被上述两种势力强行分沾。这种国际劳动分工的变革，在欧洲同非洲的关系中已经越来越加明显了。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的和继续存在的依附于他人的这种强大势力，确实令人沮丧。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得出一个充满希望的结论。从我们进行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开发不足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已经明显地突出了。这种现状，正在迫使一些非洲国家改变其方针。诸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类国家，正在寻求一种“自力更生”的策略，其目的是为了摆脱依附于别国的恶劣影响才去进行开发而不是停留于开发不足。过去，通过政治斗争可以最大限度地抗拒殖民主义的阻挡势力。同样的，我们希望在八十年代里，其余的许

多非洲国家依靠国内政治力量，也能够对于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阻挡势力作出类似的反抗。当然，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将按照上述的那个方向前进。某些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特殊国家，如象牙海岸、肯尼亚就不会这样干。

由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本主义互相勾结而形成的一股强大势力，足以抗拒任何激进的变革。但是，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由于目前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尚无力进行充分的调整，以便更加有意识地将大多数第三世界人民纳入国际劳动分工，这些国家将有可能迫使第三世界人民采取更加富有想象的和创造性的策略，虽然要付出临时不幸的代价，但却带来长远的发展上的有利条件。

在非洲，自力更生的发展策略最好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呢？

“国际劳工组织”强调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概念，已经表达了这些可供选择的策略的最优先方面。这些基本需要被看成是每个社会应向最贫穷的人民提供的最低生活标准。每个家庭在衣、食、住、行、卫生饮用水、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最低要求均应得到满足。此外，每个有能力劳动而且愿意劳动的人都应获得一项有报酬的工作。基本要求中还包括一个健康的、人道的、并令人满意的外部环境；普遍参与有关人民生命和生活上大事的决定，以及人身自由的权利。

一个成功的农业政策是这类基本需要策略的核心，也是实现更多的自力更生所必需具备的条件。依靠这项农业政策将使得大多数非洲人，在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上能够获得充分的粮食生产，并且保证大多数非洲人民，都能参加生产和整个农业部门收益的分配。这项农业政策将反对“双峰”农业发展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只鼓励少数属于“现代化”部

门的大农场向先进发展，而大多数农民却依然很落后。相反的，这项农业政策主张一种“单峰”模式，或者称之为面向农村的策略。按照这种模式，所有部门全都同样分享利益。这类面向农村的策略，要求实现平等地分配土地；扩大信贷分配和市场的政策；注意创立农村机构，通过这种机构可以传播最新情报，并且集体承担风险，否则的话，这种风险就会阻碍小农的创造性；这种农村机构还使得当地农民享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以便加强农业收益的平等分配。

虽然，粮食生产在自力更生的策略中属于第一位优先的，但这并不是说，许多非洲国家不允许支持粮食以外的农业生产。这类农业生产应逐渐地同当地工业生产结为一体，以便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独立自主和更加连成一片的国内经济。当地消费需要和生产的进一步结合是自力更生策略的核心。这类的结合策略可以提高当地基本消费品、建筑材料和资本设备的生产。通过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采用更多的当地投入，从而使得工业化所产生的就业效应和带动效应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相当数量收益的再分配和对于跨国公司企业统治的大力反抗，是这种策略转变过程中的两项关键问题。只有通过这样的变革，才能重新建立起非洲国家的消费—需要模式，以便使得这种消费同生产结合策略中所包含的当地投入能够同这种生产模式更好地紧密结合。这样的一种革新的工业政策也同样地强调发展小型的和农村工业，以便进一步扩大收益。

所有这些方面要想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就是扩大技术上的自力更生。一项基础广泛的农业策略则要求更多地推广适合于小农的技术革新，而不是象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农

业那样强调农业技术革新。同时，一项分散的“带动效应密集型”工业政策也要求技术革新，但比跨国公司所提倡的要广泛得多。这种“切合实际的技术”的发展，只有通过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工作才能实现。这种工作一定要更加有效地同本地的生产结构密切联系。当然，这种技术上的自力更生，并非主张第三世界在知识上实行闭关自守。相反的，这种技术上的自力更生而要求：（1）努力从世界各国广泛地寻求这类的知识；（2）大力设法引进各种必需的技术；（3）努力创造出符合于一定条件的本地技术知识。

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各项改革，也会有利于这类基础广泛的自力更生政策的发展。例如，放宽国际技术转让条款的措施，就可以使得非洲的穷国比较容易地摆脱对跨国公司的严重依赖。调整国际专利权制度也是实现上述目的的一项关键性改革（为了使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进行选择并且建立一种严格条例，规定发达国家专利权持有者只能以合理的价格向第三世界国家出让专利）。一项关于技术转让的法规的建立，也将会有助于第三世界的地区技术中心的资金的筹划工作。世界经济贸易政策的发展甚至显得更为重要，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共同基金所建议的各种稳定出口价格的方式，通过减少剧烈的价格波动——这种波动破坏了本国的计划工作——可以有利于自力更生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北方工业化国家与南方不发达国家间贸易联系，以逐步取代目前的这种南—北方关系的模式。还有一些制度性的改革，例如，建立一种专门用于南北贸易的货币，可以有助于这类的变革。更多的南北贸易可以促使非洲国家能够通过出口来实现规模越大越加经济的效应，而毋需为了生产西方国家市场需要的商品而采用那些不适当的技术。

根据非洲的具体情况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南北贸易，对于整个非洲大陆特别有利。但是这种发展的前景完全取决于能否成功地推翻南部非洲的白人政权。这个问题可能是整个八十年代国际上对非洲注视的焦点。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坚持自力更生的政权将会大大有助于非洲国家选择合适的发展策略，但是，在这些政权最终出现之前，将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在八十年代，南部非洲的武装冲突，似乎将不会比依附与自力更生这种非洲特有的重大对抗形式更为严重。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十年里，非洲国家存在的资本主义矛盾将会变得更为尖锐，而且这些国家争取变革的斗争也将会变得更加痛苦。但是，我们相信，从这类的冲突中将会产生一项更加平等的和更加自力更生的发展策略，从而给大多数非洲人带来利益。



